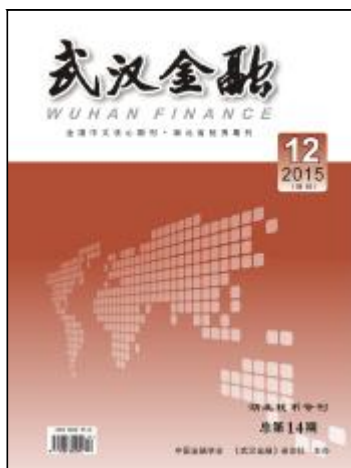


C 目录 CONTENTS



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主办单位：中国金融学会

《武汉金融》杂志社

本刊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问 陆磊

主任 杨立杰

编委

卜永祥 马天禄 王信 王斌
王芝斌 王吉山 王季明 文行赤
宁效云 龙志林 任德奇 任清尧
刘美频 刘必金 刘波 朱新蓉
朱正罡 毕伟 李民 李秉恒
李杨勇 宋清华 吴少新 杨德
杨贵柱 谷刚 汪博 陈小强
陈新民 陈传龙 张劲辉 周伟
姚余栋 钟钢 洪晓成 贺杰锋
徐长生 徐学敏 袁敢 铁金山
黄宪 黄旭东 赖秀福

学会动态

- 03 在湖北省钱币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致辞 杨立杰
04 湖北省钱币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肖作霞
06 湖北省钱币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讲话 刘绍新

抗战货币

- 07 仇视并破坏近代中国崛起
——日本侵华战争截断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姚会元
11 最早的抗日货币——台南官银票、官钱票 叶真铭
14 因鲁中大扫荡改版的北海银行民国三十年山东五元券 李天聪 李银
17 鄂东南革命根据地货币近年新发现 张或定 周明贵
26 湖北“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地方武装纸币 张或定 张劲峰 张哨峰
28 抗战时期湖北省库鄂东分库壹圆券 吕怀平
29 抗战货币中的辅币发行
——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 黄丽 周罗

展览展示

- 31 传承优良革命传统 弘扬红色金融文化
——记 2015 年度红色金融历史展(武汉站)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红色金融历史展组委会
35 珍贵的红色钱币
——全国红色金融史展出观感 彭泉洪
36 鄂泉荟萃 精彩纷呈
——记湖北近代钱币展 姜林

2015 / 12

湖北钱币专刊

总第 14 期

钱币学

- 39 唐代“飞钱”若干问题考证 王纪洁
- 41 论顺治钱典型坑口 黄定学
- 46 湖北沙市近代票号业与钱庄业考 夏红艳
- 49 试述金代纸币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启示 苏利德
- 55 中南银行纸币的版式及其发行制度 马长伟
- 60 “苏三币”对当时金融经济产生的影响 周俏梅
- 62 内蒙考古发现汉代铸钱作坊及钱币反映出的现象的启示 余 军
- 64 残损硬币真伪鉴定探析 中国人民银行荆门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钱币文化

- 66 弘扬钱币文化 服务央行事业
——访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杨立杰行长 马海敏 姜 林
- 69 继承好传统 激发正能量 努力做好新时期基层央行金融货币工作
——从鄂豫皖革命金融货币工作前辈们的那些事说起 戴启斌
- 71 珍稀铜圆看十堰 黄定学
- 76 可敬可爱的博物馆人 姜 林
- 78 中国历代虚值货币简述 陈争鸣
- 81 古代民俗钱币上的城隍信仰 叶真铭

附录

- 83 2015 年度湖北钱币大事记
- 84 书评一则

主 编 赵 军
副 主 编 邓亚平
执行副主编 陈松林 郑 艺
主 任 吴 莹
值 班 主 任 熊 敏
广告部主任 吴俊伟
法 律 顾 问 瞿森垓
编 校 邓雅娜 胡松林 蒿倩文

出版单位：《武汉金融》杂志社
发行单位：《武汉金融》杂志社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9-3540
国内统一刊号：CN42-1593/F
封面题字：中国书法家协会钟鸣天理事
印刷单位：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楚天印务总公司
广告许可证号：4201004001161
增刊备案号：421593201501
每册定价：11.00 元
编辑部电话：(027)87327462
发行部电话：(027)87327465
广告部电话：(027)87327290
本刊地址：武汉市武昌中南路 69 号
邮 编：430071
投稿平台：<http://yhqy.cbpt.cnki.net>

本刊声明

■本刊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征集稿件,刊发文章不收取任何费用。

■本刊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数据等网站有合作,作者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如无特别声明,均视为同意接受以上网站的数字传播与发行。

■本刊版权属《武汉金融》杂志社所有,其他媒体转载本刊文章,须注明“摘自《武汉金融》”字样,否则即侵权。

■本刊谢绝一稿多投;文责自负。

在湖北省钱币学会 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致辞

杨立杰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代表：

今天，湖北省钱币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这是湖北省钱币学会的一次盛会。这次会议得到了中国钱币学会、省民政厅、省社科联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湖北金融界、文博界及社会钱币研究爱好者的积极配合。在此，我代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向前来参加会议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全体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次大会认真总结了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选举产生了湖北省钱币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及其领导成员。会议时间不长，内容很丰富，开得很成功。回顾湖北省钱币学会五年来的工作，应该说成效斐然：一是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承办了“辛亥革命与货币”等3次全国学术会议，策划了《湖北钱币研究丛书》，出版了《湖北钱币博物馆藏品选》；二是举办了红色金融历史展、湖北近代钱币展等重点展览和3.15反假币、金融博览会、“鄂泉图要”等宣传项目，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三是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自身建设扎实推进，为学会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五届理事会期间，湖北钱币学会先后被民政厅、社科联评为4A社团、先进单位，荣获了全国先进科普个人、优秀社团工作者等多项表彰。可以说，第五届理事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此，我谨向肖作霞会长带领下的第五届学会成员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钱币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钱币收藏和研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关心和重视，越来越显示出它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如何开拓和发展钱币学会工作，如何更好地发挥钱币博物馆的功能，我们还需要不断探索。下面，我代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对新一届学会的工作提几点意见：

一、重视钱币专业人才的培养，壮大队伍

货币从产生到发展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其中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与变迁。认真研究历史货币，学习了解货币史、金融史，不仅是历史学家及文

博研究者的事情，也是金融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是金融系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将货币文化作为金融系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支持钱币学会发展，下大力气狠抓人才培养和壮大，充实专家委员会，注重吸收社会、高校、文博系统中青年专家、学者入会，使他们逐步承担起学术研究带头人的责任，努力为历史货币和现实金融研究工作服务，共同开创湖北省钱币研究的新局面。

二、坚持研究交流、宣传推广并举，百花齐放

湖北是楚文化的故地，又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武汉历史上是近代中国四大金融重镇之一。湖北钱币研究，不仅有古代独特的楚国货币、清末张之洞币制改革、近代民国汉口金融，更有各个革命时期根据地的红色金融。不仅钱币实物资源丰富，而且史学资料博大精深，这些都为我们研究钱币，开展学会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要利用这个优势，努力探索和研究钱币文化、金融文化，重点关注湖北地方特色货币、红色金融及至相关遗址保护等。同时，积极开办各项展览展示活动，将成果亮出去，宣传湖北钱币，宣传武汉分行的钱币文化成果。

三、充分发挥钱币博物馆的平台作用，立足宣传

目前，全国各省市都成立了钱币学会，但同时拥有博物馆的不超过十家。作为总行第一批专业性质的钱币博物馆，湖北钱币博物馆将是我们学会的坚实阵地。希望钱币学会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平台作用，利用现有的资源，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联系，将钱币博物馆办成湖北省金融界以及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对外宣传展示的窗口。

各位领导、同志们，伴随着中央有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工作方针，钱币文化将沐浴朝霞、迎接发展。希望湖北省钱币学会新一届理事会能乘势而上，再接再厉，为繁荣钱币文化、推动金融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湖北省钱币学会 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肖作霞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受会员大会委托,我就湖北省钱币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的工作情况向大家做个汇报。

自2010年6月,湖北省钱币学会第五届理事会换届以来,在中国钱币学会和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努力贯彻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工作要求,围绕着“开展钱币研究、普及钱币知识”这个中心,秉承“为金融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会员服务”的办会宗旨,在开展学术研究、宣传钱币知识、加强学会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工作业绩。

一、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不断增强学会动力

(一)承办全国性学术会议,构建平台

本届理事会先后承办三次全国性会议。2011年9月份,我们成功承办“辛亥革命与货币学术研讨会”。时任中国钱币博物馆党委书记温克勤到会并讲话,来自全国各省市钱币学会、文博系统、大专院校等单位的钱币界专家学者70余人围绕共和纪念币、军用票、货币与辛亥革命史、金融管理与机构、辛亥革命时期地方纸钞债券等专题开展了研讨与交流,《金融时报》进行了跟踪报道。2012年10月份,承办“《中国金币》杂志撰稿人会议”,来自全国各地近百名泉友参会,共商《中国金币》杂志发展大计。2015年3月份,承办中国钱币学会红色金融专题委员会年度例会,来自全国各兄弟学会、红专委会会员单位等共三十余人参加会议,大家围绕红色金融文化宣传推广、遗址保护、工作创新等开展了交流。历次会议我们都高度重视、统筹协调、精心组织、热情服务,得到与会代表们充分肯定。

(二)积极开展多种学术研究,结出硕果

本届理事会,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一是完成多项重点课题:2012年《纪念币(钞)收藏品市场发展与管理研究》在《时代金融》刊载;2013年《钱币博物馆与央行文化建设》在《武汉金融》刊载;2015年《中南银行纸币版式及发行研究》在中国钱币学会第三届中国金融史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二是完成了两本专著。2013年,我们策划《湖北钱币研究丛书》编辑

工作,该丛书第一部《顺治钱百珍》已公开发行,该书由钱币专家库成员黄定学先生编著,囊括清朝顺治年间所发行的百余种钱币图录,是目前国内关于顺治钱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专著。同年我们还出版了《湖北钱币博物馆藏品选》,该画册囊括湖北省钱币博物馆展出及陈列精品,由黄锡全先生题写书名,戴志强先生亲笔题字。画册排版整齐,印刷精美,已于2013年底出版发行,同时被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等多家单位收录。

(三)推动研究成果转化,形成载体

与《武汉金融》杂志社合作,每年出版一期钱币专刊,主要罗列湖北钱币界一年来的重要研究成果,分为学会动态、货币史研究、钱币学研究、根据地货币、人民币反假、泉海杂谈等栏目。2013年创刊《湖北钱币通讯》季报,主要刊登钱币界新闻和湖北钱币动态等。我们还与《中国钱币》联系,于2011年编辑出版“辛亥革命与货币”专刊。这在《中国钱币》出版史上也不多见。

二、致力于钱币宣传与推广,增强学会影响力

(一)围绕钱币做文章,开展展览展示活动

本届理事会期间,开办了两项重大的展览展示活动。一是2015年3-4月举办了红色金融历史展。该展览由中国钱币学会红色金融专委会、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主办,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湖北省博物馆协办,湖北省钱币学会、湖北钱币博物馆承办。展览以“传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红色金融文化”为出发点,通过一系列展板、展墙、实物、场景、歌曲演示、视频展播、观众互动等方式,全面讲述我国红色金融的重要历史轨迹,讴歌我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庆平、原副行长马德伦,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尹汉宁,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斌,湖北省副省长曹广品等领导同志莅临观展;金融时报、湖北卫视、武汉电视台、楚天都市报、湖北电台、人民网、新华网、荆楚网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展览期间共接待观众

逾 10 万人次,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二是 2015 年 6-8 月在北京举办了“湖北近代钱币展”。该展览由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学会、湖北省社科联、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主办,我学会与湖北钱币博物馆联合承办。人民银行各司局、中国钱币学会、北京市社科联、湖北省钱币学会团体代表等七十余人参加开幕式,中国钱币博物馆周卫荣馆长主持开幕式,中国钱币博物馆党委书记李明、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杨立杰到会并致词。该展览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任上设立湖北银元局并在武昌铸造银元为起点,按照时间顺序,分清末钱币、辛亥钱币、汉钞、红色钱币、学会成果展五个单元,通过大量珍贵的钱币实物,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生动再现了湖北近代货币发展过程,回顾了湖北在近代中国金融业兴起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立足学会履职,加强宣传力度

五年来,学会立足于服务金融、服务社会的宗旨,开展了多项宣传、推广工作。一是积极参与每年“3.15 人民币反假”宣传活动,五年来从未间断,累计接待市民咨询 5000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3 万余份。二是连续 3 年筹办“钱币文化展区”参加“中国·武汉金融博览会”,展示湖北特色钱币实物,成效较好,湖北卫视、楚天都市报、荆楚网等争相报道,人民银行总行潘功胜副行长、李东荣副行长等领导先后莅临钱币展台参观。三是与外单位合作开展宣传。2012 年联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了反假宣传、钱币竞猜、钱币虚拟拍卖等系列活动,人民网进行了深入报道,中国日报网、凤凰网、中国金币收藏网等相继转载。2013 年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博览》杂志合作,在 4、5、6 期开展了连续报道。2014 与武汉市档案馆联袂举办“近现代鄂泉图要”展,展示湖北地区近现代货币发展过程,中国档案资讯网、大楚网、荆楚网等先后报道。2015 年联系《金融博览》杂志对武汉分行杨立杰行长就“弘扬钱币文化、服务央行事业”相关议题进行了专访。

(三)开展钱币科普,积极为会员服务

我们每年参加湖北省社科联“科普宣传周”,宣讲钱币相关知识;开展了钱币进军营、进社区、进高校等系列活动,扩大了学会影响;邀请钱币专家王永生、李邦经等开展钱币类讲座,感受钱币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先后组织团体会员单位赴上海、兰州、宁波、石家庄等地开展钱币交流活动,今年还组织团体会员单位代表赴北京参加湖北近代钱币展开幕式。我们还在互联网上开通湖北钱币网,建立湖北钱币 QQ 群,进一步拉近了与广大会员和群众的联系。

三、积极加强学会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学会凝聚力

(一)加强组织建设,充实学会领导力量

本届理事会成立以来,每年按要求召开常务理事会或理事会,由秘书长向会议汇报工作。鉴于一些理事职务发生变动,我们及时召开常务理事会进行改选,确保了组织稳定性。目前,常务理事会设会长 1 人,常务副会长 1 人,副会长 3 人,常务理事 19 人。学会建立有专家委员会,囊括一大批有志于湖北钱币事业的专家学者,为推动湖北钱币事业发挥了组织保障。

(二)做好换届推荐工作,确保学会工作连续性

我们积极向中国钱币学会推荐常务理事、理事、学术委员会等钱币事业“领路人”。现任中国钱币学会第七次理事会,我学会共有理事 7 人、常务理事 1 人。其中现任武汉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杨立杰同志为中国钱币学会常务理事。代表人选,既有武汉分行行长、货币金银处处长、湖北钱币博物馆馆长等官方代表,也有湖北省钱币学会、各地市钱币学会会长等民间社团领导,还有文博系统的钱币专家,湖北钱币领导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

(三)加强制度建设,增强学会管理的规范性

着重对学会历年的各项制度进行梳理:2011 年,出台《湖北钱币学会内部管理规定》,规范了学会在人事、档案、印章、业务、财务、会议奖惩等行为准则;2012 年,印制下发人员、实物进出管理规定、人员岗位职责等制度,并在实际工作中实施,防微杜渐、杜绝隐患。

各位领导、同志们,湖北省钱币学会第五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较好成效:由我学会推荐《币海漫游》钱币书籍,荣获“全国百部优秀社会科学普及读物”荣誉称号;学会秘书处有 1 人被中国社科联评为全国优秀科普工作者,2 人次被湖北省社科联评为“全省社团管理先进个人”,学会先后荣获民政部 4A 社团、省社科联优秀组织奖、社科普及宣传奖等荣誉称号。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悉心指导,离不开中国钱币学会、湖北省民政厅、湖北省社科联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在座的各位钱币同仁们的关心与厚爱。当然,我们在工作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如:基础工作有待进一步夯实,个人会员开展活动较少,精品活动需要进一步丰富等等。我们期盼并相信第六届理事会能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

湖北省钱币学会 第六届理事会会长讲话

刘绍新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代表：

在各位代表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民主推荐和选举，产生了湖北省钱币学会第六届理事会。承蒙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推选我担任湖北省钱币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的会长，这让我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同时，我也满怀信心，因为新一届理事会汇集了湖北钱币界的众多精英人才，学会队伍更加壮大，十分有利于今后学会各项工作的开展。也因为前任肖会长领导的第五届理事会打下的良好工作基础，还有在座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朋友的重视、关心和支持。我相信，第六届理事会将在继承第五届理事会务实创新工作作风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奋力争先，不断开创学会工作的新局面！

湖北省钱币学会作为一个群众性团体，自成立以来，得到了中国钱币学会和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今天中国钱币学会领导亲临我会指导，是对学会工作的最大支持。武汉分行党委多次听取湖北省钱币学会的工作汇报，从人、财、物等多方面支持学会开展各项工作。目前，学会取得的发展及成绩，离不开分行领导的高度重视；离不开省民政厅、省社科联等领导的悉心指导。在此，我代表湖北省钱币学会全体会员，向中国钱币学会各位领导，向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党委，向省民政厅、省社科联的领导以及关心和关注湖北省钱币学会工作的各位同仁、各位与会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就本届学会的工作开展，谈几点意见：

一、加强组织建设，完善学会管理

（一）加强组织建设，扩大学会队伍

要严格学会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议事程序，提高学会领导层管理水平；注意吸纳钱币研究人员、钱币收藏者、钱币爱好者加入个人会员，提高学会调查研究、指导收藏的水平；积极扩充团体会员，吸纳各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入会。

（二）加强学会管理，规范学会工作

湖北省各地市人民银行都成立了地方钱币学会，但就运作情况看，工作进度和水平并不一致。希望各地

市积极重视钱币学会的工作，进一步完善学会组织体系，落实专职工作人员，尽快将学会活动开展起来。各商业银行、大专院校、文博系统的团体会员单位，也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开展一些钱币研究和收藏活动，湖北省钱币学会将给予适当帮助和支持。

（三）规范学会会费缴纳和兑换纪念币工作

湖北省钱币学会开展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经费支持，按时缴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目前学会仅向团体会员收取会费，会费使用也都有严格的规定和程序，仅限于学会组织的研究和宣传活动。此外，学会将综合考虑会费收缴、学术研究、活动开展等情况，开展流通纪念币的发放、兑换工作，尽可能满足大家的收藏需求。

二、加强学术研究，做好宣传推广

（一）在钱币书籍出版、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

一是以《湖北钱币研究丛书》为阵地，争取出版 1~2 本钱币类专著；二是加强与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钱币博物馆的沟通与联系，争取承办 1~2 次全国学术会议；三是继续编辑《武汉金融·钱币》年刊和《湖北钱币通讯》季报，构建与钱币专家、收藏者、爱好者沟通的纽带。

（二）做好各项宣传推广工作

一是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展示和宣传效果，加强与兄弟省市钱币学会、博物馆间的展览、实物、文化交流，探索访问学者、客座专家、联合办展、异地展览等工作机制；二是积极开展人民币反假宣传工作，配合公安部门、人民银行，参与反假人民币宣传，扩大反假活动的社会影响力；三是以湖北钱币博物馆为依托，夯实钱币博物馆宣传阵地作用，尝试申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授牌。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我相信，在你们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下，在本届理事会共同努力下，湖北省钱币学会的工作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湖北钱币事业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谢谢！▲

仇视并破坏近代中国崛起

——日本侵华战争截断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姚会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接受中、美、英三国发出的“完全解除日本军队武装,永久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波茨坦公告》;9月2日,盟国在泊于日本东京湾的密苏里号美国战列舰上举行日本投降仪式,当时,八百余架美军飞机在空中翻飞翱翔展示实力,日方投降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被迫在黑色降书上低头签字;9月9日,中国战区在南京举行受降式,国民政府的何应钦上将主持受降仪式,日方的降书中明确写道:“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全世界人民都清楚并永远铭记: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遭到最后的失败!

但是,战后日本政府如何对待自己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呢?答案是否定的。早在1945年8月14日于日本国内公布的所谓《停战诏书》中,日本将其对亚洲各国的侵略称之为“解放亚洲的战争”;声言,日本在“停战”后,将实行“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的卧薪尝胆,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及社会的右翼势力仍处心积虑,不时掀起否定日本侵略扩张历史的浊浪。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掩盖、歪曲、抹杀日本侵略历史的行径;并不断坚持和深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因为这是:第一,中日两国共同创造未来的需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推动和发展“后事”,必须对中日之间的“前事”有所了解和认识。对于日本在侵略中国的14年中,到底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应该做实事求是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以“牙”还“牙”,不是为了以暴制暴,而是为了历史警钟长鸣;第二,完成历史赋予的嘱托。面对侵略战争中的罹难者,面对着南京大屠杀中屈死冤魂的目光,我们无法逃避他们无语的要求,清算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分明是历史的嘱托;第三,是时代的任务。日本这个国家,在近代和当代,曾创造过奇迹,在许多方面值得世人学习和借鉴,但在面对其侵略历史的问题上,其言行、其作为、其野心、其图谋,令人嗤之以鼻。应该通过抗日战争史的整理与研究,促使日本上下深刻反思历史,铲除其国内军国主义战争渊源,这是时代的任务。

一、“七·七”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

20世纪初期开始尤其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一个发展的快车道,其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前的1936年。在1912年至1920年间,中国工业平均年增长率曾高达13.8%,创造了罕见的高增长纪录,为世界各国所瞩目。对此,日本军方则表示极大的忧心与恐惧,十分忌妒中国经济的发展,十分惧怕中国的崛起。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各种经济改革措施次第施行,中国经济继续发展。

首先是整顿财政金融,为经济建设铺路。1928年6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货币会议,决定废两改元,渐次统一中国货币,畅通金融;接着举行全国财政会议,废除厘金制度,消除国内贸易流通的主要障碍。同时决定对重要商品如棉纱、卷烟、面粉、水泥、火柴、啤酒等实行“统税”的单一工业产品出厂税,逐渐形成并扩大统一的全国性市场。

其次是坚决并积极争取“关税自主”。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后,中国关税即由外人控制,实行值百抽五(实际中还不到)的关税税率。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抗争下,192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关税自主,1931年1月起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税率;并以关金代替银元作为计税单位,以避免受世界银价下跌的影响。1929年前,外货进口征收税率名义上是值百抽五(5%),即使这样低的关税税率,外国势力也不愿兑现。中国政府对外国进口货所征税款,实际只折合百分之四。关税自主后,1931年提高为10%,1933年提高为20%,到1934年已达25%;关税自主,使中国关税收入由1928年的1.34亿元,激增至1931年的3.88亿元,大大强化中国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也大大提振了中国发展外贸的信心。

第三是断然实行币制改革。一是因为,1935年前,中国币制紊乱,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二是因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大多实行金本位,但中国仍采银本位。国际银价波动直接影响中国币值及国民经济。1934年美国实施购银法案,国际银价暴升,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根紧缩,中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1935年11月,

国民政府决定放弃银本位,实行法币政策,所有白银和外汇集中于国家银行,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统一发行“法币”。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1法币元兑英镑1先令2.5便士)。英镑在当时是国际上信用最高、币值最稳的货币,法币对英镑实行固定汇价,稳定了中国法币制度与体系,具体表现在:一是使中国金融最大限度摆脱世界银价行市涨落的干扰和影响;二是中国方面可用法币购买外汇去偿付所欠各国的外债,以规避用白银偿还外债时因银价起落所带来的损失(一般称为镑亏损失);三是稳定中国货币币值和金融行市;四是利于中国外贸发展。币制改革不但起到稳定物价、刺激产业的作用,而且奠定了日后中国长期抗战的金融基础。

第四是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普查国家资源,着手制定全国性建设计划。从1926年到1936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已具备“起飞”的基础,在若干方面,已崭露出“起飞”的迹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保持着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1926~1936年的十年间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6%,虽较1912年到1920年的增长率低,但在世界范围内,仍是较高的年增长率,表现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特别是中国基础工业在这一时期长足发展,尤以电力工业为突出。1926年电力工业比重占中国现代工业11.2%,1936年上升到占22.2%。电力工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预兆中国工业化的蓬勃开展有了动力基础。

2.这一时期中国轻工业尤其是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突飞猛进。1922年全国共有纱锭238万枚,布机1.2万台,到1936年两项数字已分别刷新至纱锭510万枚,布机5.8万台,在14年中增加一倍至两倍多。

3.中国的农业开始复兴。1936年时,中国除少数省份(川、豫、粤)外,农业均获丰收。据中国银行估计,当年全国农业产值达法币56亿元,较1933~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

4.对外贸易发展。在中国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后不久,中国外贸发展即出现好势头,“改革之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口”,“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到“1937年上半年,进口比一年前同期增加了40%”。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外国对中国的进口货物历来是以日用消费品与奢侈品为主,而从本时期开始,机械设备的进口有大幅增长。1926年中国机械设备进口值为1970万两,至1936年已达5390万两,增加近两倍。机械设备是固定资本的主要部分,机械设备的大量进口显示中国产业资本形成的速度正在加快。

5.近代金融资本发展迅猛。1897年中国才诞生第一家新式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到1935年已有2566家银行机构,初步形成覆盖全国的现代化金融网络。

6.到1936年前后,中国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及公路建设有巨大进展。自从1876年中国修筑第一条铁路起到1912年36年中,全国只修筑了铁路9618公里。但从1928年到1937年这9年间,新建铁路里程达7995公里,其中关外4500公里,关内3400公里。令国人骄傲的是,关内新筑干线如粤汉、浙赣、同蒲等皆由国内集资修筑,并非举借外债。1937年时,中国铁路总里程达到21700多公里。公路方面,已基本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公路网,共有21条干线15条支线,总里程达到11万公里。

7.教育和人才培养发展迅速。1916年全国只有大专学生25000人,到1934年已增加到43000人。高等院校数量,由1928年的28所增加到1937年的108所。在学校修习与经济建设相关学科(如理、工、医、农专业)的学生比例,由1931年的30.7%,上升到1935年的51.2%。

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W.Rostow)指出,“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必需条件是投资至少要占产出的10%”。粗略估计,1933年中国农村中地主和富农所收取的地租额在扣除其生活费用外,至少有26亿元可以用来进行投资,这一数字约占当时国民收入的13%。按罗斯托的理论考察1937年前的中国,已初步具有经济起飞的能力。不谈中国的城市和工业,仅就农业看,当时的中国已初具“经济起飞”投资的资金能力。所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又一个好时机。但是,日本侵略者1937年“七七”事变后,对中国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打破了这一“好时机”,野蛮地截断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路。

二、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破坏

20世纪30年代即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及沿海沿江各省;而关内地区的工厂,七成以上集中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五市即集中了全国工厂总数的50%、资本额的40%、全国全年产值46%。1937年后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在日军大举进攻下,沿海地区陷入侵略者的铁蹄下、炮火中,中国工业的荟萃地带在一年内全部陷入日本之手。

中国关内受破坏最严重的是工业最发达最集中的华中地区。据上海社会局调查,自1937年8月13日至11月中,在历时仅三个月的激烈市街战中,日军炮火摧毁的上海工业企业总数达2270多家,资产损失总额达8亿元;上海闸北区的损失比率达百分之百,虹口及

杨树浦之损失比率达到 70%。

除上海外,毗邻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设备损失平均约达 50%;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损失亦极惨重,工厂彻底被破坏的占比达 12%。

工业系统的主要行业均遭惨重损失,如棉纱业,全国纱锭损失约 29 万枚,纱厂设备损失在 20%以上。染织业,仅上海、无锡、武汉三地的损失,就占全国染织业总资本 80%以上,橡胶业损失占该业总资本 70%,造纸业损失 64.6%,烟草业损失 48.5%。战前,上海机械工业共有工厂 570 家,但在“八一三”战役中,损失较重和全部被毁者达 360 家,占总家数 63%。此外如缫丝、面粉、矿冶等业也没能逃脱侵略者魔爪的抢掠与破坏。

由于设备被毁,全国经济中心上海的工业生产一落千丈。1936 年上海面粉产量 3654 万袋,到 1943 年下降至 1300 万袋,产量减少 65%。上海棉纱产量,以 1936 年指数为 100,1943 年时则降到 4.3%。

华北地区所遭受之破坏虽比华中地区为轻,但从产量下降情形来看,损失亦极惨重。1936 年华北地区面粉产量 2035 万袋,1944 年降为 900 万袋,下降 66%。棉纱产量,1936 年为 46.9 万包,1944 年下降为 18 万包,下降 62%。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交通运输设备亦遭受大规模破坏,各条铁路线的大小车站、工厂、车头、车厢、铁轨等大半毁于战火。公路被毁坏达三四万公里,轮船损失总量达数十万吨。

在农业方面,沿海地区广大农村在日军的劫掠蹂躏下遭到空前的损失。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资料,全国(不含东北地区)11.4 亿亩耕地中,有 6 亿亩遭到破坏。全国(不含东北地区)2300 万头耕牛中共损失 800 万头。就地区而言,华北耕畜农具损失极重。如河北正定、东光、获鹿等县,牲畜全部被日军征发。华中农村也遭受残酷的焚毁与蹂躏。如江苏常熟、昆山、松江、青浦、丹徒、江宁等县,城乡房屋半数甚至全部被毁为焦土。华中各省受灾地区占 75%以上。浙江受害农村占总数 40%,安徽占 35%。日本侵略者对农村的破坏造成土地大量荒芜。华北沦陷区有些地方,抛荒地占全村耕地面积 25%。山东临城县一带,抛荒土地占耕地一半以上。由于长年无人耕种,耕地土质显著蜕化,水地变为旱地、两季地变为一季地、上等地变为下等地,这些情形普遍发生。据 1943 年日本人出版的《北支年鉴》及《满铁北支年鉴》所统计数字,河北及苏北各地小麦、小米等 11 种作物的耕种面积,1941 年较战前减少 16%。

华北各省中,河北受战争影响最甚。1938~1939 年两年间,作物耕种面积较 1936 年减少二成。河南北部,战争最初两年中,作物耕种面积分别减少 7%~8%。华中棉花耕种面积,1940 年仅及 1937 年 21.5%,收获量

仅及 1937 年的 20%。华中 15 种谷物总收获量,沦陷时期一般比 1936 年下降二成至三成;水稻为华中的主要农作物,1941 年长江下游江苏镇江附近的水稻产量,仅及 1936 年的四成;江西南昌地区仅及战前三成,而江苏常熟、江阴、浙江杭州附近地区,其产量仅及战前的二成。河北农产品收获量,1937 年农产品收成平均减少三成,到 1938 年产量仅及战前 32%。山东小麦、玉米、水稻、棉花及烟草产量均较战前下降五成以上。

农村手工业同样遭受到严重摧残。战前河北高阳县共有布机 3 万余台,经过日本人的抢劫摧残,到 1945 年只剩下 1800 台。手工丝织业亦一蹶不振,1937 年日军侵入华中地区后,手工丝织业最发达的苏州、杭州、湖州、盛泽等地,手工丝织机的损失达 57%。战争期间,全国桑树被砍伐焚烧的达 20 亿株,缫丝车被毁的达 4.3 万部,中国蚕丝产量由战前的 15 万公担减为 1.5 公担(1 公担=100 千克)。

在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下,中国农民收入急剧下降。河北定唐的农民收入,1941 年仅为战前的 40.7%,1942 年仅为 30.6%。由于缺乏全面性的资料,暂时还难以对战争的破坏进行总体的精确估算,但下列三个地区的典型调查,可管中窥豹地反映出战争对中国农村经济损害的程度(见表 1)。

表 1 日本侵华期间中国某些地区农家损失调查表

(单位:万元,1937 年币值)

调查地区	房屋	粮食与禽畜	器具用品	三项合计
南京附近五县农民损失调查	129.0	62.39	38.17	229.56
湖北 34 县市农民损失估计	26.8	24.67	10.13	61.6
桂南 19 县农民损失调查	19.71	15.48	15.86	51.05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估计,全国 14 亿亩耕地中有 6 亿亩遭受破坏,比例约占 43%。如果受害农户亦比照这一比例推算,全国受害农户数量当在 5200 万户以上。若每户每年损失平均数为 110 元(1937 年币值计),战争中中国农民损失接近 60 亿元。工业方面,上海一地损失即达 8 亿。上海工业占全国工业资本的 40%,全国工业损失当在 20 亿元以上。加上交通运输、矿山森林、手工制造业等的损失,粗略估计中国经济受日本侵华战争破坏每年的直接损失当在 100 亿元以上,约为中国国民所得(1936 年)的一半。这一数字并不包括生命的牺牲、支持战争的消耗以及工农业因遭受破坏而减产的长期损失。

三、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消极影响

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粗暴地截断了中国即将“起飞”的经济,严重耗竭中国的国力,造成中国战后恶性通货膨胀。

为支持这场史无前例的长期抗日战争,中国被迫拿出国家预算的七成用于军费。由此造成巨大的财政

赤字(见表2)。

表2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财政收支表(1937~1945年)
(单位:法币百万元)

年份	现金支出	现金收入	财政赤字%
1937	2091	1314	37
1938	1169	341	70
1939	2797	580	79
1940	5288	1589	70
1941	10795	2024	81
1942	25149	6254	75
1943	67234	20763	69
1944	193619	610	69
1945	1257733	216519	83

一方面是战费激增,另一方面是中国财政收入的关、盐、统三税皆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一地区陷入日本之手后,政府主要税源濒于断绝,而收入难以为继。表2显示出,1937年赤字已占国家支出37%,到1941年赤字达到81%。为弥补庞大赤字,不能不乞灵于增发钞票,钞票的滥事发行乃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到1945年国统区钞票发行量达到556.9亿,物价上涨为1937年6月的2167倍。

表3 抗战期间国统区钞票发行与物价变动表
(1937~1945)

年份	零售物价指数 (1937年上半年指数为1)		钞票发行	
	指数(12月份)	每月上涨率 (%)	年底发行额 (法币·亿元)	每年 增加率(%)
1937	1.18		2.1	
1938	1.76	49.2	2.7	32.7
1939	3.23	83.5	4.8	75.2
1940	7.24	124.1	8.4	75.8
1941	15.95	120.3	15.8	87.5
1942	66.20	315.0	35.3	123.4
1943	228.00	244.4	75.4	113.4
1944	755.00	231.1	189.5	151.3
1945	2167.00	187.0	556.9	193.9
平均增长率 1937~1945		169.6		106.7

通货膨胀剥夺了国民,民众的生活严重恶化,朝不保夕。在通货膨胀中,固定薪资阶层的公教人员尤其是教师的实际收入直线下降,到1942年,这些人的收入只相当于1937年的二成。到1948年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已陷入困境。

通货膨胀使正常的社会生活无法运行,社会资金转移到炒卖金钞、囤积物资。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机倒把”的反常现象,发横财的人生活糜烂,一般中产阶级濒于破产。官场贪污风行,社会人心思变。

如果当年没有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国经济情况将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局面。在相当一段时期,学术界对中国战前经济成长水平估计过低。近年来由于新资料的不断发掘,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变。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罗士基(Thomase Rawski)教授,根据中国农村收入及消费情况的资料,对战前经济成长做了较为客观的估计。他指出,在1914年至1936年这一段时间,中国经

济每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2%~2.5%。照这一增长率推算,如无日本侵华战争发生,1933年至1953年这20年间,中国大陆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应增加1.63倍左右。而实际情况怎样呢?据刘大中、叶孔嘉二氏的估计,这一时期中国的GDP只增加28%。按照“1.63倍”与“28%”的差距计算,这20年间,中国大陆的国民生产,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生产能力下降,损失在4000亿元以上(按1952年人民币计),折合美金约1800亿元(1952年币值)。

日本的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无穷的灾祸!

面对这种灾祸,中日两国人民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正视历史,立足现在,把握并创造美好未来,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

我们可以宽恕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但是,我们不能允许有人歪曲、篡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不容抹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

“正视历史”是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坚持这一原则,才能辨是非、立坐标、面向未来,建立度过“劫波”,笑抵恩仇的中日关系。▲

[参考文献]

- [1]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M].东京:原书房,1955.
- [2]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Chicago Aldine, 1969:71,76.
- [3]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科学出版社,1955:134-135,143.
- [4](美)阿瑟·恩·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82.
- [5]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M].商务印书馆,1938:863-864.
- [6]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M].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113.
- [7]王珣,于秋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68-169.
- [8]黄建中.过去十年的高等教育[A]//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抗战前十年之中国[M].香港龙门书店,1965:523.
- [9]郑克伦.沦陷区的工矿业[A]//经济建设季刊[M].中国经济建设委员会,1942,1(4):247-258.
- [10]郑伯彬.敌人在我沦陷区的经济掠夺[M].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1945:27.
- [11]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M].人民出版社,1978:113.
- [12]郑伯彬.日本侵占区之经济[M].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1945:21-23,32-34,37.
- [1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M].北京:三联书店,1957:121-122.
- [14]上海外贸史话[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130.
- [15]李侯森.敌后统治区农村破产实况,群众,第10卷,第11、12合期.
- [16]韩启桐.桂南19县抗战损失估计[J].经济建设,1943,2(2):198-223.
- [17]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A]//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17.
- [18]Pao-san Ou, Capital Formation and Consumers' Outlay in China,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44:204.
- [19]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24-225.
- [20]Thomas G. Rawski, Economics Growth in Prewar China, Paper Presented to Midwest Seminar on China, 1985.
- [21]刘大中,叶孔嘉.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66.

最早的抗日货币——台南官银票、官钱票

叶真铭

(福建省钱币学会)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纪念抗战胜利的日子里,曾经的抗日货币再次勾起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笔者认为,抗日货币不应仅仅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还应该包括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追求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所发行的各种货币。1895年台湾发行的台南官银票、台南官钱票,可称为最早的抗日货币,它见证了当年台湾军民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入侵的悲壮史事。

台湾自古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隋以前称夷洲,隋改流求。明朝万历年间官方正式启用“台湾”一词。明末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占据台湾。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清统一台湾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置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1885年台湾建省。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之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战败,屈辱求和,1895年4月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竟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为了迫使台湾人民



图1 刘永福像

投降,日本派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日军最精锐的主力近卫师团,于5月27日从冲绳出发,分兵两路进攻台湾。马关割让,民族之不幸。消息传来,国人震惊,台湾军民更是群情激愤,纷纷组织武装,奋起抗日,“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清军爱国将领刘永福(图1)等领导台湾军民同仇敌忾,

奋起抵抗,在台南、新竹、嘉义、彰化、大甲溪、打狗港等地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大小一百余仗,打死打伤日本侵略军3.3万余人,击毙侵台日军头目北白川能久中将、山根信成少将,在中国人民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反击外来侵略的斗争史上谱写下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刘永福(1837~1917年)是清末民初民族英雄。他原名建业,号渊亭,排行第二,俗名刘二,被人尊为刘义。“永福”是他转战越南时改用名。汉族客家人,广东钦州防城司古森垌小峰乡(现为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乡小峰村)人,祖籍博白东平。1857年,时年20岁的刘永福加入天地会,后成为反清的黑旗军将领。1873年法国侵略越南,刘永福率黑旗军入越抗法,屡次大败法军。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收编了黑旗军,刘永福被授予记名提督,后以军功授闽粤南澳镇总兵。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命刘永福率黑旗军赴台帮助台湾巡抚邵友濂办理防务。1895年5月清政府割让台湾后,刘永福在台南发出联合抗日的号召,表示为保卫国土“万死不辞”,“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仓促,不命倭得”。遂以帮办之职,领导台湾军民的抗日斗争,统率防军与台湾义军抗敌保台。

抗日战争期间,台湾军需粮饷十分缺乏。台湾和大陆东南沿海许多爱国民众纷纷解囊捐输,支援抗战,但杯水车薪。为根本解决军费不足问题,刘永福采纳智士吴桐林建议,在台南设立官银钱票总局,发行台南官银票、台南官钱票,用以筹划兵粮军饷抵抗日本侵略者。

1895年7月开始发行台南官银票。台南官银票以银元为本位,可与当时台湾通行的银元等价流通使用。根据其发行机构不同,可分为“官银钱票总局给”和“护理台南府正堂忠给”两种版别。

台南官银钱票总局发行的台南官银票用木刻版以蓝色印刷,票幅一般为长24.7厘米,宽13.2厘米。票面竖式设计,主体图案为传统的牌坊式图案,由天头、地格两部分组成。银票天头部分横书“台南”、“官银票”五字,分为二行排列。地格内分三行直行印刷,正中直印“凭票支付X平银X大员(员即元)照”,右侧直印发行机构“官银钱票总局给”,左侧印发行日期“光绪廿一年X月X日X字XXXXX号”。票面四周边框,采用松竹梅“岁寒三友”图案作为纹饰(图2)。为防止伪造,银票左右两边骑缝处印有相同的发行字号勘合字样“X

字列第XXXXX号勘合”；票面还加盖有多颗防伪印章，如“镇守福建台湾总兵官之关防”、“台南府印”、“台南府城官银钱票局董事之钤”、“不法棍徒，行用假票，军法究治”等印章。还加盖有一颗“虎纹图章”，象征我炎黄子孙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气概，虎从属于龙，也以此彰示永戴“圣清”，永远不脱离祖国的决心。台南官银票以《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为编号字列，每一字列，自一号至一千号。官银钱票总局隶属于巡防总局，此种台南官银票由士绅花明德负责办理发行。此票的纸张有厚棉纸、薄棉纸和厚白毛边纸等，面值分壹大员、伍大员、拾大员三种。



图2 台南官银票(官银钱票总局)

还见有署名“护理台南府正堂忠”发行的台南官银票。刘永福任命安平县知县忠满兼摄台南府知府，印行以“护理台南府正堂忠”署名的台南官银票，向各商户借款筹饷时使用。当时台南府城划分为五个区，每区置若干委员负责筹饷事宜。该银票也用木刻版蓝色印刷，形制图案与图2大体相同，票长24.5厘米，宽12.5厘米，

也有壹大员、伍大员、拾大员三种面值。此银票与前述银票最显著的区别是，票面右侧印制的发行机构由“官银钱票总局”改为“护理台南府正堂忠”。该银票只在右边骑缝处印有发行字号勘合文字，而非两侧骑缝处都印发行字号勘合文字。其上所加盖的防伪关防钤章较多，一般有六颗：第一颗长方形章加盖在票面正中上端，内容为“帮办台湾防务闽粤南澳镇总兵之关防”，但也有盖“镇守福建台湾总兵官之关防”的；第二颗是盖在正中下端的“台南府印”方形印章，以汉文与满文合于一印；第三颗是斜盖在右边上端的骑缝章“台南府局委员关防”；第四颗是在其下平行斜盖的“台南府城官银钱票局董事之钤”，这是发行单位盖在正票和存根处的骑缝图章；第五颗印章加盖在票面中央左侧，内容为“不法棍徒，行用假票，军法究治”，严明法治，震慑不法之徒；第六颗章加盖在票面中央右侧，文曰“此票準照现银通用，不论官项私款，钱粮关税，典铺盐馆，行商贸易以及兵粮军饷，洋关洋行，一概当银支取，奉宪示谕颁给遵行”，从这颗印章可了解台湾在清末时既有洋关洋行，又有行商贸易，足见此时台湾已成为大陆对外交往的重要枢纽。以上的关防、钤印、戳章等，都用朱红印泥盖在银票正面(图3)。有收藏者发现，目前所见到的此类票最早的发行日期为“光绪廿一年六月初十日”(1895年7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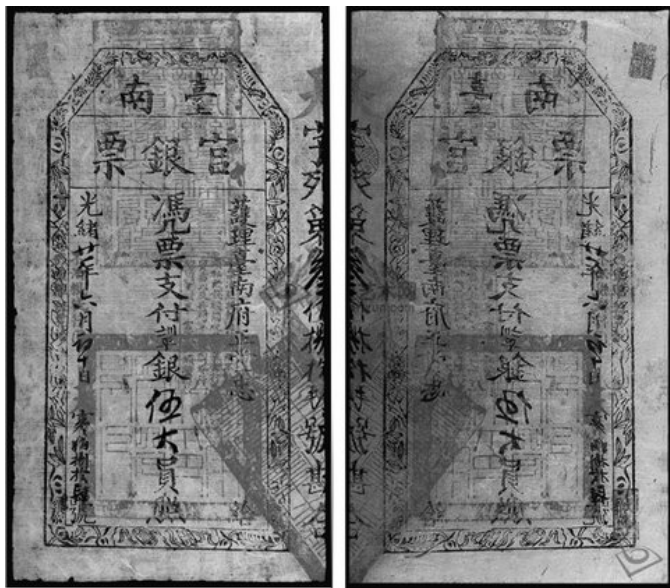


图3 台南官银票(护理台南府正堂忠)

同年8月又发行台南官钱票，其票面设计、图案、文字基本与台南官银票相同。票面竖式设计印刷，主体图案为传统的牌坊式图案，由天头、地格两部分组成。银票天头部分分两行横书“台南”、“官钱票”五字。地格内分三行直行印刷，正中直印“凭票支付清钱XX文照”，右侧印发行机构“官银钱票总局 给”，左印发行日

期“光绪廿一年X月X日X字XXXXX号”。钱票为两联式票据,带有存根。存根图案也为牌坊式设计,由天头、地格两部分组成。天头部分分两行,上行横书“台南官钱票”五字,下行横书“存根”二字。地格部分分四行直行印刷,右侧印发机构“官银钱票总局 给”,正中印“凭票支付清钱XX文照”(面额与正票相同),左印“经于XX年X月X日支销”字样,最左侧印发行日期“光绪廿一年X月X日X字XXXXX号”。正票与存根骑缝处印有发行字号勘合字样“X字列第XXXXX号勘合”,目前仅见“郡”字、“南”字编号字列两种。票面上也加盖有防伪印章,票面上方右侧加盖有“不法棍徒,行用假票,军法究治”长方形章,票面上方左侧加盖有“此票准照现钱通用,不论官项私款,钱粮关税,典铺盐馆,行商贸易以及兵粮军饷,洋关洋行,一概当钱支取,奉宪示谕颁给遵行”长方形图章(图4)。台南官钱票与台南官银票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官银票是以银元为本



图4 台南官钱票

位,可以兑换银元;而官钱票是以清朝制钱为本位,可以代替制钱流通使用。台南官钱票面额有壹佰文、伍佰文、壹仟文三种,但目前所见实物仅有伍佰文一种,存世极少。

台湾军民的抗日斗争,在内无积粮,外无援军的艰苦情况下,孤军抵御日军仍坚持斗争了四个月之久。尤其是台南官银票的发行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日军在侵台战争中死伤病残共达三万三千余人。刘永福统领的黑旗军和组织起来的各路民军英勇悲壮的台南抗战,至八月底弹尽粮绝,刘永福于九月初二日偕部转入安平炮台,刘永福亲手点燃大炮,轰击敌舰。当晚,日军攻城益急,城内弹尽粮绝,在艰苦的恶战中,士兵筋疲力尽,至不能举枪挥刀。刘永福见大势已去,仰天捶胸,呼号哭说:“我何以报朝廷,何以对台民!”当天深夜,刘永福带领养子刘成良等十多人乘坐小艇,然后搭上英国商船“迪利斯”号内渡福建厦门。九月初四日(1895年10月21日)台南陷落,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失败了。台南官银票也停止了发行,前后仅流通使用两个多月。

台南官银票是反侵略斗争中因筹措军饷而发行的纸币,老一辈的台南人亲切地称之为“刘钦差银票”。它的流通时间虽然短暂,但却因见证了一百多年前台湾军民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不屈不挠英勇抗击外来侵略这段悲壮的历史而永载史册。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以银元为本位的钞票,也是最早的抗日货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备受钱币收藏者关注。近年来国内外钱币拍卖会上拍的台南官银票实物,大多受到追捧。2015年5月北京诚轩2015春拍纸币专场上一枚台南官银钱票总局台南官银票,面额壹大员,九二成新,原估价人民币1000~2000元,经过多轮激烈竞价,最后以11500元人民币成交。▲

注:本文附图1~图3来自网络,图4来自台湾《探极》杂志,特此向作者及收藏者致谢!

(上接第28页)行流通券办法”暨湖北省库鄂东分库发行流通券检查委员会章程,提交省政府核准备案。为了慎重起见,湖北省银行又派人会同鄂东行署严密监印,以鄂东分库名义印发,并接管票版。

该流通券有贰角、五角、一元、五元四等面值,其中贰角券五万元、五角券二十万元、一元券六十万元、五元券一百一十五万元,合计二百万元。由皖省印刷局印制六十万元,鄂东印刷局印制一百四十万元,相继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接收十万元,民国三十一年二月接收二十万元,四月接收四十万元,五月接收五十五万元,六月接收五十万元,八月接收五万元,合计接收一百八十万元,内有废票一千零六十八元,实际接收一百七十

九万八千九百三十二元。

民国三十一年印制完成后,除鄂东行署留二十万元使用,其它都由湖北省银行鄂东办事处接收陆续发行并收回票版。

民国三十二年一月,鄂东办事处接陆续收回破烂券三万五千元,经湖北省银行报财政部核准,于六月在鄂东就地销毁,截止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底,湖北省库鄂东分库流通券实际流通额为一百七十六万三千九百三十二元。▲

[参考文献]

- [1]民国三十七年《湖北省银行二十周年纪念特刊》。
- [2]1982年湖北金融研究增刊二。
- [3]1990年版《罗田文史资料》第四辑。

因鲁中大扫荡改版的北海银行民国三十年山东五元券

李天聪 李 银

北海银行是山东抗日民主政权于抗战初期创设的银行。她在抗日战火中诞生、成长,在解放硝烟中发展、壮大,最终于1948年12月1日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北海币,因其存续时间长,使用范围广,影响面大,币值稳定,版别丰富,而成为红色货币体系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本文仅就北海银行总行发行的民国三十年山东地名五元券作深入探讨。

北海银行民国三十年山东地名五元券为蓝版套印,开了北海银行使用套印技术的先河,为带有底纹北海币的鼻祖。自1941年10月18日公告发行该券后,直至1944年才更换新版五元券,使用时间长达两年多。因此,关于发现该券假票的文件及报道也较多,内中多涉及真假票的特点。如1942年12月11日的省战工会《关于查禁伪造北海本币的指示》(山东省档案馆藏资料,档案号G004-01-007-015)中就提到,“套版蓝色五元票与假票的区别之处前已电知各地,其最显著之点即第一真票正面两章一为‘经理之章’一为‘董事长章’。假票正面有两种。一种均是‘经理之章’,一种与真票两章一样,但真票图章四周边线略细而不整齐。假票图章第一种两个‘经理之章’均较真票图章为小。图章四周边线,第一、第二两种假票均较真票略粗而且整齐。第二真票正面楼景阶上是阴影,故较模糊。假票正面楼景阶上是阳影,故较清楚。二者颜色深浅迥不一致。”1942年12月23日的《大众日报》载,“鲁中近发现大票假造之五元北海票,其与真票区别如下:一,真票色深铜版,假票色浅铜版,面上发亮,比真票短一分多。二,真票正面楼阶为阴影,两章一为董事长章一为经理之章,假票楼阶为阳影,两章均为经理之章。三,真票正面小五字十四个,背面小五字都是正的,假票正面小五字十八个,背面左角有两小五字向下歪。”当月25日又报道滨海区多地发现伪造之五元北海票数起,其与真票之显著不同处有四:(一)假票正面中华民国三十年之年字缺少一点。(二)真票正面上方之两圆圈内均有一大黑点左右相称,假票左圆圈下黑点极小。(三)真票背面四角上之“5”字内方块两端有小点两行,假票之“5”字内有的没有。(四)真票反正面之颜色深厚,花纹清晰,假票之颜色单薄,花纹模糊,且用水稍湿即褪色。

上述史料所谈及的加盖两种印鉴的北海币都已面

世。根据省战工会查禁伪造北海币的指示及《大众日报》的报道,加盖两枚“经理之章”印鉴的五元券可定为假票。目前,加盖“董事长章”、“经理之章”印鉴的五元券也发现了两种版别,分别为正面底纹纵列十四个“伍”字(见图1)和十八个“伍”字(见图2)两种,后者票



图 1



图 2

幅较前者恰巧短了4毫米,即一分多。按照1942年12月23日《大众日报》的说法,似乎后者应当定为假票。但是,该报道还说,真票色深铜版,假票色浅铜版;真票正面楼阶为阴影,两章一为“董事长章”一为“经理之章”,假票楼阶为阳影,两章均为“经理之章”。对照图2,似乎十八个“伍”字五元券又符合真票特点。就图2本身来说,无论其纸质还是印刷工艺,都比较符合总行印钞厂当时的印钞特征。判定该券真伪的最重要依据当是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收藏的民国三十年天坛五元券票样(为单面票样,见图3)。该票样正面底纹纵列十八个“伍”字,其余特征亦与图2相同。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所藏的该票样,系北海银行印钞厂留存,其为真品当毋庸置疑,因此我们判定图2券为真品。



图3

“十八个伍字”券为真品,并不意味着“十四个伍字”券就一定是伪品。除了1942年12月23日《大众日报》说其为真品外,我们对采集到的“十四个伍字”券与民国三十年一元券进行了比对分析,除个别品种外,印刷工艺基本相当。对照省战工会查禁伪造北海币的指示及《大众日报》报道的真假币特点,可以肯定我们采集到的绝大多数“十四个伍字”券亦是真品。

在采集样本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民国三十年五元券正面加盖“董事长章”、“经理之章”印鉴,仅有一例正面加盖两枚相同的“经理之章”印鉴(见图4)。这些加盖“董事长章”、“经理之章”的五元券,绝大多数底纹纵列十四个“伍”字,仅有三例底纹纵列十八个“伍”字。“十四个伍字”券号码都在12万号以上,除了一例为浅黄色底纹外,其余均为黄绿色底纹;黄绿色底纹券的特征基本一致,但与浅黄色底纹券的细节差异甚大。“十八个伍字”券号码均在11万号以下。



图4

本次采集活动,我们亲睹样本实物十余枚,另外,藏家发来照片十余枚,网上见到近十枚,合计约三十余枚。“十四个伍字”券号码最小的为127660,最大的是987038。“十八个伍字”券号码最小的是062332,最大的是108690。

“十八个伍字”券和“十四个伍字”券图幅及图景细节多有差异,肯定不是同块钞版印制的。由两种券的号码没有交集这一现象看,两种券很可能是一前一后印发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恐怕与当时的特殊斗争环境密切相关。

1941年10月18日,战工会公告发行该券,11月2日,鲁中区就发生了山东根据地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日伪军五万人大扫荡。大致情况如下:

为了摧毁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八路军主力部队,10月下旬,日伪军开始向鲁中及周边地区集结。具体部署是:第三十二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旅团主力向新泰、蒙阴、平邑、费县一带集结;第二十一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五、第六旅团主力向沂水、莒县一带集结;第十七师团主力、第三十三师团一部进驻临沂。

11月2日~12月2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指挥第十二军的第十、第二十一、第三十二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五、第六、第十旅团主力,华北方面军直辖的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主力,第十二军第三十三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第四、第九旅团各一部,五个县的守备队和伪军,配属航空兵一部,共5.3万余人,以多路梯队的分进合击,形成对以沂南为中心的鲁中区“铁壁合围”。此次“扫荡”,为山东抗战史上日军动用兵力最多、时间最长、最残酷的一次大“扫荡”。

11月3日晚,蒙阴、沂水、莒县的日伪军悄悄出动,4日拂晓,首先偷袭山东纵队机关驻地沂南县马牧池,山东纵队机关分散突围。

5日黄昏,日军2万余人分11路,在七架飞机、数十门大炮、十辆坦克的配合下,合围驻沂南县西南留田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省战工会领导机关,并以重兵由北向南推进。

7日^①,千余日军从夏微、新泰、坦埠、黄庄等地出动,对大崮山、龙须崮等地实施分割包围。大崮山位于蒙阴东北部,崮顶南北走向,地面开阔,四周多是悬崖峭壁,崖高一般十几米,形成天然屏障。山上有八路军兵工厂、弹药库、粮库和一个独立守备团。此时,山纵政治部秘书长吴仲廉、省妇联执委、省参议会驻会议员陈若克及总行部分人员恰好也撤到了此处。日军包围大崮山后,先是以飞机、大炮对山顶猛烈轰炸。然后发起连续进攻。经二天激战,我方伤亡重大,于8日深夜突围。突围后,陈若克被俘牺牲。

29日夜,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省战工会机关及抗大一分校两个大队等千余人转移到蒙山东部大青

山,次日拂晓,即被敌一个混成旅团合围。激战至下午二时,大部分机关人员分别突出重围转移到西蒙山。此役伤亡甚大: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一一五师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人等 300 余人牺牲,省战工会副主任李澄之等人被俘,山东分局组织部长李林和山东分局主任秘书兼统战部长谷牧负伤。

大“扫荡”期间,总行除少数人员随战工会行动外,大部分疏散到泰山和泰南区。为了便于大家更为详细地了解总行当时的情景,我们摘录贾洪撰写的《回忆抗战时期的北海银行总行和鲁中分行》^②一文片段如下:

“开始时银行出纳科跟着战工会随部队(一一五师师部)行动,从沂南马牧池出发,走了两夜到大崮山附近,发现敌人包围上来,指挥部命令直属队(包括战工会机关)要立即轻装,急行军连夜转移到敌人包围圈外。这时银行有三匹驮钱的骡子必须精简,艾楚南同志命令我和宋锡英、辛毅同志,带着这三匹驮钱的骡子到大崮山上隐蔽。我们上山后就把带的法币(兑换回来的旧法币)埋藏起来,把金子(共八十多两)分别带在身上。当时认为大崮山是有名的天险,山上准备好的粮草充足,只要坚守万无一失。不料敌人集中火力,飞机、大炮、机枪猛烈攻击,寨门的防御工事全被摧毁,守卫的一个团伤亡不少。到黄昏时一支敌军冲上来,占领了崮上的一个小山头,看来已无法守住,下半夜就组织撤下来,团长不让我们跟他们行动,我们三人就带着金子插回沂南中心根据地,因为那里群众条件好。但回去后敌人天天清剿,村子里找不到群众,在山头上露宿了六天。幸好一一五师师部及山东分局也回来了。我们见到分局秘书主任谷牧同志,他赞扬我们金子带出来,保管得好。并把我留下来,宋、辛二位同志安置到地方上去了。我记得第三天谷牧同志在指挥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又过了几天,在东蒙山的大青山,一一五师直属队、山东分局、战工会机关被敌人合击,机关被冲散,牺牲了不少同志,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牺牲,粮食局长王子文同志负伤,财政处李子敬同志牺牲。我侥幸在枪林弹雨中冲了出来,带的金子也未损失。”

此次扫荡历时五十余天。总行绝大多数人员疏散,极少部分人员随战工会突围转移。斗争环境极其残酷。如果说钞版遗失或损坏,一点也不奇怪。根据前面贾洪的回忆,当时连携带的法币后来都埋藏了,钞版之类的物品肯定不会一直随身携带。有可能接到敌情后就将钞版和印钞机分别埋藏;也可能先是携带行军,11月5、6日接到指挥部轻装令后就地埋藏,或是为防落入敌人之手损坏后埋藏等等。仓促埋藏,后来找不到亦属正常。扫荡过后,总行印钞厂迁往万良庄,可能在这里根据原设计重新制版印制民国三十年五元券。

认定总行在万粮庄继续印制民国三十年五元券是有理由的。因为总行印钞厂在万粮庄印制了民国三十

一年五分、二角、一元、二元、十元券,缺少民国三十一年五角、五元券。而五元券又是一元至十元券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过度币,总行不会不印。唯一的解释就是总行在万粮庄继续印发民国三十年五元券。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将“五元券”的印发分为两个时期。从公告发行到日军大扫荡前为第一时期,扫荡过后至最终停发为第二时期。第一时期历时仅十余天,发行量肯定大不了。大多数“五元券”都是第二时期印发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十八个伍字”券存世量极少,且号码较小;“十四个伍字”券存世量稍多,且号码较大。“十八个伍字”券系总行第一时期印发,“十四个伍字”券为第二时期印发。

从开始发行民国三十年五元券到 1942 年底《大众日报》报道假票特点,历时一年多。时间久了,对早期发行的品种特征有所遗忘亦属正常,误真为假也是可以理解的。

“浅黄色底纹券”(见图 5)肯定是旧时物,其纸质及印刷工艺基本上与常见的“十四个伍字”券相近,但是,重要的区别是天坛图景的台阶为阴影,颜色偏浅。



图 5

依据战工会《关于查禁伪造北海本币的指示》及 12 月 23 日的《大众日报》可以定为假票。不过,根据其印鉴、正面上方之两圆圈下均有一大黑点左右相称及背面四角上之“5”字内方块两端有小点两行等特点,依据战工会反假指示及 12 月 25 日的《大众日报》又可定为真品。我们倾向于将此票定为假票。▲

注 释

①仅《沂蒙党史大事记》持此说。《中共临沂地方史》、《临沂市军事志》、《临沂百年大事记》均说是 4 日。由于后者叙述中均言激战二日,于 7 日晚突围,不能自圆其说。故采纳《沂蒙党史大事记》所说。

②《北海银行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 35 页,山东金融学会编辑。

鄂东南革命根据地货币近年新发现

张或定 周明贵

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红色割据区域,其中开辟时间较早的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大部分区域在湖北境内,遍及湖北南部和东部广大地区。它较之于湘东北、赣西北苏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坚持时间最长;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客观上又注定其在革命进程中会发挥出极为重要的作用。

鄂东南革命根据地,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银行较早和发行货币种类最多的一个地区,其中又以早期发行的货币最为罕见,已成为革命根据地货币爱好者和收藏者,十分青睐的品种。多年来,极少有新品种发现。

近年来,在鄂东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湖北阳新县境内,由于新农村建设和旧房拆迁,却连续发现多种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早期发行的纸币,引起革命根据地纸币爱好者和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和兴趣。

笔者曾在《中国钱币》和《中国收藏·钱币》杂志上分别做过介绍,此后,又有新的发现,为此,这里再做一些补充,进行全面介绍。

先后发现的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纸币,分别是1930年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行伍佰文、鄂东总行金龙分行伍佰文、1930年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壹串文、1931年鄂东总行福丰分行贰串、鄂东总行沿江分行贰串文、1930年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铜元伍佰文、“另换新版”1931年鄂东农民银行铜元壹串以及1931年鄂东南工农兵银行伍串等纸币。

以上这几种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早期纸币均系近年新发现,在《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中国历史货币大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货币》、《中国钱币大辞典·革命根据地编》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等文献中,均未见图片刊载,是鄂东南革命根据地货币中颇为重要又值得深入研究的新品种,也是鄂东南革命根据地货币的重要补充,其历史内涵极为丰富。

一、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阳新县曾是鄂东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之一。当年,鄂东南根据地范围很广,遍及湖北、江西两省长江两岸附近地区,先后包括湖北的阳新、大冶、鄂城、武昌、咸宁、通山、崇阳、通城、蒲圻、蕲

水(浠水)、蕲春、广济、黄梅;江西的九江、修水、星子、德安、瑞昌、武宁等地区。

1927年,在湖北及相关地区,相继发生许多重大政治、经济、军事事件,如广州国民政府迁移武汉成立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现金集中”,“第二次北伐”,“夏斗寅叛变”、“宁汉分裂”,“汪精卫七月十五日叛变”,“大革命失败”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爆发等。南昌起义后不久,8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会后,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在全省举行武装暴动,并将全省划分为七个暴动区域。阳新、大冶属鄂东区,咸宁、通山、蒲圻属鄂南区。同时,省委派出大批干部恢复各暴动区内各县党组织。秋收暴动失败后,省委再次派员来阳新、大冶组建中共阳(新)大(冶)县委,继续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巡视员吴致民来阳新,撤消阳大县委,成立阳新县委。同年7月,省委决定成立阳(新)大(冶)区特委,辖阳新、大冶、鄂城。这一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各基层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简称“四抗”)斗争。

1929年2月,中共阳新县委成功策动小箕铺民团起义。7月,成立工农红军十二军。9月,红五军第五纵队挺进鄂东南地区,并横扫阳新各地反动武装。12月,程子华、白玉杰领导的“大冶兵暴”和“阳新起义”成功。

1930年1月,阳新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5月,中共鄂东特委成,阳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与此同时,通山、大冶、鄂城、蕲水、蕲春、广济、黄梅等地的土地革命相继进入高潮。6月,红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红三军团建立。10月,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至此,鄂东革命根据地形成。

1931年7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成立,鄂东、鄂南特委撤销,成立中共鄂东南特委,辖阳新、大冶、通山、鄂城、咸宁、蒲圻、崇阳、武宁、瑞昌等县,原鄂东特委所属江北四县划鄂豫皖苏区。

1932年1月,鄂东南特委撤销,分设鄂东道委、蒲圻中心县委。1932年8月,撤销赣北特委、蒲圻中心县委,成立鄂东南道委,辖阳新、大冶、通山、鄂城、蒲圻、咸宁、崇阳、通城、嘉鱼、九江、瑞昌、武宁、星子、德安十

四个县,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

二、阳新县各区及县级苏维埃政府的设立

阳新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由下而上逐步进行的,首先建立的是村、乡、区等各级苏维埃政府,最后县苏维埃政府才建立。1929~1930年期间,各区苏维埃政权分别成立,1930年1月5日,阳新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5月,阳新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

根据有关史料整理的各区及县级苏维埃政权建立情况,见表1。

表1 阳新县及各区苏维埃政府设立时间表

名称	地址	负责人	设立时间
福丰区苏维埃政府	石家大桥	曹均衍	1929年3月
湖市区苏维埃政府	木港长冲源	王能德	1929年10月
龙燕区苏维埃政府	龙港镇	袁凤鸣	1929年10月
大风区苏维埃政府	三溪口彭杰	刘南川	1929年11月
金龙区苏维埃政府	曾港中堰祠堂	尹田卿	1929年12月
沿江特区苏维埃政府	袁广	黄家高	1930年6月
沿河区苏维埃政府	辛潭铺、排市	柯海清	1930年12月
阳新县苏维埃政府	大风区徐立中	洪科银	1930年5月
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	阳新县太子庙	刘怀玉	1930年10月
		曹玉阶	1930年10月

三、阳新县各区农民银行的设立

鄂东南根据地是湘鄂赣根据地中的一个比较独立的部分,开辟较早,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银行较早和发行货币种类最多的一个地区。在根据地建立初期,各县、区就陆续成立了农民银行、工农银行、工农兵银行,各银行独立营业,从1930年起发行货币。

在阳新县各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同时,各区也纷纷建立农民银行,并发行各自的纸币,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中有介绍:

“鄂东区各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经济建设的各项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为了打击各杂钞劣币,保护人民群众利益,促进苏区经济建设和方便市场贸易,从1929年冬起,各区、县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纷纷筹建苏维埃银行。作为鄂东苏区的中心区域阳新县,不仅县苏维埃政府建立农民银行,而且金龙、福丰、龙燕、大风、沿河、湖市和沿江特区均先后建立了农民银行,形成了一个遍及全县的苏维埃金融体系。……1930年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了逐步实现货币的统一发行,加强货币管理,便撤销了阳新县苏维埃农民银行,在阳新县金龙区大王店组建鄂东农民银行总行(1931年春迁往龙港),原阳新县各区农民银行改为其分行。鄂东农民银行总行隶属于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财政部,由曹信(性)白任主任,下设会计、出纳、造票、收发等股。”

《湖北省志·金融》亦有记载:

“1930年初,湖北阳新县的五个苏区都成立了农民银行,发行纸币,各区可互相流通;同年9月,‘鄂东

农民银行’在阳新县大王店成立,银行主任曹信(性)白,后因国民革命军郭钹栋部进攻苏区太子庙,银行迁到龙港;11月合并金龙、福丰、大风、龙燕、湖市五个区的银行,成立‘鄂东南工农兵银行’。中共湘鄂赣省鄂东南办事处确定工农兵银行基金30万元,行址设在阳新龙港。银行内部设出纳、会计、造票、收发四股,配有经理、主任各一人。最初是鄂东南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刘杰三兼银行经理,1931年由陈迪光兼任。……这年(1931年)红军连续三次取得反‘围剿’胜利,鄂东南根据地不断扩大,为了适应当时形势需要,苏维埃政府于1932年统一苏区货币,改‘鄂东南工农兵银行’为‘鄂东工农银行’,限期将大冶、通山、武宁、瑞昌、金龙、福丰等银行发行的纸币一律收回,统一使用鄂东工农银行纸币;不久,又将‘鄂东工农银行’改称‘鄂东南工农银行’,鄂东工农银行纸币便停止发行。”

《阳新县志》中的记载更为详细:

“1929年冬,先后建立金龙、福丰、龙燕、大风、湖市5个区农民银行。各区银行有员工4人,分司主管、会计、出纳、造票之职。1930年5月,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后,建立阳新县农民银行,统一领导区银行,统一发行货币,开展存款、贷款业务,数月内存款8万元。6~9月,又相继设立沿河区和沿江特区农民银行。9月5日,鄂东革命委员会在大王殿设立鄂东农民银行总行。12月,银行随鄂东政权机构转移太平地。1931年1月,再迁往龙港,更名鄂东南工农兵行银。下辖11县银行。总行有银币5.6万元,黄金270两,元宝20余个,手镯、项圈及各种碎银4万余两,铜元1万多串(6串折银元1元)。内设会计、出纳、储蓄、借贷等部,并建立制钱厂。县农民银行储蓄额8万元。9月,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成立。1932年初,鄂东南工农兵银行易名鄂东工农银行。春夏之交,复名鄂东南工农银行。1933年1月,龙港失陷,鄂东南工农银行转移通山县留嘴村继续营业。1934年,主力红军参加长征,各级银行停业。”

根据以上文献和有关史料整理的阳新县各区及有关银行设立情况,见表2。

表2 1929~1932年根据地各级银行设立时间表

银行名称	地址	负责人	开办时间
金龙区农民银行	金龙区下堰村	曹子方	1929年冬
福丰区农民银行	福丰区石家大桥	程正向	1929年冬
大风区农民银行	三溪口明家祠堂	杨方明	1930年春
龙燕区农民银行	龙港黄桥	刘道富、陈桂生	1930年春
湖市区农民银行	木港星潭铺	陈月清	1930年春
沿河区农民银行	龙港新潭铺	杨秀松	1930年6月
沿江特区农民银行	黄颡口冯五庄	冯常浦	1930年9月
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	三溪口徐立冲	胡坤龙	1930年5月
鄂东农民银行	金龙区大王店	曹性(俊)白	1930年9月
鄂东南工农兵银行	龙港正街	刘杰三、阮筱涛	1931年10月
鄂东工农兵银行	龙港正街	刘杰三、陈迪光	1932年3月
鄂东南工农银行	龙港正街	罗文东、蔡正华	1932年4月

四、阳新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纸币

2010年11月,湖北阳新县陈村在维修本村陈家祠堂时,发现四张1930年“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纸币,多有破损票,痕迹斑斑,此系首次发现,极其罕见,纸币之上所盖印章之多,令人称绝。

笔者有一张较为完整的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钱票,竖式票,铅印,手工厚纸(含竹质纤维较多),宽82毫米,高177毫米(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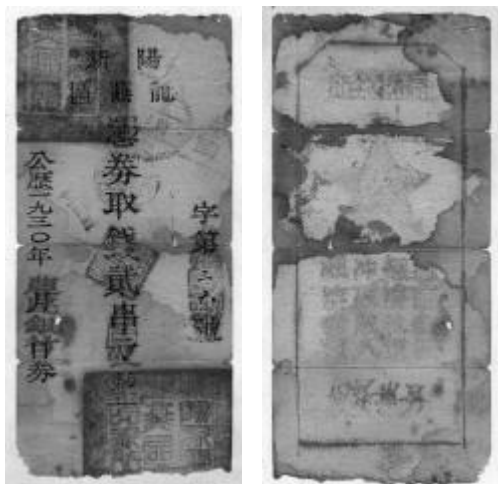


图1 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票

票面上的文字,均为铅字印刷,分上、下两部分,即天格和地格两部分,如下:

阳 龙	字第三四号“农民银行”(阴文章)
燕 票	券取钱贰串文整
新 区	公历一九三〇年月日“农民银行”(阳文章)

上部,天格内文字,横向排列二行:“阳新”,“龙燕区”,即发行地;

下部,地格文字,竖向排列三行:

右侧,为填写编号位置,“字第三六号”,无冠字。其上端,盖有一枚红色长条形骑缝章,文字不清,在数字处,盖有一枚红色长椭圆形阴文押数章:“农民银行”。

中部,为填写面额位置,“凭券取钱贰串文整”。文字之上,自上而下盖有三枚押款章,分别是,蓝色齿边椭圆形“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印章、红色圆形“刘道富印”印章和红色方形(菱形加盖)“陈桂生章”印章。

根据前述根据地各级银行设立时间简表可知,刘道富和陈桂生为龙燕区农民银行负责人。

左侧,为填写发行时间位置,“公历一九三〇年月日”,下盖一枚红色隶书落地章“农民银行”。也就是说,该票发行于1930年。

在钱票的左上端和右下端,各盖有一枚红色方形篆书印章:“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印”,显然,此两枚印章还具有骑缝章的作用。

背面图案为一幅长六角形单边红色边框图,并盖

有文字章和图案,自上而下分别是:“农民银行”、“五角星”(中部似有白色镰刀斧头图案)、“拥护苏区经济政策,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及“另换新板”诸字。

从印刷的文字和印章来看,该票系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于1930年发行,面额为贰串文。此前还发行有另一版式的钱票。

此外,钱票正面之上,还有其他印章,如“十一月出”(蓝色印章)等。

五、龙燕区苏维埃政府与刘道富

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钱票上,第一个押款章为“刘道富印”。刘道富不仅是龙燕区农民银行的主任,而且还曾担任过龙燕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史料记载,龙燕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29年10月,其地址在今阳新县龙港镇红军街。1930年5月阳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前,隶属于中共阳新县委,下辖朱湾、湾塘、小港、曹坪、柯家园、骆家梁、桂源、下容、中罗、李家湾、上曾及通山县燕厦、洋湖、尖山、芦田、车田、淡家祠、沙店、湖畔等36个乡苏维埃政府。1930年9月,阳新县调整行政区划,龙燕区撤销,划分为龙港、燕厦、杨林三区。

龙燕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先后由刘南川、刘道富、肖绪文担任。区苏维埃政府设执行委员9人,候补委员3人,常务委员5人,内设主席1人、副主席1~3人。执行委员中设军事、财务、裁肃、文化、土地等5个委员。

龙燕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道富在任期间,经常深入苏区乡村,随时随地帮苏区人民解决各种困难,深受人民爱戴,当时在龙燕苏区流行这样的歌谣:

“一字写,一横长,道富主席到我乡,头戴一顶麦草帽,脚穿草鞋走忙,为我工农谋解放。”

据《阳新县志》等文献记载:

刘道富(1891~1934),阳新县龙燕区徐家畈人。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四抗”小组长、乡没收委员会主任。1929年,任龙燕区第十乡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0年,调区农民银行主任。1931年,当选为龙燕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称赞区政府是“提包政府”。1932年秋,带领区直机关干部与游击队。转移至后脑山坚持游击战争。1934年5月,指挥界首山阻击战,负重伤被捕,经受酷刑。6月,慷慨就义。

由此可知,1930年时,刘道富担任龙燕区农民银行主任,这就是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钱票上第一枚押款章为“刘道富印”的真正原因。显然,陈桂生当时为龙燕区农民银行副主任。1931年,刘道富升任龙燕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六、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的发行时间分析

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发行于1930年何时,亦应

分析。显然,该票应发行于龙燕区设立期间以及鄂东农民银行成立之前。

(一)从鄂东农民银行成立时间上分析

如前所述,1930年初,湖北阳新县的五个苏区都成立了农民银行,并发行纸币,各区可互相流通;龙燕区就是这五个区之一。也就是说,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钱票发行于1930年初或以后。

又因为鄂东农民银行是在各区农民银行的基础上,于1930年9月在金龙区大王店正式成立,曹性白任行长。此后,开始以鄂东农民银行的名义发行纸币。因此,农民银行贰串文纸币应发行于1930年9月之前。

(二)从龙燕区设立时间上分析

如前所述,龙燕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30年5月,因此,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纸币只能发行于1930年5月龙燕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

由于1930年9月,阳新县行政区划作了调整,龙燕区撤销,划分为龙港、燕厦、杨林三区,龙燕区的存在时间大约仅有四、五个月。此后,不可能再以龙燕区农民银行的名义发行纸币。因此,农民银行贰串文纸币应发行于1930年9月之前。

也就是说,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纸币应发行于1930年5~9月期间,前后大约四、五个月时间。

七、阳新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钱票的发现,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印章齐全,史料价值极高

该票一个重要特点是,各类印章齐全,正面有八、九枚,七、八种之多。就其性质而言,其中包括骑缝章、押数章、押款章、落地章以及说明文字防伪章等。

在这些印章中,如两种“农民银行”印章,方形和椭圆形“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印章,龙燕区农名银行主任“刘道富印”和副主任“陈桂生章”印章以及大型五角星和说明文字印章等,其中许多都是首次出现,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之极高,历史内涵亦极为丰富。

在根据地纸币中,加盖如此之多的印章,实属罕见,如鹤立鸡群。

此外,这些印章的出现,亦澄清了“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壹千文手写钱条”所盖一些印章的历史真实面目。

目前所见,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纸币中,还有一种仅见的“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壹千文手写钱条”(图2),该票录载于《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一书,正面文字及布局情况如下:

难(一半)
条 兑 铜 元 壹 千 文 正
难字五三号 庚午(印章)“龙燕区农民银行代办所”(印章)条

庚午,为年号章盖印,即庚午年(1930年)。该条面

额部分盖有四枚印章,其中圆形印章应为龙燕区农名银行主任“刘道富印”印章,方形章应为龙燕区农民银行副主任“陈桂生章”印章。

(二)独树一帜的革命根据地铅印纸币

在湘鄂赣根据地纸币中,就其印刷特征和材质来看,目前所见,主要有油印纸币、手写纸币和石印纸币等三种类型,尤以石印纸币为多,铅印纸币几乎还未见到。

鄂东南根据地货币的材质和印刷特征,亦是如此,正如史料所载:

“1929年初,金龙、福丰、龙燕、大风、湖市五个区各设有一个银行,都发行了银行券,票币的形式虽不相同,但各区可以互相通用。1929年9月,金龙区大王店(殿)建立了‘鄂东农民银行’;发行了一百文、二百文、一串至五串等几种纸币。纸币是用牛皮纸做的,最初是用石印印的。苏区用苏区的纸币,国民党的纸币只去白区买货物用。……金龙区发行了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串至五串等几种纸币。大风区发行了一串、五百文两种纸币(红色)。湖市区银行发行了一(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串、二串、五串等多种纸币,票面为‘中国工农银行’。该区五百文票币是牛皮纸印的,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绿色;一串的正面和反面都是黑色;二串的正面是红色,反面是绿色;五串的与一串的相同。……鄂东南工农兵银行1931年发行了五百文的、还是油印的,黑色,背面没有文字和花纹。1932年发行的各种钞票,均为石印,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和文字、花纹。印银行票的机器是从阳新金兰堂印刷厂没收来的。”

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贰串文钱票,为铅印,独树一帜,极为少见,成为根据地货币中铅印纸币的典型代表。

八、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行伍伯文纸币

2010年夏季,湖北阳新县泉友杨健和张小明先生,在当地收藏品市场上发现一张“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行伍伯文”纸币。2011年8月,又有一张在某网站上出现,被笔者买去。目前所知,鄂东南革命根据地货币中,此沿江特区农民银行纸币,亦系首次发现,亦十分罕见。

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行伍伯文纸币,为横式票,石版印刷,手工纸,长135毫米,宽90毫米(图3)。

该票正面文字及布局情况如下:



图2 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壹千文手写钱条

阳新县沿江特区				
年	伍	农	伍	字
月	伯	民	伯	第
日	文	银	文	1
条		行		0
				4
				6
				号

版新换另



图3 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行伍佰文票

在右侧“伍佰文”诸字处，盖有一枚菱形红色印章：“鄂东总行沿江特区分行”，“鄂东总行”，即鄂东农民银行总行。此印章系首次出现。

右侧，有编号：“字第1046号”，无冠字。

左侧，有“年、月、日、条”诸字。未填日期，但“条”字上方盖了一枚“农民银行”红色落地章。说明，此票由“（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行”发行。

纸币的下方，印有“另换新版”四字，说明此票为新版印刷。此处，盖了一枚方形红色骑缝章，应是一枚银行名称公章，可惜，文字不清。

背面，为空白，但书写有“记工分”之类的文字，在



图4 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行伍佰文票

上端横书“阳新县沿江特区”诸字，下部中间位置有“农民银行”四字。其两侧，各有面额“伍佰文”三字。注意，其中“伯”字写法，不是“佰”，这是清代及民国时期湖北地区民间的习惯写法，符合历史。

若“伍佰文”写成“伍佰文”，则此票的真实性就值得斟酌了。

在右侧“伍佰文”诸字处，盖有一枚菱形红色

印章：“鄂东总行沿江特区分行”，“鄂东总行”，即鄂东农民银行总行。此印章系首次出现。

右侧，有编号：“字第1046号”，无冠字。

左侧，有“年、月、日、条”诸字。未填日期，但“条”字上方盖了一枚“农民银行”红色落地章。说明，此票由“（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行”发行。

纸币的下方，印有“另换新版”四字，说明此票为新版印刷。此处，盖了一枚方形红色骑缝章，应是一枚银行名称公章，可惜，文字不清。

背面，为空白，但书写有“记工分”之类的文字，在

折叠处，有条状贴纸。看来此票后来曾作为解放后农村计工分用纸使用。

笔者的一张阳新县

沿江特区农民银行伍佰文票（图4），其特征相同，宽82毫米，长145毫米，编号为1037。

本票的发行者是“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行”，却为何盖有一枚“鄂东总行沿江特区分行”印章，显然另有原因，值得分析。

九、沿江特区农民银行伍佰文发行时间分析

阳新县沿江特区成立时间比龙燕区等区为晚，存在时间很短。据《阳新县志》记载：

“沿江特区苏维埃，1930年6月成立，机关设在袁广。主席柯海清，副主席谈会科，执行委员7人，隶属鄂东革命委员会，下辖金厢（驻冯五庄）、碧庄（驻八户张）、城南（驻棋盘村）、辛亭（驻黄颡口）、金盆（驻金盆架）、筠山（驻筠山庙）7乡苏维埃。12月，被国民政府二十六师攻陷，区乡苏维埃不复存在。”

由此可知，在1930年6~12月期间，沿江特区大约存在半年时间，不足6个月。

如前所述，沿江特区农民银行于1930年9月在黄颡口冯五庄成立，主任为冯常浦；其成立时间在阳新县农民银行成立之后，几乎与鄂东农民银行同时成立。

也就是说，沿江特区农民银行成立后不久，鄂东农民银行也相继成立，阳新县农民银行立即被鄂东农民银行所取代，此时，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行亦改为鄂东农民银行沿江特区分行。因此，当将印好的原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行纸币再次利用时，就再加盖一枚“鄂东（农民银行）总行沿江特区分行”印章。

由此判断，此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行伍佰文纸币，发行于1930年9~12月期间，大约三个多月之内。

十、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壹串文票

此前所知，“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纸币，仅见一种“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贰串文”纸币，此处介绍的“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壹串文”纸币，为新发现的面额稍小的一种。

（一）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壹串文票

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壹串文票，为横式票，长145毫米，宽95毫米（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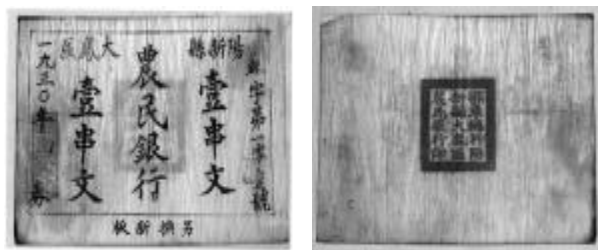


图5 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壹串文票
纸币正面文字分布如下：

阳新县大风区				
一九三〇年	壹	农	壹	苏
鄂东总行	串	民	串	字
分券	文	银	文	第
		行		壹
				零
				三
				五
				号

版新换另

纸币中间有“农民银行”四字,竖向分布。其上方有“阳新县”和“大风区”诸字,横向分布。其左右两侧各有面额文字“壹串文”三字。

纸币左右侧有冠字和编号:“苏字第壹零三五号”。纸币左侧印有发行时间:“一九三〇年,券”诸字,“券”字上方盖有一枚红色印章:“鄂东总行”。纸币下方有“另换新版”四字,说明此前发行有另一版式的纸币。

纸币背面为素背,但盖有一枚红色印章:“鄂东总行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印”。

此前,所见的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贰串文纸币,尽管该票之上写有冠字和编号,但是却无任何印章,说明此票也许并未发行,是一张未发行票。

然而,本票之上,不仅有冠字和编号,还有“鄂东总行”和“鄂东总行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印”两枚印章,显然,本票为发行票,其价值应更高,而这两枚印章亦系首次发现,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

(二)发行时间分析

鄂东总行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壹串文纸币之上印有“1930年”字样,是否发行于1930年,应当分析。

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壹串文的发行日期,应符合以下两个重要条件:

其一,应在阳新县大风区存在期间。

据《阳新县志》记载:

“大风区苏维埃:1929年11月建立,机关设三溪。主席尹田卿,副主席袁道坤,执行委员7人。辖率州、横山、霞陂、罗北口、长乐、龙泉、有才、熊明湾、冠塘、北里、太平、杉木、石角、北土塘、大王庙、钟山、孔志、辛潭18乡苏维埃。1931年9月,大风区划为龙泉、三溪、有才、太平、石角5区,分设区苏维埃。”

由此可知,大风区成立于1929年11月,到1931年9月,因区划变动而不复存在。

也就是说,鄂东总行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壹串文的发行日期,应在1929年11月到1931年9月期间之内。

其二,应在鄂东总行存在期间。

钱票上的“鄂东总行”印章,说明该票是在鄂东总行成立期间发行的。

如“前文”所述,1930年9月,在阳新县各区农民银行的基础上,“鄂东农民银行”在阳新县大王店成立。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合并金龙、福丰、大风、龙燕、湖市五个区农民银行的基础上,1931年10月,又成立了“鄂东南工农兵银行”。

后来,1932年3月,鄂东南工农兵银行又改名并正式挂牌为“鄂东工农银行”,地址仍在龙岗正街。但是,过不久,1932年4、5月间,又恢复了原来的“鄂东南工农兵银行”的名称。

也就是说,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壹串文纸币发行时间,是鄂东总行在1930年9月鄂东总行成立之后到1931年10月期间,利用原来印刷的1930年版阳新县大风区农民银行壹串文纸币,并加盖鄂东总行的有关印章后,再次发行的。

十一、鄂东总行金龙分行伍伯文纸币

2012年5月,北京雍和嘉诚春季拍卖会上,一张“鄂东总行金龙分行伍伯文”纸币拍品,成交价高达2万多元。笔者从阳新县泉友处了解到,该票发现于2006年,仅此一张,系阳新县大王店一位李姓商人在当地发现,后转卖给武汉商人,又几经转手而到拍卖会上。

鄂东总行金龙分行伍伯文纸币,为横式票,石版印刷,无发行时间(图6)。



图6 鄂东总行金龙分行伍伯文票

该票正面文字及布局情况如下:

鄂	东	总	行	伍	伯	文	字
号	文	伯	伍	月	日	条	

显然,该票的发行时间应在金龙区成立期间。

据《阳新县志》记载:

“金龙区苏维埃:1929年12月建立,机关设曾港中堰祠堂,后移太子庙。主席黄家高,副主席程功波。设军事、土地、裁肃、文化、财政、粮食、妇女7名执行委员。辖大箕铺、小箕铺、太子庙、大王殿、漳源口、筠山、12乡苏维埃。1931年11月,被国民政府军二十六师攻陷,区苏维埃解体。”

由此可知,阳新县金龙区存在时间,在1929年12月到1931年11月期间。

又因鄂东农民银行于1930年9月在金龙区大王店正式成立,因此,鄂东总行金龙分行伍伯文纸币的发行时间,在1930年9月到1931年11月期间,大约有一年零二个月。

十二、鄂东总行福丰分行贰串票

此前,未曾见有鄂东总行福丰分行纸币实物出现,此鄂东总行福丰分行贰串票,为首次发现。

鄂东总行福丰分行贰串票,为横式票,长130毫米,宽80毫米(图7)。



图7 鄂东总行福丰分行贰串票背面

纸币正面文字分布如下：

一	行	总	东	鄂	冬
九	式	福	式	字	
三	串	丰	串	第	
一		分		八	
年		行		五	
				八	
条				号	

鄂东总行福丰分行贰串票中部,有“福丰分行”四字,其上端,印有“鄂东总行”诸字。其左右两侧,分别有面额“贰串”二字。

鄂东总行福丰分行贰串票右侧,有编号:“冬”字 744 号;

左侧,为发行时间:“一九三一年”。其下端,“条”字上部空白处,盖有一枚长方形落地章:“福丰区农民银行”,“福丰区”为横排,“农民银行”为竖排。说明,该票由“鄂东总行福丰区农民银行”发行。

钱票背面,未印文字和图案,却盖有一枚红色“鄂东总行福丰分行印”方形印章。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鄂东总行福丰分行有两种称呼:

其一,“鄂东总行福丰区农民银行”;

其二,“鄂东总行福丰分行”。

鄂东总行福丰分行贰串票,发行于 1931 年何时,应当分析。

据《阳新县志》记载:

“福丰区,1929 年 3 月建立,机关设在石家大桥,主席曹衍询,副主席程生财,石立俭,执行委员 7 人。辖石华道、荻田桥、石门头、白沙铺、盐埠头、冯家五庄、八户张、汪武颈、潘桥、喉咙嘴、张谷才、贾清伍、碧庄等 14 乡苏维埃。1930 年,国民政府军入侵,区苏维埃先后转移七峰山、排市等地。未几解体。”

由此可知,阳新县福丰区于 1930 年底,或 1931 年初解体。

如前所述,“鄂东农民银行”成立于 1930 年 9 月,同时,“阳新县福丰区农民银行”也被改制为“鄂东总行福丰分行”。而“鄂东总行福丰分行”,也会随着阳新县福丰区的解体,而逐步消失。

因此,鄂东总行福丰分行贰串票很可能发行于 1931 年初的开年不久。

十三、鄂东总行沿江分行贰串文票

在鄂东南革命根据地货币中,与阳新县沿江特区有关的纸币,仅见前面所介绍的一种“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行伍伯文”,这里介绍的“鄂东总行沿江分行贰串文”,为其第二种。

(一)鄂东总行沿江分行贰串文票

鄂东总行沿江分行贰串文票,为横式,石版印刷,无发行时间,长 140 毫米,宽 90 毫米(图 8)。



图8 鄂东总行沿江分行贰串文

该票正面文字及布局情况如下:

	行	总	东	鄂	赤
年	贰	沿	贰	字	
月	串	江	串	第	
日	文	分	文	八	
条		行		五	
				八	
				号	

版新换另

在右侧“贰串文”诸字处,盖有一枚椭圆形红色印章:“鄂东总行沿江特区农民银行”,“鄂东总行”,即鄂东农民银行总行。此前曾见有一枚菱形“鄂东总行沿江特区分行”印章(见前述),此章也系首次出现。

右侧的冠字和编号为:“赤字第八五八号”。

左侧有“年、月、日、条”诸字。未填日期,但诸字之上盖了一枚长方形“特区农民银行”红色落地章。

右侧边沿处,盖了一枚长方形“鄂东总行”骑缝章。

纸币的最下方,“印有另换新版”四字,说明此票为新版印刷。

从这几种银行印章分析,此票系“鄂东农民银行总行沿江分行”发行。

鄂东总行沿江分行贰串文票背面为光背,但盖了一枚大型五角星“鄂东总行沿江分行”印章,该印章具有鲜明的红色政权图案特征,颇具特色,且十分醒目。五角星中部,为镰刀斧头图案,五角星根部,分别有“鄂、东、总、行和沿江分行”诸字。

此印章是又一种“鄂东总行沿江分行”印章,也系首次发现。

由此可知,已有三种与沿江特区银行有关的印章出现。这三种印章的出现,说明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鄂东农民银行总行成立后,原“阳新县沿江特区农民银

行”经改制后,有三种称呼:

一种称呼是:“鄂东总行沿江特区农民银行”;

另一种称呼是:“鄂东总行沿江特区分行”;

再一种称呼是:“鄂东总行沿江分行”。

这三种银行名称同时存在,此前却鲜为人知。

(二)发行时间分析

鄂东总行沿江分行贰串文票,既然是由“鄂东农民银行总行沿江分行”发行,其发时间。应符合以下两个重要条件:

其一,应在鄂东农民银行总行存在期间。如前所述,鄂东农民银行成立于1930年9月。到1931年10月时,被改建为鄂东南工农兵银行。也就是说,鄂东总行沿江分行贰串文票的发行时间,有可能在1930年9月到1931年10月期间。

其二,应在阳新县沿江特区存在期间。同时,鄂东总行沿江分行贰串文票的发行时间,也应在阳新县沿江特区存在期间。如前所述,阳新县沿江特区设立于1930年6~12月期间,大约存在半年时间,不足6个月。

从必须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判断,此鄂东总行沿江分行贰串文票的发行时间,应在1930年9~12月期间,大约三个多月之内。

十四、1930年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铜元伍伯文钱条

此前所知,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纸币,仅见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铜元贰串文,为横式票。

2015年4月,在阳新县集得一张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铜元伍伯文钱条(图9),为竖式票,单面木刻印刷,长160毫米,宽75毫米,此系首次发现。



图9 1930年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条取铜元钱伍伯文

该票正面文字及布局情况如下:

阳 新 县 苏 维 埃 政 府 农 民 银 行	和字第四伍九号 条取铜元钱伍伯文整 一九三〇年 月 日 “农民银行”(印章)条文	憑 条 即 兌 銅 元 伍 伯 文
--	--	---

在“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文字处,盖有一枚菱形印章:“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

编号为,和字第四伍九号;

面额为双面额,分别为“条取铜元钱伍伯文”和“憑条即兑铜元五伯文”。在前面额文字上,该有一枚长方形篆书“农民银行”章。在革命根据地货币中,“双面额”标注形式十分罕见,此为该票的一大重要特征。

发行时间为“一九三〇年”,其旁盖有一枚蓝色“发行日期章”,“□月廿一日”。落地张为一枚“农民银行”文字章。此“发行日期章”的存在,极为重要,它更加确认和证实了此种版式的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铜元伍伯文钱条的真实性。

因此,此票的发行时间,应在1930年5月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成立到1930年9月鄂东农民银行成立之前这段期间,大约五个月内。

十五、1931年鄂东农民银行铜元壹串

此前所知,鄂东农民银行纸币,有1930年版贰串文、1931年壹串文和1931年贰串文三种纸币。这次发现的鄂东农民银行纸币,为1931年鄂东农民银行铜元壹串文的另一种版式。正如,票面文字所说明的那样,为“另换新版”。

从文字的书写特征和风格上看,此“另换新版”票和前一种1931年版鄂东农民银行壹串文票比较,其文字似由同一人书写而成,尤其是“鄂东农民银行”中“鄂东农”三字,笔法、风格几乎完全一致。

此“另换新版”1931年鄂东农民银行铜元壹串文票,为横式,石版单面印刷,长130毫米,宽85毫米(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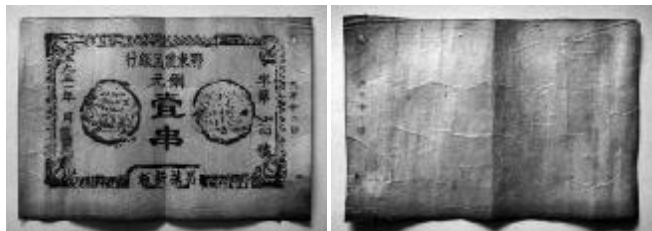


图10 1931年鄂东农民银行铜元壹串

该票正面文字及布局情况如下：

一 九 三 一 年 月 日 农 民 银 行	行 银 民 农 东 鄂	字 第 3 1 8 号	三 月 十 九 日
	铜元		
	壹		
	串		
	版 新 换 另		

该票编号为，□字第 318 号，无冠字；面额为铜元壹串，发行时间为 1931 年 3 月 19 日。其中“3 月 19 日”，由蓝色“发行日期章”所盖。

此“发行日期章”的特征与风格，与其他鄂东南根据地纸币一致，更加确认和证明了此种版式的鄂东农民银行铜元壹串文票的确实存在。

显然，此票的发行期间应在 1930 年 9 月鄂东农民银行成立到 1931 年 10 月鄂东南工农兵银行成立之前这段时间之内。显然，“1931 年 3 月 19 日”，再起期间之内。

十六、1931 年鄂东南工农兵银行伍串票

鄂东南工农兵银行，自 1931 年 10 月成立以后，纸币采用统一发行办法，其发行的纸币，面额有伍佰文、壹串文、贰串文及伍串文四种，最后一种伍串文，此前仅见 1932 年版式图片。

(一)1931 年鄂东南工农兵银行伍串票

1931 年鄂东南工农兵银行伍串票，为石印票，长 134 毫米，宽 90 毫米(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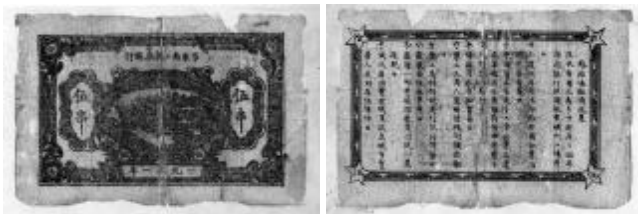


图 11 1931 年鄂东南工农兵银行 5 串

该票正面和背面的图案和文字，均为黑色。

正面图案由中心图案和边框组成。

中心图案为“楼阁风景图”，其左右两侧，分别各有一幅多个弧形组成的边框图案，内有面额“伍串”二字。中心图案上方，印有“鄂东南工农兵银行”八字。中心图案底座两侧内，各有一个“伍”字。边框四角，也各有一个“伍”字。

边框底部，印有“一九三一年”诸字，即发行时间。

该票背面图案，由长方形边框和文字组成。边框内的文字系《苏维埃经济政策》布告，共有十条，其内容反映的是当时根据地政府的具体经济政策，值得一读：

“苏维埃经济政策：

一、没收帝国主义手中财产——租界、海关、银行、铁路、航业、矿山、工场等。

二、不违反苏府法令的外国企业，准许照常营业。

三、中国资本家及手工业企业，不违反苏府法令者，准许自由营业。

四、实行劳工监督。

五、保证商人自由贸易。

六、禁止大商人垄断价格，封锁金融。

七、禁止高利剥削，实行低利借贷。

八、发展合作社事业。

九、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

十、减低房租，繁荣城市，改良城市贫苦人民的居住条件。”

布告文字中部，盖有一枚方形红色印章，应是鄂东南工农兵银行印章，可惜，文字不清晰。

边框四角，各有一个五角星，上端两个，其内各印有象征红色革命政权的“镰刀斧子”图案；下端两个，其内各书写一个“伍”字，与面额伍串相对应。

(二)发行时间分析

1931 年鄂东南工农兵银行伍串票，显然发行于 1931 年。但发行于该年何时，应当分析。

如前所述，鄂东南工农兵银行成立于 1931 年 10 月并统一发行纸币，因此，1931 年鄂东南工农兵银行伍串票的发行时间应在 1931 年 10~12 月期间，仅仅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也是为何 1931 年鄂东南工农兵银行伍串票至今所见数量极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可知，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纸币的多次新发现，既丰富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货币的类别和品种，又为革命根据地货币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极为难得的新的珍贵实物资料，其史料价值、研究价值、收藏价值和鉴赏价值，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 [1]张或定，张卫星，夏红艳.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早期货币新发现——阳新县龙燕区、沿江特区及金龙区纸币[J].中国钱币，2013，(6).
- [2]张或定，周明贵.鄂东南革命根据地货币新发现[J].中国收藏·钱币，2015，(2).
- [3]丁国良，张运才.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41-43，50-51.
- [4]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金融[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31.
- [5]湖北省阳新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阳新县志[M].新华出版社，1993.
- [6]中共阳新县委党史办公室.阳新人民革命史[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94.
- [7]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上册)[M].文物出版社，1982：91.
- [8]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鄂东难苏区财经贸易综合材料[A]//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摘编[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715-744.

湖北“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地方武装纸币

张或定 张劲峰 张峭峰

2003年冬季,湖北省崇阳县城乡,先后发现数张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面额有贰角和伍角二种,大约每种四张,刚好四套,可惜,未见壹角面额票券。

2010年11月,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贰角和伍角券,拍出价高达28000元。

在湖北地方钱票中,以抗战名义发行的钱票,极其罕见。因此,该票券的出现,引起湖北地方民间钱票收藏者和爱好者的广泛兴趣,湖北泉界和收藏界,对此流通券的出现,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研究表明,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是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崇阳县地方武装发行的一种军用纸币。

为此,以下就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及其背景情况,作以简要介绍。

一、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贰角、伍角流通券

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贰角流通券(图1),为横式,长107毫米,宽62毫米。



图1 湖北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贰角

钱票正面图案及文字,均为红色。正中图案为田园风光图。其上印有“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等字。诸字之下为编号:028411,紫色;中心图案两侧,分

别为面额数值,即两个“贰角”醒目大字。中心图案下方印有一排小字:“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印”。指明该钱票印刷时间或发行时间为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正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

左右边框处分别印有“集成五元,兑换法币”。其内侧也分别印有“凭票购物,流通无阻”。

钱票背面边框内,印有说明文字,其内容是:

“本券系因社会辅币缺乏,用转不灵,特印制一角、二角、五角流通券,以资救济。除凭票购物,兑换法币外,并准完粮,纳税。”

边框和文字均为棕色。文字正中,盖一枚方形红色印章:“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之印”。

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伍角(图2),也为横式,长115毫米,宽65毫米。该钱票图案和有关文字,与贰角券完全一致,仅边框稍宽,钱票背面颜色稍有不同,本券为浅绿色。其编号为015389,紫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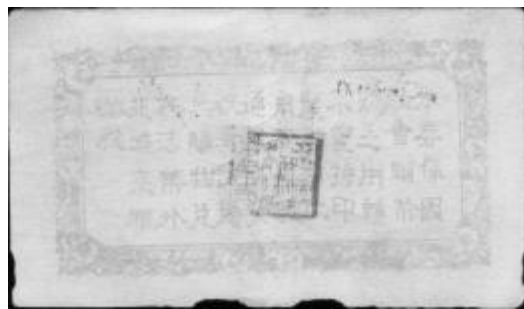


图2 湖北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伍角

二、崇阳县概况

崇阳县位于湖北省的东南部,地处湘鄂赣三省边隅,历为战略要地。西邻湖南省临湘县,东南与江西省修水县接壤,境内多丘陵低山之地,交通不甚便利,县

城为天城镇。

《读史方輿记要》载,崇阳县以“诸山崇聚”而命名。明、清时,属武昌府,今属咸宁市管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之一。

清末民初时,崇阳县以农业经济为主,境内多桂花树,是全国著名野桂花蜜源地。崇阳四乡,多产茶,茶叶为其主要传统土特产品,系全省老青叶产区之一。所产茶叶,多集中运往汉口,再远销国内外。当时俄国、英国等国,都在崇阳设有茶厂或贸易公司。因此,茶叶贸易,十分繁荣,与茶叶有关的商号,比比皆是。

境内多桂花树,全国著名野桂花蜜源地。近年来,因所产特级桂花蜜,色白味醇,质量上乘,而远销东南亚和日本等国。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曾占领崇阳县长达近七年之久。

崇阳人古朴,素有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精神。据县志记载:北宋靖康年间,金兵侵入汴京(即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当时崇阳县令,率领崇阳义军七百人勤王(勤王的意思指:君主制国家中君王有难,而臣下起兵救援君王或者皇帝之意),与外来侵略者及其走狗血战豫鄂境内。因敌众我寡,后援不济,自县令以下,大部壮烈牺牲。满清入关时期,崇阳人蒙正发起兵抗清,兵败之后,家族惨遭杀害,屋舍夷为丘墟,但他们百折不挠,只身赴湘,投入章旷、何腾蛟麾下,继续从事抗清斗争。

正因为崇阳人民有反对外来侵略者的传统,所以,当1938年日本军逼近武汉时,崇阳各乡便风起云涌地组织起抗日游击队来。

概括起来,崇阳县有四个方面的游击队伍:

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陂抗日游击队”和“崇阳县抗日大队”;

二是,崇阳县政府领导的“游击支队”和“崇阳县游击队”;

三是,以原联保武装为基础的游击队;

四是,由旧军人、地方势力组织的游击队。

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系崇阳县政府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所发行。

三、发行背景

1937年7月7日,中日之间发生著名的“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1937年9月,崇阳县成立抗日宣传委员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同时又成立了崇阳县社会军训总队,组建三个常备中队。

1938年10月25到27日,日军先后占领汉口、武昌、汉阳三镇。

1938年11月6日,日军又攻占了湖北南部的崇阳县,一直占领到1945年9月日军无条件投降,时间长达近七年之久。

1938年,崇阳县社会军训总队扩编为崇阳县游击司令部第一支队。

1939年2月前后,鄂南游击司令部及鄂东游击司令部等地方武装,相继成立以党政军绅联合力量的“抗战经理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筹办军费给养。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也在此时成立。

1939年2月,兼任鄂南游击队司令部司令的崇阳县县长郎维汉,以“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的名义,发行“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共计20189元,面额有壹角、贰角和伍角三种。

郎维汉,湖北汉川人。1926年3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曾任崇阳县县长,汉口特别市党部副主任委员。

郎维汉,1926年毕业于同文书院。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武汉后,投笔从戎,考入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时,因成绩优异留校服务。1932年奉调南京中央军校政治训练研究班。1937年出任陆军第一〇二师政训处长,参与“八一三”淞沪抗日战役。后调湖北任崇阳县县长,1938年秋兼任崇阳县游击司令。1939年调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湖北支团书记,兼湖北省训练团训导处长。1942年调任中央团部青干班训育组长,1943年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干事。旋奉调中央组织处战地团务组长。1945年10月创办《湖北青年月刊》;11月三青团中央团部决定成立汉口区团,直属三青团中央领导,任汉口区团主任。1947年5月《童子军》杂志创刊,任发行人;9月三青团汉口区团和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合并后,任副主任委员,兼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1947年当选为汉口市立法委员;同年,汉口市童子军理事会正式成立,并经中国童子军总会批准由分会扩大为支会,任支会会长。1949年去台湾后,担任“立法委员”30余年。

抗战时期,湖北各县县长通常还兼任该县游击队的领导,地方政权基本上为军政合一的体制。因为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系作为地方武装部队的一个筹饷机构,因此,此时的“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可看作是“县级武装部队发行的地方军用纸币”。

由于该流通券无准备金,又不收兑,1941年鄂南专署曾责令其收兑,但此后仍不了了之。

民国时期,湖北省地方武装曾发行过各种钱票,往往以商号名义或以别的名义发行,极少有以军队名义发行者。以“抗战经理委员会”名义发行的钱票,目前仅发现此一种。此类地方军用钱票,能流传至今者,已十分稀少。崇阳县抗战经理委员会流通券,作为一种少见的抗战时期湖北地方军用纸币,为民国时期湖北省地方军用货币的考查与研究,提供了一件难得的实物资料,值得鉴赏与收藏。▲

抗战时期湖北省库鄂东分库壹圆券

吕怀平

(湖北省钱币学会)

湖北省库鄂东分库壹圆券,规格:11.5×6公分,正面(图1)有“湖北省库鄂东分库”、六位数编号、“鄂东印刷局制”、“中华民国三十年印”、“壹圆”字样及“鄂东分库主任”和“鄂东行署主任”印章;背面(图2)有“湖北省库鄂东分库”、“1941”及“郭雪琴”、“程汝怀”签名。此券为抗战时期鄂东流通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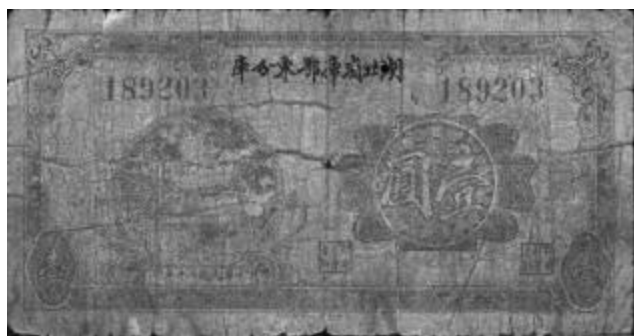


图1 湖北省库鄂东分库壹元券(正面)



图2 湖北省库鄂东分库壹元券(背面)

程汝怀: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湖北省黄安县永河椿树邹家湾人。家族务农为本,兼做生意,族人经常往返麻城、孝感等地。程汝怀少年时考入湖北陆军小学堂。辛亥革命爆发,他随革命军参加了武昌起义和汉阳保卫战。南北议和后,重新回到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第2期学习。抗战期间任湖北省鄂东行署主任兼第五战区鄂东游击总指挥。1946年7月退役,在武汉闲居。1949年加入民革,并拒赴台湾,在武汉迎接解放。1951年在武汉被收审,同年在关押中病故。

郭雪琴:抗战期间任湖北省银行鄂东办事处主任兼湖北省银行公库鄂东分库主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国大片土地。

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日寇为巩固武汉外围,乃大肆进犯鄂东北各县。

民国二十八年元月,鄂东行署在现罗田县大崎乡黄土岭的五广祠组织成立(原属黄冈县1952年改属罗田),行署下设秘书、政务、警保、财务四个处(因当时均是借用民房,各处分散设立)。秘书处(处长蔡葵,又名蔡慧庄)、政务处(处长蔡成,又名蔡晓岚)设在黄土岭方家大院,警保处(处长余希纯)、财务处(处长刘崇燮)设在黄土岭冲里边。各处以下2~3科(股)。之后,鄂东行署向湖北省银行请求设立湖北省银行鄂东办事处。湖北省银行接受鄂东行署的请求,设立鄂东办事处,主任郭雪琴,地址设在樟树垅。

民国二十八年夏,汉口日寇集结千余人,妄图扰袭黄冈大祁山,程汝怀即令独立第五大队和保安八团出兵迎击,在桂系172师两个营的配合下,于黄冈马鞍山一役歼灭日军400余人,生俘6人,其余向汉口逃窜。

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鉴于鄂东形势急剧变化,湖北省政府又已经西迁鄂西恩施,平汉铁路线又为日寇隔断,省府对鄂东地区,势已鞭长莫及。乃呈准(重庆)国民政府将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区,升格改组为“湖北省政府鄂东行署”,代行省府职权,并兼负一、三两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责任,乃派原第二区专员、省府委员程汝怀任行署主任。

民国二十九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程汝怀成立鄂东游击总指挥部,与行署同驻黄冈黄土岭。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由程汝怀兼总指挥,副指挥王啸风,参谋长陶季贤,政治部主任谢光汉。以创建游击队,开展对敌战斗。鄂东民众出于保家卫国之心,纷纷组织地方武装,对日寇作战,使日寇防不胜防,不敢出兵侵犯鄂东,而驻守江岸沿线。当时程汝怀也已率部退入鄂东山区,于是乘机大量收编地方武装,编成四个纵队,三个独立大队,共计万余人。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鄂东行署主任程汝怀呈请省政府,拟在当地自行印发流通券二百万元,以便解决军政各费及缓解鄂东地区货币缺乏的窘困局面。此举虽与中央政府印发钞票的规定不符,但鉴于战时实情,故湖北省银行根据省政府旨意,在按照缴足准备金、自负印刷费用条件下,准许照数印发。并拟订“湖北省银行鄂东办事处代理湖北省库鄂东分库发(下转第13页)

抗战货币中的辅币发行

——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

黄丽¹ 周罗²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发行的第一种纸币,是在特殊的历史政治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历史货币,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产物。它不仅见证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人民艰苦奋斗,英勇抗日的辉煌历程,而且也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的货币关系及陕甘宁边区的金融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一、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法币成为边区通用货币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件”,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于同年9月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边区不设银行,不印发货币,市面通用法币。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中国共产党及时停止了苏维埃货币的印发工作,决定边区统一使用法币,法币成为边区的主要流通货币。

(二)陕甘宁边区缺乏辅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万里长征,来到陕北,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陕甘晋省银行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1937年10月,陕甘革命根据地改名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陕甘晋省银行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后又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

由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面额较大,1元以下辅币缺乏,使得市场交易找零困难,给群众带来很大麻烦,在实际使用中甚至出现了用邮票找零和拒收法币的现象。为了维护法币信用,满足边区交易的需要,促进货币流通,活跃市场,同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授权陕甘宁银行以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自行发行以下辅币,票面额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

光华商店成立于1938年4月1日,是由光华书店与边区贸易局改组的合作总社合并而成,负责管理陕甘宁边区内外贸易,经理余建新。光华商店以及前身光

华书店都归边区银行领导。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虽然不是边区银行所发行,但陕甘宁边区银行对光华券负有保证和兑换的责任。有了边区银行的背书,光华券有了可靠的保障,因而深受边区人民群众的信任和喜爱。

二、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基本特征

“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前后共发行有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七角五分6种面额,7种版别。其中1938年发行面额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共计5种版别;后又增发年份为“1940”年的面额为五角、七角五分两种版别。七角五分的面额在我国货币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光华券是特殊政治历史时期的产物,反映了我党卓绝的创造才能,具有鲜明的战时特色。光华券采用石印,纸质前期为道林纸,后期为图纸,纸张粗糙;号码为铅印人工加盖,略显不完整。

光华券信用度高,流通很广,1938年版(见图1)具有的共同特征是背面均印有光华商店公告三条:

“一、为便利市面流通特发行代价券;

二、凭此券二张或其他通用小票凑足拾角即兑换法币壹元;

三、此券发行十足准备,准备金全部存放边区银行,由边区银行保证并代理兑换。”



图1 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伍角

各券具有的特征见表1:

表 1 各券基本特征信息

面值	发行时间	票幅 (mm)	主图案	正面颜色	备注
2 分	1938 年	42*73	面值	蓝色	正面上端印有“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名称,左右上角有“二分”字样,下端画框印有“贰分”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印。背面印有“延安光华商店”公告三条。
5 分	1938 年	42*73	面值	棕红色	版式与上基本相同
1 角	1938 年	48*90	面值	红棕色	竖型。正面上端印有“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名称,下方及左右下角有“壹角”面值。背面印有“延安光华商店”公告三条。
2 角	1938 年	55*97	风景	深棕色	竖型。正面上端印有“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名称,上部分有塔、山等风景,下方及左右下角有“贰角”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印。背面印有“延安光华商店”公告三条。
5 角	1938 年	65*125	凉亭	茶绿色	右上方印有“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名称,右方有凉亭等风景,左侧及四角有“伍角”面值,右下方有“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印。背面印有“延安光华商店”公告三条。
5 角	1940 年	54*123	纺织、绵羊	浅红色	正面上端印有“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名称,左边有纺织绵羊图案,下端有“凭券兑付国币”字样,左下方有“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印。背面上端有“光华商店”拼音文字,中间为英文面值,下端有“1940”年份。
7 角 5 分	1940 年	54*128	风景	紫色	左边有“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及宝塔风景,下端有“凭券兑付国币”字样和“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印。右边及四周有“柒角五分”面值。背面上端有“光华商店”拼音文字,中间为英文面值,下端有“1940”年份。

三、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发行历程

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是以光华商店作为资产支撑发行的,与法币的法定兑换比例为 1:1。1938 年 6 月光华券首次发行时,最高面值只有 5 角。为了保障法币与光华券的主辅币关系,边区政府严格控制代价券的发行量。到 1938 年年底,光华券的发行量仅为 9.9 万元。

1940 年 8 月,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第三年,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开赴到抗日前线。而此时,国民党政府开始拖延支付八路军的抗日常费,11 月 19 日干脆停发,给边区财政带来极大困难,造成边区法币严重不足,边区政府不得不通过增发光华券来解决财政经费开支短缺问题。11 月 12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决议》,规定银行要增发钞票 400 万元,交付财政厅作生产基金及经费之用。陕甘宁边区政府共增发光华券 2090415 元,以供财政使用。到 1940 年 12 月,光华券发行较 1939 年下半年平均指数上升 90%。

为应对边区财政及经济发展需求,边区政府于 1941 年年初增发了一种面额为 7 角 5 分的光华券。之所以发行这种纸币,一方面是因为其面额较大,可以增

加货币供应,增加边区资金;另一方面是因为 7 角 5 分这个数字科学,2 张就是 1 元 5 角,实际上可以行使主币的功能。这种我国货币史上独一无二的设计反映了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灵活富有创造性的货币政策。

1941 年 1 月 6 日,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对边区采取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战略。禁止国内外捐助资金及公私款项进入边区,禁止边区食盐等土特产外销,边区市场上流通法币锐减,给边区财政及经济造成极大困难。边区政府为继续抗战,发展边区经济,于 1941 年 1 月 28 日通过了“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的决议,下令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同时收回光华券。至 1941 年 2 月,光华券累计共发行 4307215 元。同年 3 月 18 日,边币开始投入市场,光华券被取代。至此,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四、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发行对边区经济的影响

表 2 各券基本特征信息

发行时间	发行量(元)	延安物价指数	国统区物价指数
1938 年 下半年	99050	159	155
1939 年 上半年	182690	190	205
1939 年 下半年	35235	285	306
1940 年 上半年	230940	378	487
1940 年 下半年	2563625	623	801
1941 年 上半年	1195675	1356	1231
累计发行量	4307215		

注:以 1937 年上半年延安和国统区物价指数为基准。

数据来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 5 编金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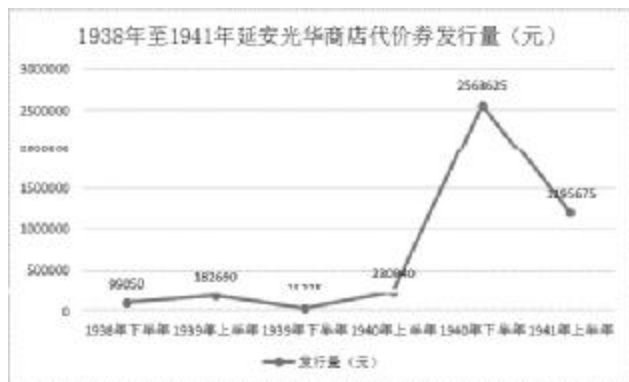


图 2 1938~1941 年光华券发行量

由表 2 和图 2 可以看出,从 1938 年到 1940 年上半年,光华券累计发行量并不大,1939 年下半年甚至出现明显收缩。但由于国民党不遵守协议,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1940 年下半年开始光华券发行量大幅增加,为上半年发行量的 10 余倍。于此同时,延安物价指数也随之上升了 6 倍有余。可见此时边区已经出现了缓慢的通货膨胀。

进入 1941 年,边区市场上法币不断外流,供应量锐减,给市场交易及财政经济带来极 (下转第 68 页)

传承优良革命传统 弘扬红色金融文化

——记 2015 年度红色金融历史展(武汉站)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红色金融历史展组委会

由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红色金融专委会、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主办的 2015 年度红色金融历史展(武汉站)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6 日在湖北省博物馆成功举办。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本次展览



以“传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红色金融文化”为出发点,通过一系列展板、展墙、实物、场景、歌曲演示、视频展播、观众互动等方式,全面讲述我国红色金融的重要历史轨迹,展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足迹,讴歌了我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庆平、原副行长马德伦,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尹汉宁,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斌,



湖北省副省长曹广品等领导同志莅临观展;金融时报、湖北卫视、武汉电视台、楚天都市报、湖北商报、湖北电台、人民网、新华网、荆楚网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展览期间共接待观众逾 10 万人次,社会各界反响强烈。

一、本次展览盛况

原“红色政权货币展”已在全国进行过 12 站巡展,武汉站首次从“红色政权货币展”升级为“红色金融历史展”。整个展览体现出内容丰富、生动形象、服务热忱、节俭隆重等特点。

(一)内容丰富。展址位于湖北省博物馆临时展厅

(系该展厅重新装修后首次展出),展厅面积 1134 平方米,共分为五个展示单元,分别以“艰苦探索、破土萌芽,逆境生存、快步发展,发展壮大、支持抗战,稳定货币、迎接解放,创建人行、统一货币”五个展区,共有展板 117 块^①、展墙 4 面、文物 296 件(其中高仿 7 件)、场景 7 处、视频 2 段,展出规模居历届之冠。展出一级文物 3 件,包括鄂西农民银行铸造马克思头像银币、鹤峰苏维埃银行五百文铜币木刻板、京山豫鄂边区建设银行边币石刻板等文物首次组合亮相。另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鄂东南工农银行石刻板和国家银行钞票设计者黄亚光同志亲笔信等珍贵文物也同时展出,引发广泛关注。



另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鄂东南工农银行石刻板和国家银行钞票设计者黄亚光同志亲笔信等珍贵文物也同时展出,引发广泛关注。

(二)生动形象。一是“金融”闪耀。根据总行领导要求,本次展览由货币展升格到金融展。为此,我们在展出内容和功能上作了较大突破:一方面,保留了原来的“展板+货币”,并对展板内容进行了修订、完善,将展板由原来的 96 块扩充为 113 块;另一方面,结合武汉分行辖区赣鄂湘三省的红色金融历史资源,首次进行了实景复原展示,共展示柴山洲特区农民银行、马克思银元铸造、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营业厅、江南银行抗币印制、新四军转战江南电子地图、第一套人民币壁龛等立体场景,录制播放了《红色金融历史展》、《北海银行在沂蒙》两段视频,首次尝试了“裸展”^②这一国际上通行的展示模式,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发展的实况,特别是充实了武汉分行辖内赣鄂湘三省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的金融活动内容,完整反映了当时的金融发展状况,从形式上改变



了以往单纯罗列纸钞、视觉冲击力弱的不足。二是活动丰富,除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红色金融历史展”外,组织了两场红色金融讲座,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马德伦分别从党史和金融发展的角度,详细阐述了红色金融的精彩历史以及艰苦创业的战斗历程,得到听众热烈响应。三是文化氛围浓厚,除常规的宣传画册、导览手册外,还首次编纂、印制了红色金融地图、红色金融纪念封等文化产品,得到总行领导交口称赞和群众热烈追捧,展览未结束就发放一空。

(三)服务热忱。我们以3月24日预展,26日举办开幕式,留足两天时间进行现场测试和调整,力图向与会嘉宾呈现一场与众不同的开幕式。整个展览的14天里,每天都有现场值守、安保人员,引导、发放宣传用品,配合博物馆保安做好人流疏导工作,确保了展览有序、安全、无事故。我们组织了分行机关艺术团和中南财经大学、省博志愿者3支讲解员队伍,分别负责开幕式、工作日与节假日的讲解工作,配备了英文讲解员,满足了国际友人参观的需要,这在全国类似展览中尚属首次。我们注重与各媒体、各金融机构、职能部门的联系,展览期间共有湖北卫视、武汉电视台、楚天都市报、湖北商报、湖北电台、荆楚网等10余家主流媒体进



行报道,在汉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各高校、政府部门等分批组织团体参观,日常接待的普通游客络绎不绝,展览期间共接待观众10.8万人次,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学习和宣传红色金融的热潮。

(四)隆重节俭。本次红色金融系列活动隆重而节

俭,开幕式历时仅20分钟,不拉横幅、不铺地毯、不剪绸缎、不戴胸花,红色金融讲座在分行机关大楼内进行,活动期间全程工作餐,不提供额外的参观游览服务。展览场景布置上,马克思银币铸造人偶群像、新四军抗币印刷人形模特都在淘宝网上购得,节省大笔费用。纵观整个展览,虽然砍掉了一些面子工程,但由于展览生动形象、内容翔实、人气旺盛,使得整个活动节俭而不简单,隆重热闹而不铺张浪费。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尊重历史与形式创新相结合。在武汉展之前,总行已先后在深圳、乌鲁木齐、苏州、杭州、镇江等地举办了共计12站展示,展览大纲由中共中央党史办李忠杰副主任把关。作为一项严肃的主旋律展示,我们在本次改版的红色金融展上,完全遵循展览大纲的要求,以党史、金融史为脉络;对于拟扩充的内容,凡是存在争议的,一律不上。而在展示形式上,则不拘一格,改变了前12站传统的“展板+货币”展示方法,而是在展板叙述的基础上,辅之以各种展墙、场景、文物、视频、文化产品、观众互动等,力图呈现出别开生面的展示形式^③。

(二)上下协调与三省联动相结合。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红色金融专委会等部门领导非常重视武汉站的展示工作,将其作为“打造红色金融展2.0版本”的崭新形式来抓。周燕顾问、周卫荣馆长等先后多次莅临武汉、南昌、长沙、赣州、吉安、黄冈等地开展红色金融调研工作,并深入红安、瑞金等地乡村查勘红色金融遗址;我们也曾组团四处北京



汇报展览进展情况,得到总行领导积极肯定和中肯建议。我们成立了红色金融展组委会,以分行文件发布了实施方案,得到各地积极响应;武汉长沙南昌三地成立有红色金融展委员会,各地市中心支行也成立有红色金融展办公室,对当地的红色金融情况开展调查,及时向我们反馈信息。首次面世的鄂东南工农银行石刻板,其收藏信息就来自咸宁中支通城县支行开展的红色金融调查活动。

(三)专班运作与特色展示相结合。红色金融展组委会的核心编制组,有来自湖北、湖南、江西的钱币专家,有社科院的教授、中南财经大学金融史专业博导等作为顾问,有武汉分行办公室、钱币博物馆、货币金银处、宣传部、工会办、钱币学会等部门的通力协作。大家为本次展览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将本次展览办

成了一次特色展示的盛会：分行办公室与西安分行协调,借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钱币博物馆与湖北省博物馆协调,借展鹤峰苏维埃银行五百文铜币木刻板、京山豫鄂边区建设银行边币石刻板,这三件文物均系首次组合与公众见面;湖北钱币学会在杭州中支的协助下,从千里之外的长兴县征集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圆盘印刷机,为展



览中的“新四军江南银行抗币印刷”场景增色不少;工会办负责讲解工作,他们现场教授《新四军军歌》、《江南银行行歌》、《江淮印钞厂厂歌》、陕甘宁银行《贷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在开幕式现场引发领导们共同吟唱,赢得满堂喝彩。

(四)文化展示与全民教育相结合。在筹划展览的过程中,大家曾有担心:“弘扬主旋律的展览,普通观众认同度如何?”因而,我们在整体的策划上,力图引入金融文化+全民教育的理念。纵观整个展览,没有晦涩的讲解,没有专业的钱币辨析,有的只是共产党金融工作者艰苦创业的艰辛故事、钱币背后的金融思想、金融运行的成功案例,力图做到贴近百姓、贴近生活。3月26日红色金融历史展开幕式的成功举办,为我们增添了工作的信心。后续的展览活动中,除了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各单位组织的集体参观活动外,来自社会上的普通观众络绎不绝:有高中、大学自发组织观展,有全家齐上阵观展,有老人在现场动情地回忆起当年曾用过的红色货币。每逢节假日,从早到晚观众应接不暇,闭馆前必须动用保安进场来劝说大家离场。结束语后的留言板,每天都被写得满满当当:有大学生的留言



“红色金融历史原来如此厚重啊”,有老人的字句“金融人了不起”,有游客的心声“武汉真美”,有姑娘小伙的幽默“这里好多钱啊”,有小朋友的愿望“我长大了要进银行”……

三、主要启示

(一)好的理念确立了红色金融展的基本方向。总行原行长助理金琦在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关于“举办红色金融巡展、弘扬红色金融文化”的论述,为我们办

好展览指明了总方向。红色金融专委会周燕顾问有关增加新四军金融斗争版块、设计红色金融地图、开发首日封等拓展展览外延的建议,使我们在开发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做到了有的放矢。组委会殷兴山主任在调研中有关“查实历史、明确出处,做好展览、吸引观众,注意安防、确保安全,创新形式、办出特色”的指示,为红色金融展策划指明了思路。我们的红色金融展能取得成功,与各位领导关于办展的正确理念和有力指导分不开。

(二)好的定位决定了红色金融展的不二主题。从“红色政权货币展”更新为“红色金融历史展”,这升级的2.0版本该如何体现、如何定位、如何把握主题?这个问题让组委会专班的同志们颇费思量。什么是金融?

如何体现红色金融?经过一次次讨论、征求意见、确立展示重点、盘存展品、收集金融故事等,我们形



成了共识:红色金融,不是简单的办银行、发票子,而是当年那一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金融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用羸弱的身躯承担起“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重担,书写出一部集发行货币、发放贷款、货币斗争、统一财政、货币政策、金融思想等等于一身的红色金融恢弘历史。这个定位贯穿于我们本次展览的始终,成为展览成功的主题。展览在人民银行系统也引发较大关注,人民银行南昌、长沙、上海、郑州、济南等地先后来人来函拷贝电子版、学习办展经验。

(三)好的政策为红色金融展提供了强大保障。本次展览的成功举办,离不开行领导的政策关怀。武汉分行领导亲自坐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方案,讨论细节;分管领导在布展前后多次赴装修工地,同工作人员一道头戴安全帽,查勘场地,解决问题。组委会下设秘书处,以分行办公室主任为秘书长,分行钱币博物馆、南昌、长沙货币金银处长为副秘书长。分行专门抽调湖北、湖南、江西三地红色金融方面的专家,组成编写专班,集中办公,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大纲编纂、总体规划、场景构思、讲解词重置等项工作。在人员借调、出差调研、运输车辆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

(四)好的团队是决定展览成功的要素。武汉分行为本次展览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团队。在编纂过程中,编写专班的同志们任劳任怨,不辞辛苦,完成了繁复的升级、改版工作。据粗略统计,查阅资料近万份,驱车逾十



万公里。为了获取《毛泽东同志 1942 年对南汉宸关于财经问题的指示》复制件,我们发出公函,三赴北京,驱车 50 公里找到五环外西山中央档案馆进行商议,并最终得偿所愿;为了丰富展板内容,更新展板底图,我们上网购买《中国金融珍贵文物大典》、《中国革命史图集》、《中国革命纪程美术精品》、《新四军史迹图册》、《江苏抗战》等各类书籍万余元;为了征集圆盘印刷机,我们先后跑遍武汉市印刷协会、印刷厂,赴北京中国印刷博物馆、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博物馆、阴山县毕昇印刷博物馆等地查访相关信息;为查找新四军在汉活动资料,在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借阅到了八十年代的绝版书籍;为查询当年各根据地贷款、货币政策的有关资料,我们查询《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抗战日报》^④等老旧报刊,光是这项工作就耗时两个月;遇到拿不准的问题,中国钱币学会专家委员会杨枫委员、湖北省社科院张硕研究员、湖北省博物馆李焱胜研究员、中南财经大学姚会元教授(博导)等专家学者给予了无私的帮助。红色金融展的成功,来源于这个勤劳敬业、团结和谐团队的强大支持。

(五)好的作风是展览成功的重要推手。作为一项红色金融的宣传教育活动,不能出错应该是基本的前提。在编制、筹划过程中,我们团队强调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新增的 17 板展板,每一项内容都经过仔细斟酌、考量,拍得起胸脯,经得起检验;对于总行已展出 12 站的原始展板,我们在严格考核、严肃论证的基础上,也做了适当修订:大革命时期两块展板底图雷同,我们更换为黄冈农民协会老照片;陕甘革命根据地展板底图与展板图片重复,我们更新为 1935 年 9 月红 25、26、27 军会师老照片情形,增加了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习仲勋的照片和简介;山东革命根据地 2 块展板底图完全一致,我们将其中一幅



更换为沂蒙地区反扫荡“大青山突围”图片;陕甘宁根据地底图用的是明代八达岭长城图片,

经查证与陕西地域特征不符^⑤,更换为与展板内容相关的大生产运动、发放支农贷款、抗战时期延安风光等老照片;淮南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成立地点^⑥等极微小且展出了 12 次的瑕疵,也被我们揪了出来。全部展示内容,我们更换底图 12 处、修订 3 处。待到定稿终了,编制组的同志们已经盯着电脑屏幕三个多月,大家共同的感觉是“几个月内都不想看电视了”。

四、几点建议

(一)培育红色金融品牌。我们认为,“弘扬革命优良传统,传承红色金融文化”,不仅是办一个红色金融全国巡展,而应是形成一个包括《红色金融史》编纂、红色金融遗址保护、红色金融教育等长期工程。特别是要建立一个固定的场所,长期展示,不断充实。必须多方合力,培育红色金融品牌,形成红色金融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长效机制。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本次武汉举行的红色金融展,我们将湖北省博物馆纳入协办单位,费用全免,节约场馆租金、人工费等计 40 余万元。另据我们了解,举办巡展的其他单位,有的仅场馆费用就接近 20 万元,有的按 2 万元/天收费,主办方压力极大。我们建议:总行能否与文物总局达成相关合作协议,在各地举办红色金融展时指定文博系统展馆,展览费用酌减、免费,便于红色金融巡展在全国铺开。

(三)拓展红色金融文化。本次红色金融展,我们在拓展文化产品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也有不足:整个展览没有体现红色金融的展标、LOGO^⑦;文化产品也欠缺铜章、徽章等高品质产品;展览期间纪念品均为现场赠送,未进行市场开发;相关的红色金融书籍签售、红色金融遗址挂牌等也因时间仓促未能成形。所有这些,在今后的巡展活动中应予以注意。▲

注 释

①含 4 块歌曲小展板。

②新四军抗币印刷场景中,圆盘印刷机为“裸展”(展品与观众零距离)。

③我们在贯彻落实中,形象地将党史脉络形容为航道,只有在航道内航行才能保证船的安全,不然有误入歧途、搁浅、触礁的风险。至于如何航行,则尽可以创新发挥;想要吸引眼球,把船装饰成画舫(展示场景);想要有杀伤力,多载上几件大杀器(一级文物、特级文物)。

④陕甘宁根据地《解放日报》,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日报》、晋绥根据地《抗战日报》。

⑤经查实,陕西地区没有明代长城;现仅存战国时期韩长城、梁长城、魏长城,皆为土长城且破损严重,与原底图条石所筑长城照片显然不符。

⑥淮南银行成立地点为时家集,原展板上误为时家准。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成立地点到底为小焕岭还是小花岭?就连权威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和《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都不一致。经多方查证,该地原名小焕岭,1940 年 10 月豫鄂边区首脑机关入驻,改为小花岭,寓意抗战之花漫山遍野。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成立于 1941 年 4 月,表述为小花岭为宜。

⑦我们联系了相关设计公司并形成了 3 个基本方案,经集体讨论,认为 3 个展标图案均达不到要求,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本次展览未见 LOGO。

珍贵的红色钱币

——全国红色金融史展出观感

彭泉洪

(中国人民银行洪湖支行)

珍贵的红色钱币
鲜血与战火凝成
腥风血雨里诞生
硝烟泥土里成长
挑着扁担上井岗
骑着马背过长征
播撒共产党人的理想
点燃劳苦大众做主的希望

珍贵的红色钱币
革命先驱忠魂铸就
有人为你历经磨难
有人为你献出生命
凝聚无产者的力量
支撑革命走向胜利
飘过艰难的岁月
留下血染的风采
刻进红色的记忆

鄂泉荟萃 精彩纷呈

——记湖北近代钱币展

姜 林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2015年6~8月,“湖北近代钱币展”在北京隆重开展。本次展览由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联袂主办,湖北钱币博物馆、湖北省钱币学会共同承办。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司局领导,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学会专家学者,北京市社科联、湖北省社科联、湖北省钱币学会团体会员代表等七十余人参加开幕式。



中国钱币博物馆周卫荣馆长主持开幕式,中国钱币博物馆李明书记、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杨立杰行长到会并致辞。

近代以来,武汉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军事要地、金融中心。可以说,湖北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缩影;湖北钱币的变革,更是中国钱币史、金融史、经济史上的重要篇章。本次展览以钱币为主线,共分为清末钱币、辛亥钱币、汉钞、红色钱币以及湖北钱币成果展五个展示主题。展厅陈列以展品为基础,以时间为脉络,以金融、经济为背景,力图反映出近代湖北、武汉的经济、金融和社会状况等。下面为您一一进行介绍。

一、清末钱币

清末武昌宝武局开铸有咸丰宝武当十、当五十、当百等品种。光绪二十三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湖北枪炮厂机器作铸钱之用,次年,湖北机器铸钱局在旧日宝武局基础上建立投产,铸行有光绪通宝等制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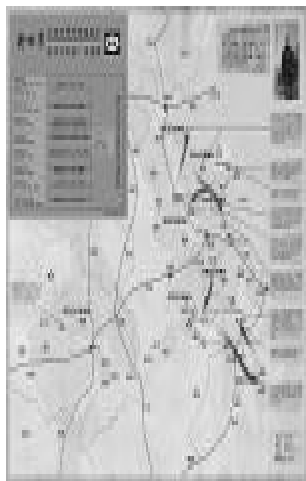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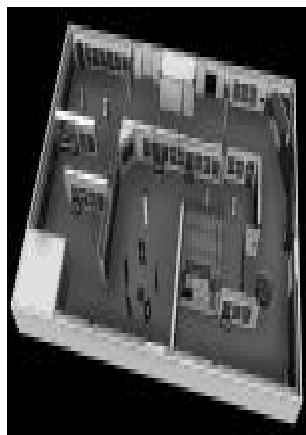
湖北银元局筹建于光绪十九年,是继广东银元局之后,中国第二个采用机器铸造银元的造币厂。湖北银元成色优于墨西哥鹰洋,流通广,直到宣统年间仍流通于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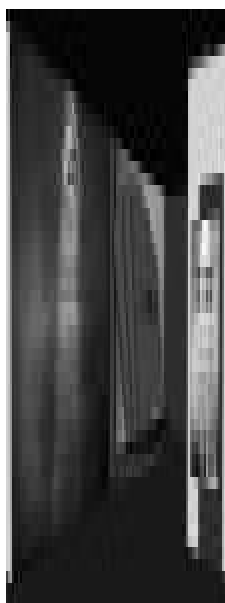
江沿海各省。时至今日,湖北省造“大清银币”在历次拍卖会上仍广受追捧。由大英博物馆权威出品的钱币专著《钱的历史》,其封面就采用湖北银元局所发行银元票。

湖北铜币在晚清货币史上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湖北铜币局开办于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一年正式竣工,其规模之大为各省之冠,创造了许多第一:造币机最多、币质最好、铸造枚数最多、标准流通品种最全、流通最广、存世最多、代造最多等等。

鼎鼎大名的湖北官钱局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是湖北第一家带有现代特征的金融机构,也是清末时期规模庞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它的出现,是当时湖北武汉地区经济近代化进程的要求与反映,推动了湖北武汉经济近代化的进程,促使当时的湖北武汉地区成为了华中地区的金融中心。本次展出了壹大元、壹串文、双人头等官票皆为票中精品。

湖北银锭形态多样、造型优美、种类复杂、内涵丰富,以其鲜明的地方特点在中国银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专门罗列了三个展柜,分别展示五两小锭、杂锭,十两、二十两中锭和五十两银锭三大类。闻名收藏界的江汉关、官钱局、湖北省造等官锭会同协成号、公济益、恒春东等民间





银锭会聚一堂,定能让您大饱眼福。

彩票属于广义上的金融票证范畴,我国最早批准发行的官办彩票就出自湖北。光绪二十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批准,发行“湖北签捐彩票”,这是我国第一张官办彩票。《清稗类钞》记载:“签捐票:我国之有发财票,自粤商江南票始…迨湖北签捐票出,事事以官法部勒之,而局面为之一变”。

二、辛亥钱币

辛亥钱币展厅主要展示存在于铜元、纸钞、钱票、兑换券等钱币上的辛亥记忆。我们邀请到国内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导冯天瑜先生为本展区题词。冯老欣然以辛亥革命时任鄂都督府的理财部长李作栋的《“理财”有感》摘出“万事非财莫举中,点金有术化储铜”两句为题,形象刻画出辛亥革命时期金融运作之艰难。而陈列于展示柜中那些革命党人在募款、流通、基建、纪念等过程中发行的金币券、金银币、商号钱票、兑换券、军用小票等,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尤其是独具湖北特色的黎元洪头像民间钱庄票、吴兆麟将军筹建水利工程期间发行的“樊口堤闸工程总局临时兑换券”等,均为较珍稀的品种。



三、“汉钞”

武汉在开埠后经济迅速崛起,在汉各金融机构纷纷发行带“汉口”字样钞票,史称“汉钞”。“汉钞”与源自上海的“申钞”并驾齐驱,是近代纸币中的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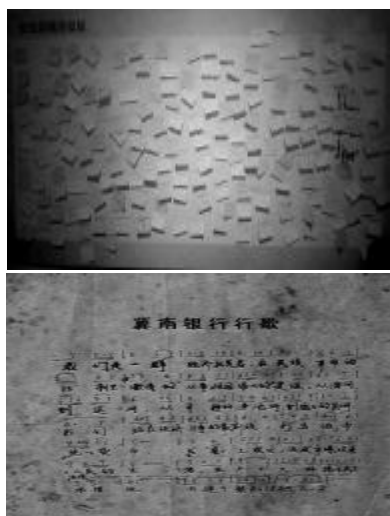
“汉钞”的历史始于清末后期。光绪三十四年浙江兴业银行成立后,即在汉口设立分行并发行“汉钞”。此



后,作为国家银行的大清银行也在汉口设立分行并发行“汉钞”。次年,官商合办的交通银

行亦仿而效之。

汉口是闻名全国的通商大埠,除上述银行外,其他中资银行也争相来汉口设立分行并发行“汉钞”。据考证,先后有黄陂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湖南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殖边银行、农商银行、中



孚银行等发行过“汉钞”。辛亥革命前后,一些国外银行,如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俄华道胜银行、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横滨正金银行、花旗银行、中法实业银行、友华银行、中华懋业银行、震义银行等,先后在汉口设立分行并发行带“hankow”字样的“汉钞”。

汉钞最初流通范围亦只是在武汉及周边区域。伴着开埠和租界开放,当年繁华喧嚣的码头镇子一跃成为整个华中的航运、交通、商贸、金融中心城市。在武汉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下,汉钞安然度过了数次金融风潮,其流通范围逐渐超出了湖北,遍及皖、川、湘、陕、晋、赣、甘等周边省份,成为当时中国区域性货币之一。同时期,各类钱庄、票号、股票、债券、保险、证券交易亦如潮兴起,武汉一跃成为近代中国内地金融中心。

本次展览,我们陈列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行”,通商、四明、国货、实业“小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北四行”,大中、兴业、农商、湖北省银行等中资银行以及横滨正金、麦加利、花旗、华比、德华等外资银行“汉钞”共百余件。除此以外,重点文物——湖北省银行五角铜钞版系首次赴京展示。我们还以民国武汉金融盛况为蓝本,制作有江滩街景全图、汉口金融街地图、武汉老银行明信片、笔记本等文化用品,记录着当年汉口江滩边的金融盛景。时至今日,那些江岸边华美的银行建筑,犹如一个个见证时光荏苒的刻度坐标、一缕缕记载往昔峥嵘岁月的时代印迹、一座座忙碌市井生活里的巍峨背影,成为我们难以割舍的浓郁情怀。

四、红色钱币

湖北是一片革命的热土。1927年5月,黄冈县农民协会发行流通券,与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发行的布币、浏东平民银行发行的临时兑换券、信用券等同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人民货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以湖北为主体的鄂豫皖、湘鄂西、鄂东南三个根据地的形成,湖北红色货币获长足发展。三个根据地皆设立有银行,并发行了货币。这

些货币行用于鄂东南、鄂东北、鄂西北、鄂西南和江汉平原的数十个县,几近覆盖大半湖北,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各根据地设立的各级银行、信用社、经济公社等发行有纸、银、铜、布等多种材质的红色货币,其形制优劣不等、精粗各异,生动反映了当年革命斗争形势与环境的变幻转化。其中,鄂北农民银行发行的马克思银币,目前国内仅见一枚,为传世孤品。



抗日战争时期,以湖北为重心的豫鄂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很短时间就形成局部统一的独立战略区。豫鄂边区孤悬敌后,长期处于敌伪、顽夹击的恶劣环境,为打破封锁、搞活经济,新四军五师创建了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并随即发行“边币”。“边币”的成长、壮大历程始终伴随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而多彩多姿、有声有色。其中:对法币“在基本区维护,在游击区抵制内流、鼓励外流”,后又依据形势发展逐步限制、排挤的策略;“发展边币,奖励储藏,吸收游资,充实边区银行,逐步统制外汇”的金融策略,改储备金、银为储备粮食等物资为边币发行保证,以及“健全金融机构、建立边币本位”等货币政策与措施,为湖北红色货币,乃至中国革命根据地红色金融史增添了丰富而精彩的内容。

人民解放战争中期,湖北长江以北的大部地区成为中原解放区的组成部分。1948年6月,中原解放区开设中州农民银行,发行中州农民银行币,并建立起地跨湖北、河南、皖西、陕南等广大区域较为完整的货币系统。中州币的发行,标志着湖北近代货币史上历史性的转折:湖北红色货币最终结束湖北地方性货币的历史,并由此开始了彻底肃清包括法币、伪币、杂币、外币等一切非本位币,使近百年来湖北币制归于统一。

可以说,湖北红色货币经历了由萌芽状态到奠定基础,不断发展壮大,最后走向全国统一这样一个红色货币史的全过程。更为可贵的是,在红色货币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湖北货币都有丰富实物佐证。它们既是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历史的缩影,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根据地由弱到强、不断发展的见证。如此全面、系统、完整的

人民币史料,在全国堪称罕见,足可引以为荣。



五、湖北钱币成果展

多年来,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高度重视钱币文化事业,湖北钱币人努力耕耘,结出累累硕果:开展清代民国银锭、蚁鼻钱铸造工艺等多项重量级研究,先后获奖;承办过楚国货币与中国古代铸造业、中国货币反假、《中国钱币》与货币文化、辛亥革命与货币等多项全国性学术会议,广受好评;出版发行《湖北钱币研究丛书》之《顺治钱百珍》、《湖北钱币博物馆藏品选》精品图册、《武汉金融·钱币专刊》等多种钱币类专项书籍,创出品牌;承办过反假货币巡回展、革命根据地货币展、人民币反假教育展、中国·武汉金融博览会钱币展、红色金融历史展等多项展览展示活动,观众如潮;也曾举办“湖北省金融理财文化节”宣传、《魅力武汉·钱币篇》电视专题、“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安全”宣传咨询以及每年度的“3.15人民币反假宣传”、“5.18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省社科联“科普宣传周”等多项宣传咨询活动,深受欢迎。

我们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中国钱币学会多项“金泉奖”,学会专家夏刚等人撰写的《币海漫游》获得“全国百部优秀科普读物”荣誉称号,这是全国范围内唯一入围的钱币类书籍;学会副秘书长姜林同志被中国社科联评为“全国优秀科普工作者”;湖北钱币学会被民政部门评为“4A级优秀社团”,多次获湖北省社科联先进社团、社团管理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本次展览历时三个多月,共接待观众五千余人次,《金融时报》、《金融博览》给予了连续报导,是我们在异域举办展览、宣传湖北钱币文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上接第61页)大团结图案。10元券为工农联盟代表图案。

从整体来看它的寓意,“苏三币”正面图案,表达了新中国从井冈山走来,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设自己的美好国家。因此,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有了较大扩展与突破,方法和方式的创新,对经济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同其它事物发展一样,都有一个从发生到终结的

过程。虽然“苏三币”的历史使命,有它客观的原因而结束,不可避免地被新的币种所替代。然而,它依然是代表着那个年代一种先进的符号,为我国后来印制发行的人民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经验。因而,当下的人们能看见“苏三币”,或回忆当时使用过的经历,或听朋友们津津乐道介绍当年的景遇,也会对它产生某种钟爱的共鸣,进而对当年决策者的钦佩,对它在九年的运行过程中为我国不断走向繁荣富强所起到的作用而赞赏。▲

唐代“飞钱”若干问题考证

王纪洁

(中国钱币博物馆)

“飞钱”是出现于我国古代早期的一种汇兑业务形式,又叫做“便换”。唐代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工商业发展异常繁荣,到宪宗时期(806~820年),为解决铜钱转运困难问题,方便异地取钱,商人们发明了“飞钱”。这是一种带有汇兑性质的票据,尽管已经初步具备纸币的性质,但还只是一种信用货币。作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兴产物,“飞钱”伴随着唐后期百余年的历史进程,对唐代财政、货币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飞钱”,我国学者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学者们注重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主要有《唐代飞钱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唐代的“飞钱”》、《对唐代柜房、飞钱的认识》、《唐代的飞钱》、《试论唐代飞钱的产生及性质》、《关于唐代“飞钱”的性质问题》。上述文章对“飞钱”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此外,也有《在一场激烈斗争中唐代飞钱出现》、《“飞钱”随想》等随笔、漫谈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人们描述“飞钱”是如何产生和使用的。本文是在总结、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对“飞钱”的产生及相关问题进行一个综合阐述。

一、“飞钱”产生的背景

“飞钱”盛行于都城长安以及扬州、广州、成都之间,反映了商业繁荣的一个侧面,同时促使唐代的货币经济及货币流通手段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一)商业的高度繁荣

唐代统一了南北地区,交通发达,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社会长期安定。统治者也注意兴修水利,劝课农桑,百姓生活富足,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社会局面。

唐代的经济繁荣,尤其是商业兴盛,以至于出现了全民经商的局面。唐代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农民经商已成普遍现象,而且官府也可以经商。在手工业生产产品中,除了一部分绢帛是作为赋税要上交国家外,其余的工业品都是作为商品生产而可以出卖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南北方的商业交流日益增加。日用品的交换逐渐加入到长途贩运的行列,唐早期偶然性的长途贩运到中期已成为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日益频繁。作为主要流通手段的铜钱,必定随着商品的大量周转而大量支付。也就是说,此时铜钱的流通量和速度必须与商品流通的速度

保持着同等水平。而这种情况促使远距离间钱货输送量的增大,但朝廷对铜钱的运输又采取严格的限制,从而导致了“飞钱”的产生。所以说,“飞钱”是商品经济高速发达的产物。

(二)运送铜钱不方便

唐代铜钱每贯重六斤四两,要携带大量铜钱出门,既重且很不方便。唐朝时,虽然全国交通大为改善,但是运输速度缓慢。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大宗买卖或大额交易之时需要铜钱量巨大,但铜钱本身的单位价值很低,主要用来支付小额交易,如果用做大额贸易和长途贩运商业的支付手段,不便于随身携带。而且唐代中期以后,藩镇割据,运输钱货既不方便也不安全,正如唐朝诗人刘驾在《贾客词》所描述:“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岐”。数量巨大、体积超重的铜钱缺点显现,使用携带方便的“飞钱”成为迫切需要。为解决货币远程流通的困难,唐代商人从日常商品交换过程中,基于彼此之间的信用,发明了这种新型汇兑办法。

(三)应对钱荒

唐代因为商品交换和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铜钱的使用大为普遍,使铜钱相对短缺。唐中后期以来,市场上出现物轻钱重、铸币供不应求的情况,学术界称之为“钱荒”,该现象对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迫使唐政府采取措施缓解该财政危机,“钱荒”也因此成为唐中后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唐代“钱荒”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建中元年杨炎实行两税法,规定以钱纳税,对铜钱的需求骤然加大,进一步加大了钱荒问题的严重性。此外,由于铜钱供给不足使得通货日益紧缩,致使钱贵物轻,富商大贾纷纷大量蓄钱。同时,由于铜钱价值不断升高导致铜价和铜器价格的上涨,为牟取暴利,百姓也大量毁钱铸铜器。此外,加上铜钱的自然损耗等因素,最终在两税法实行后,社会上形成了以“钱荒”为表现形式的货币危机。唐德宗贞元时期(785~805年)出现了货币十分短缺的局面,政府下令严禁销铸铜钱,禁止现钱出境。而禁止现钱出境,又导致商品贸易往来不够通畅,交换停滞,因此政府又被迫恢复现钱往来。贞元二十年(804年)政府下令以绌、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在货币短缺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保持京城流通领域的货币总量,一方面又要保障正常的商业交易,为此,朝廷采取了种种解决办法,但是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在此背景下,“飞钱”从而

孕育而生。这既可以避免大批铜钱被带出境,又可以把铜钱的流通量掌握在政府手中,同时还能使商品贩运正常地进行。

(四)商业信用逐步产生

唐代物质条件优越,精神生活富足,此时的社会是一种开放的风气。这种风气反映在社会经济方面,就是诚信。唐代社会较为公正,诚实少欺,大多数商人能够恪守诚信,公平交易,主要表现在订立契约与履行契约中。在商品交换领域中,商业信用较之魏晋南北朝有所发展,预付账款交易的形式开始用于商品买卖,这是“飞钱”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买卖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顺利实现商品的购入和销售。从《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唐高宗总章元年,左憧(chong)熹购买草契一事可以看到,左憧熹先向货主张潘埏(dui)预付货款银钱40文,到高昌取货。如果到期不能交货,张潘埏则要归还银钱60文。唐朝官府与民间的商业信用往来也有发展。当时政府为了保证常平仓能收购到足量的粟米,采取了向民间预付货款的形式,政府也利用常平仓向贫民赊销粟米。如天宝六年太府少卿张瑄奏:“准四载五月并五载三月敕节文,至贵时贱价出粍,贱时加价收粍。若百姓未办钱物者,任准开元二十年七月敕,量事赊粍,至粟麦熟时征纳”。

当然,这种商业信用也存在一定风险,伴随有收款方到期不付款或延迟付款的信用风险。

(五)造纸业和印刷业发达

唐代造纸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品种空前增多,造纸坊遍布全国各地,如“巨鹿郡南和县城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唐中期,印刷业渐渐兴盛,私人已有印刷刻印书籍出卖以求利,如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东川节度使冯宿奏请唐文宗下令禁止民间私印日历。他说,“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日历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这说明市场上已有印制日历出售,而且当时日历的印刷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已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造纸业与印刷业的发达,从而使“飞钱”的出现和大量使用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飞钱”的出现有很多因素。正是在上述诸多原因的促使下,出现了中国汇兑业务的雏形——“飞钱”。这种飞钱方式也叫便换,大概有方便换钱的意思。

商人们先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富家或诸道进奏院,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然后商人携带凭证到其他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这个凭证就是“飞钱”。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人们凭借纸券来取钱,从而不必随身携带,寓意钱无翅膀而飞,故称“飞钱”。史料中关于飞钱的最早记载是元和六年(811年)二月,制文中出现“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唐人赵璘《因话录》言:“有土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

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置之衣囊”。元和七年(812年)王播所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便换”即所谓“飞钱”。

二、飞钱的使用和管理

飞钱的使用和管理有一定严格的措施。“飞钱”的经营有两种形式,其中一种是官办。唐代各个道在京城都设有名为“进奏院”的机构,其职责是呈交奏章、传递文书、交纳赋税等。各地在京城商人,把钱款交给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发联单式的“文牒”或“公据”,票券上写明交钱人的姓名、钱款数额,以及取钱机构的名称、地点。票券的一份交给商人,另一份由进奏院收执后,派专人传送本道的取钱机构。商人返回本道,至取钱机构出示票券,经办人核对二份票券相符后,将钱如数付给。进奏院接受商人的钱,并非全数押运回本道供商人提取,而是充入本道向朝廷交纳的赋税中,如此一来本道应交的赋税,就不用全数运往京城。这样,不仅安全,还免去了诸多麻烦与劳顿。诚如《国史旧闻》所云:“商人纳钱京师,可少慢藏之患;地方纳钱中央,可省转搬之劳”。采取这种方法,政府和商人都很欢迎。有时候商人因便换的数额巨大,致使京师积钱量很大,有些人乘机谋利,政府曾一度禁止便换铜钱。后元和七年(812年),唐宪宗下令由朝廷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统一经营“飞钱”业务,收取手续费,规定每飞钱一千贯(一贯等于一千文)付费一百文。

另一种是私办,由一些大商人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分店之间的联系,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商人可凭此票据在私商所开的联号取兑货款。当时私商办理“飞钱”都不收取手续费,但当时交通不畅,一般情况下合券要在一两月后,私商可以利用时间差赚取利息收益。

据史料记载,“飞钱”的使用者首先是以南方茶商为主的商人,使用的区域主要在江淮两浙一带,其次为蜀中地区和北方地区。据陆羽《茶经》描述,唐后期有40多个州产茶,遍及江汉流域和东南、西南地区。根据现存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使用“飞钱”的商人一般都是从事茶、酒之类的官榷商人,并没有普通商人使用“飞钱”的记载。飞钱的运行大致有三种情况,京师开出汇票,于地方州府支付;地方州府开出汇票,于京师支付;地方州府开出汇票,于其他州府支付。

“飞钱”行用不久,就因社会局势动荡,信用危机加深。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朝廷下令“公私便换钱物,先已禁断,宜委京兆府及御史台,切加觉察”,至此不论公私经营的便换业务,一并都被禁止而停顿。

三、“飞钱”的意义和作用

作为异地汇兑的一种信用凭证,“飞钱”虽然本质上是一种钱币汇兑的工具,不具备货币的职能,但是却标志着货币流通价值和货币实体价值分离进程的开

论顺治钱典型坑口

黄定学

收藏和研究顺治版别钱,已有十余年了。全国各地的坑口和传世钱,都有所接触。本文只介绍顺治钱的几个典型坑口。

一、概念与特征

概念:顺治钱典型坑口是指顺治钱中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或地方的发现品。

特征:

第一,典型环境。典型坑口是一定环境下的产物。由于地域不同,气候冷热,雨量丰歉,土壤干湿和酸碱度,都会对钱币的坑口产生直接影响。

本文所介绍的三大坑口基本上都是北方坑,那里气温较低,气候干燥,降雨量少于南方,因此,其坑口特性,与所在地域环境和气候条件是相吻合的。

第二,典型锈色。典型坑口由于分布在不同的地域,气候和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使铜钱被氧化的程度及所形成的表面附着物具有不同的特质。如红绿锈、灰白锈、薄绿锈、爆蓝锈、五彩锈等。

第三,典型版别。典型版别是指典型坑口中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版别。如辽宁绥中坑的右户、右工、上蓟,河南许昌坑的早期光背和记号钱,山西大同坑的西北版光背和右“同”字钱等。这些坑口发现数量大,品种多,覆盖面广,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第四,典型发现。典型发现是指典型坑口中具有突破性的著名品种和新版钱的发现。如绥中坑缶宝背单字钱的发现,就是全新的版式,180余枚上“蓟”的发现,改写了上蓟的存世量。许昌坑发现的上工,右户版右延、光背记号钱,以其坑锈漂亮而闻名于世。大同坑的新版右户版光背、长顺、右同版右延、新版左延等,无论其一次发现的数量和精美程度,都震惊了钱币界。

二、典型坑口举例

(一)东北坑

东北坑,一般是指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省境内的钱币发现。本文提到的东北坑,指辽宁绥中坑。绥中坑是指2002年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发现的顺治钱。

始,货币开始由实物制向本位制下的价值符号转变,现今学者们多认为“飞钱”是我国现代汇票的起源,它在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有唐一代,始终被“钱荒”困扰,“飞钱”的出现减低了百姓和官府对铜钱的需求,缓解了货币流通领域中铜钱铸量不足的矛盾。其次,作为汇兑信用的载体,“飞钱”的出现使得货币流通方式变得简便易行。有了“飞钱”,商旅不用长途行进携带大量铜钱,也不用再交运输税钱,节省了交易成本,为商人们在全国各地进行贸易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第三,促使各地商业间的往来更加频繁,促进了商业的更加繁荣。第四,为北宋纸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回顾中国纸币的发展历程,“飞钱”所具有的汇兑信用影响深远,其汇兑形式,诸如一式二份票券、填写项目、甲地交款乙地取款,交款与取款手续等,这种汇兑方式被北宋最终沿用,“交子、会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宋开宝三年(971),官府在开封设置官营汇兑的机构“便钱务”,为行商直接办理异地汇款。有学者认为“飞钱”是交子产生的历史渊源之一。

据现有掌握的史料记载,不能证明“飞钱”曾经进入过流通领域。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飞钱”本身不能流通,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不能行使货币的

流通手段的职能,它只是一种汇兑业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才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参考文献】

- [1]刘阿平.唐代飞钱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 [2]李锦绣.唐代的“飞钱”[J].文史知识,1998,(8).
- [3]黄鉴辉.对唐代柜房、飞钱的认识[J].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93,(5).
- [4]朱睿根.唐代的飞钱[J].中国钱币,1992,(2).
- [5]夏丽梅.试论唐代飞钱的产生及性质[J].青海社会科学,2004,(6).
- [6]李家寿.关于唐代“飞钱”的性质问题[J].财经研究,1994,(3).
- [7]孙志平.在一场激烈斗争中唐代飞钱出现[J].中国邮政,1984,(2).
- [8]翁礼华.“飞钱随想”[J].浙江财税与会计,1999,(5).
- [9]刘兴云.唐代商品经济的思考与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12,(27).
- [10]全唐诗(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274.
- [11]沙一.论唐宪宗时期的钱荒[D].中央民族大学,2011.
- [12]《唐会要》卷八八.
- [13]《太平广记》卷一四五.
- [14]《全唐文》卷六二四,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
- [15]《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
- [16]唐赵璘《因话录》卷第六《羽部》.
- [17]陈登.国史旧闻(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8]《全唐文》卷六六《穆宗》二.
- [19]《宋史》卷一八《食货志》.
- [20]贾大泉.交子的产生[J].西南金融,1994,(1).

1.地理环境和气候。

绥中县位于葫芦岛市的南部,濒辽东湾。东隔六股河与兴城市相望,南临渤海,西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接壤,北枕燕山余脉与建昌县毗邻。是环渤海经济圈的重点城市,辽宁省五点一线环渤海开发战略起点城市,辽宁沿海经济带重点支持区域。

土壤为棕壤、草甸土、沼泽土、水稻土及沿海低洼地带的盐土。

绥中县属温带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区。主要特征:四季分明,水热同期,雨量集中,光照充足,季风明显。年平均气温 9.2℃,7 月最高气温 24.12℃,1 月平均最低气温 -8.1℃(参见《好搜百科》绥中县)。

绥中坑顺治钱据说发现于河床砂坑,受河水影响,土壤的酸碱度不明显。

2.主要品种。

据绥中泉友介绍,绥中坑发现古钱币数万枚,除少量明钱外,大部分为顺治钱。主要品种有户、工、原,背一、背二、上圈,右同、上蓐、右蓐,左延、右延等。最大贡献是发现了一批上蓐钱。

3.典型锈色。

绥中坑的典型锈色是红绿锈,又称枣皮红。还有少量蓝锈,也有不少钱保持了水坑锈或原铜光。

4.化学成份。

2015 年 4 月,曾通过佟昱先生委托中国钱币学会和华夏古泉网扫描电镜中心,检测了近 70 枚钱的化学成分,其中绥中坑受检两种。

其一, 缶宝右工。含铜 55.58%, 锌 36.15%, 铅 4.29%, 锡 0.73%, 铁 0.87%, 铋 1.4%。

其二,右蓐。含铜 72.55%, 锌 13.78%, 铅 8.44%, 锡 2.15%, 铁 1.01%。

从合金成份看,两种钱差别较大,说明不同钱局的合金配方不尽相同。

5.著名版别。

(1)缶宝右户

参数:直径 25.2 毫米,厚 1.3 毫米,重 3.5 克。

特征:面文为缶宝双点异头通版,背面分狭缘与阔缘两种版别,狭缘亦称长尾昂户,阔缘又称短尾降户,后者至今仅两见。

材质:黄铜。

等级:二级(图 1)。



图 1 缶宝右户

(2)缶宝右工

参数:直径 25.8 毫米,厚 1.3 毫米,重 3.3 克。

特征:面文仍为缶宝双点异头通版,按背面特征,亦分狭缘和阔缘,但绥中坑只有狭缘。

材质:黄铜。

等级:三级(图 2)。



图 2 缶宝右工

(3)缶宝右同

参数:直径 25.3 毫米,厚 1 毫米,重 2.8 克。

特征:狭缘中郭,背阔缘,面缶宝双点方头通光背版,背宋体右同,开元泉社拍品。

材质:黄铜。

等级:二级(图 3)。



图 3 缶宝右同

(4)阔缘右户版右延

参数:直径 25.6 毫米,厚 1.1 毫米,重 3.6 克。

特征:阔缘右户版面文,背右延,亦称凤冠通版,正样,原水坑锈。此版小样略多,大样仅 1 见,正样二见。

材质:黄铜。

等级:二级(图 4)。



图 4 阔缘右户版右延

(5)上蓐

参数:直径 25.6 毫米,厚 1.4 毫米,重 4.1 克。

特征:右户标准版面文,狭缘细郭,背广草蓐,或称大蓐,钱文清晰,品极美。

材质:黄铜。

等级:五级(图 5)。



图 5 上蓐

(二)中原坑

中原坑即河南坑,重点是许昌坑。许昌坑是指2003年在河南省许昌市境内发现的顺治钱。

1.地理与气候。

许昌市位于河南省中部,中原腹地,因上世纪八十年代莲花被尊为市花,所以又称“莲城”。

许昌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是群雄逐鹿,兵家必争之地。平均海拔72.8米。属暖温带季风型气候,地理位置位于中原腹地,伏牛山脉东麓,中岳嵩山(古外方山),方山(古龙山)以东,颍河,清潁河,北汝河,蓝河,双洎河,石梁河等,白沙水库,纸坊水库,佛耳岗水库,十几条河流湖泊纵横交错,山川河岳秀美绵长。南水北调中线大运河,西气东输天然气管道经过境内。

许昌地处中华腹地,九州之中,十省通衢。北临万里黄河,西依中岳嵩山,东、南接黄淮海大平原,介于东经 $112^{\circ}42'$ ~ $114^{\circ}14'$,北纬 $34^{\circ}16'$ ~ $34^{\circ}58'$ 之间。

许昌是一座平原城市,属北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4.3°C ,平均降水量640.9毫米。她四季分明并各具特色,一年中7月最热,平均气温 27.3°C ,1月最冷,平均气温 0.2°C (引自《360百科·许昌》)。

2.主要品种。

据河南泉友介绍,许昌坑共发现顺治钱约4000多枚,时间跨度从顺治早期光背钱到中期一厘钱。如:上户版光背,尔宝光背版,缶宝光背版,光背记号钱,上工、右延、江一厘等。

3.典型锈色。

许昌坑的典型锈色是灰白色锈,这是铜钱中铅含量较高的原因。也有少量红绿锈和在碱性土壤中形成的朱砂锈。

4.化学成份。

许昌坑只抽测了两枚钱的化学成份。

其一,等川顺尔宝光背版单点角通。含铜57.38%,锌34.41%,铅3.93%,锡0.77%,锑1.52%,铁0.84%。

其二,缶宝单点异头通。含铜58.32%,锌32.37%,铅4.72%,锡0.84%,锑2.04%,铁0.84%。

根据合金成份测定,这两枚钱的合金成份比较相近,说明二者铸地相同。

5.著名版别。

(1)尔宝光背版上工

参数:直径26毫米,厚1.2毫米,重量不详。

特征:阔缘中郭,大样。尔宝光背版面文,等川顺,单点角通,开足宝,背上退工。

材质:黄铜。

等级:一级(图6)。



图6 上工

(2)阔缘右户版右延

参数:直径25.5毫米,厚1毫米,重量不详。

特征:阔缘正样,阔缘右户版面文,凤冠通,背右延。

材质:黄铜。

等级:二级(图7)。



图7 阔缘右户版右延

(3)上下左右接郭星

参数:上接郭星直径26.5毫米,厚1.1毫米,重4克。

下接郭星直径26.4毫米,厚1.1毫米,重4.1克。



图8 上下左右接郭星

左接郭星直径 26.6 毫米,厚 1.3 毫米,重 4.5 克。

右接郭星直径 26.7 毫米,厚 1.2 毫米,重 4.3 克。

特征:尔宝长川顺光背版面文,单点角通,背接郭星,常成组配套,亦称套子钱。

材质:黄铜。

等级:左接郭星七级,余八级(图 8)。

背记号钱尚有背上星,上右和下右双接郭星,不一介绍。

(4)标准版(大江)江一厘

参数:直径 27.1 毫米,厚 1.3 毫米,重 4.7 克。

特征:铸工精良,铜质细润,狭缘中郭,穿郭方正,地章平整,声音纯厚,器形完整。钱文为江西标准版大江版,字郭深峻,正背被朱砂锈,轮边泛原铜光,色浆老旧,直边未流通,保存状态极好。

材质:黄铜。

等级:六级(图 9)。



图 9 标准版(大江)江一厘

(三)西北坑

西北坑一般泛指山西、陕西、内蒙、宁夏、青海等地。西北坑顺治钱现在主要指山西大同坑。大同坑是指 2010 年至 2012 年间在山西大同发现的顺治钱,这些钱被称为大同坑。

1.历史地位、环境和气候。

大同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位于山西省北部,北邻内蒙,东望河北、距北京 380 公里,南到太原市 352 公里,实为首都之屏障、全晋北方之门户,且扼晋、冀、内蒙之咽喉要道,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历史上大同曾为三代京华、两朝重镇,在清代以前无不派名将镇守,既防外来侵略又保京师安危,被誉为“北方锁钥”(参见《好搜百科》大同市)。

就地解决军饷,是大同市设炉铸钱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魏时期,酈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详细记载了魏都大同城的环境状况。在《玄中郡志》中还记载着大同景物“滴翠流霞,川原欲媚,坡草茂盛,群羊点缀……挹其芳澜(澜——作者),郁郁可冷。”

气候。大同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受季风影响,四季分明,令人喜爱。

年气温:春季 6.5~9.1℃,夏季 19~21.8℃,秋季 5.8~8.4℃之间,冬季长达四个月,平均气温 -12.8℃~-6.3℃。

降雨量分布:春季占 14.6%,夏季 64.3%,秋 19%,

冬季 2.1%(参见《好搜百科》大同市)。

2.主要品种。

大同坑是近几年来顺治钱最重要的一次发现。批量大,新版多,锈色好。这些钱中,除部分明钱外,大部份是清钱,清钱中绝大部份是顺治右“同”字钱,也有少部份顺治西北光背版,背二、上原,右同版右户,左右延等。

3.典型锈色。

大同坑基本锈色是薄绿锈,杂有少量灰白锈,朱砂锈等。

4.化学成份。

大同坑抽测了两种顺治钱的化学成份,瘦页狭治和右小同。

其一,瘦页狭治。含铜 69.97%, 锌 17.9%, 铅 8.75%, 锡 1.74%, 铁 1.36%。

其二,右小同。含铜 60.66%, 锌 23.83%, 铅 11.28%, 锡 2.94%, 铁 0.46%。

从化学成份看,两种钱的合金配方比较接近,高铅,都不含锑,材质较好,铸地应该相同且在大同。

5.著名版别。

(1)长川顺背二大样

参数:最大直径 28.5 毫米,厚 1.7 毫米,重 6.2 克。

特征:顺字“川”部长,并足顺,凤冠通,离点宝,等横二。此版是顺治背二中的普通版式。大同发现顺治背二约十余枚,直径到 28 毫米以上的约 5 枚左右,其中 28.5 毫米直径的仅见。

材质:黄铜。

等级:三级(图 10)。



图 10 长川顺背二大样

(2)右户版光背

参数:直径 25.6 毫米,厚 1.3 毫米,重 4.2 克。

特征:右户版面文,光背。初,此版钱币界都误以为是改刻品,大同一次发现数枚,方证其真。

材质:黄铜。

等级:四级(图 11)。



图 11 右户版光背

(3)右同版左分头延

参数:直径 25.8 毫米,厚 1.4 毫米,重 5 克。

特征:面狭缘细郭,背阔缘中郭,右同版面文,背延字“走之”与“正部”上分下合,故名。

材质:黄铜。

等级:三级(图 12)。



图 12 右同版左分头延

(4)右同版右延

参数:直径 25.7 毫米,厚 1.2 毫米,重 4 克。

特征:面狭缘,背阔缘,中郭,右同版面文,背右延。

材质:黄铜。

等级:二级(图 13)。



图 13 右同版右延

三、典型坑口的意义

熟悉顺治钱典型坑口,对于顺治钱版别研究和收藏,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提供了鉴别真伪的标准。

这几个典型坑口发现的顺治钱,批量较大,版别较多,锈色典型,专家认可,钱币界公认,因此,可以作为鉴定顺治钱真伪的标准器。全国其他地方零星发现相同的版别钱,只要和“标准器”进行比对即可。

第二,揭示了顺治钱的典型锈色特征。

大清入主中原,从顺治登基做皇帝至今,也仅 370 余年。在顺治五式钱中,从光背至中期一厘钱式以前,生坑钱较多,背满文钱以后,则较多传世钱。三地发现的顺治钱,其锈色特征可以概括为:“生坑薄锈,色泽鲜艳,天生丽质,自然天成”。为什么“薄锈”会成为顺治钱典型坑口的主要锈色特征?一是铜是化学成份比较稳定的金属,顺治朝相去不远,不可能形成很厚的锈。二是地理和气候因素。三大典型坑口基本上是北方坑,气温相对较低,雨量相对较少,土壤相对干燥,土质化学成份对钱体的氧化程度影响较小,有的本来就是罐装品。但即使是南方,如广东坑、浙江西溪坑、广西坑、湖北坑,锈可能略厚一点,但也绝不会“堆积如山。”另外,

顺治钱的锈大多并不入骨,多打几次拓片,锈就会脱落。使生坑钱变成熟坑钱。这既是顺治钱年代特征的体现,也是收藏者应加以注意的问题。三是锈是自然形成,是与生俱来,没有任何人为的因素和痕迹,保持着原生态,扫描出来的图看上去像一幅油画一样美丽。

第三,为新版别的认定提供了依据。

比如右延,至今共发现三个版:狭治版、右同版、右户版。而右同版右延的认定,却是在大同坑之后。右同版右延最早在台湾鸿禧美术馆出现,那里收藏了两枚传世品。后转让给了新加坡景福斋主人陈光扬。其中一枚后拿到北京华夏古钱网拍卖,被钱币界误以为是改刻品。大同坑一次发现了 4 枚右同版右延,方证其真。然而,许多顺治钱藏家却失去了一次检漏的机会。再如右户版光背的发现和认定的经历也大致如此。

第四,推动了钱币文化的传承。

首先,收藏就是一种传承。钱币收藏标志着社会精神消费力水平的提升,使收藏者的收藏欲望得到了满足。钱币收藏是保存和欣赏自己所喜欢的钱币的文化娱乐活动,就像钓鱼一样,不在于钓到的鱼能值多少钱,而在于这个过程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钱币收藏是一种持续进行的活动,需要有资源的支持。那些一眼看真的钱,尤其会受到收藏者的欢迎。

其二,推动了钱币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在中国钱币史上,以前清代小平钱很少受到藏家和学者的重视。2006 年以前,中国就没有一部自己编的《顺治钱谱》。实物少,资料不足,编钱谱难度也很大。典型坑口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源不足的矛盾。最近三十年来,随着实物不断有新的发现,中国钱币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发现,新认识,新著作层出不穷,但是,理论探索离不开钱币实物研究的支持,只有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理论,才能有更强大的说服力。同时,典型坑口钱从实物角度印证了史料记载,使史料记载变得更具体、更直观,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清晰、从无形到有形的跨越,从而也为相关顺治钱断代提供了依据。

其三,推动了顺治版别钱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顺治钱见诸专门《顺治钱谱》,最早是 1975 年日本人埴史朗编的《顺治钱谱》,共 623 图,去掉私铸、安南铸、参考品外,余 534 版。2006 年佟昱先生著《顺治通宝钱谱》,版别数比日谱有所增加,而即将出版的《新编顺治通宝钱谱》,版别增加到了近 1100 个,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三大典型坑口特别是山西大同坑,新发现的版别钱约占新谱的 10%,这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和贡献。

顺治钱坑口很多,但大多数量不大,品种比较单一,限于篇幅,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

此文曾经佟昱先生修改,在此仅致谢意! ▲

注:本文彩图,均来自网络。

湖北沙市近代票号业与钱庄业考

夏红艳

沙市位于湖北省的中南部,长江中游北岸,清时为荆州府江陵县沙市镇,解放后曾一度为湖北省辖市,今已改为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沙市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可上通宜昌、重庆,下接武汉、九江、芜湖、南京,直达上海等大中城市,交通便利,商业发达,贸易繁荣。沙市又是联结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水网地区的枢纽,历史上,一直都是两湖平原上的物资集散地,尤其是江汉平原的重要粮棉集散地。沙市曾是驰名中外的中国古代四大米市(芜湖,沙市,九江,无锡)之一。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将其开辟通商口岸后,沙市商业又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商业贸易和经济的繁荣,必然促进货币流通和金融业的发展。清代光绪初年,沙市镇地区的主要金融机构,为民间票号和钱庄(又称钱号或钱铺)。光绪末年,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开始逐步设立。辛亥革命以后,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和钱庄业得到了发展,票号业从此开始消亡。钱庄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营业额上,都曾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甚至光彩夺目一时。

沙市镇,是湖北省中小城镇的典型代表,借此机会,就沙市票号及钱庄业的成长、壮大、发展到消亡的整个过程,加以简要介绍。

一、沙市票号

(一)沙市票号出现的时间

在诸多有关沙市票号的地方文献中,关于沙市票号的论述,多从光绪初年开始。沙市票号从何时出现,未见专门介绍。

实际上,沙市票号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以前就已存在。

1.据《山西票号史料》中《道光末年蔚泰厚苏州分号、日新中票号北京分号汇兑交收统计表》得知: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蔚泰厚苏州分号”全年收汇银账目中,在分别汇往的14个城镇中,其中就有沙市镇。

此账目充分证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以前,蔚泰厚票号在沙市镇,已有汇兑业务。也就是说,蔚泰厚票号在沙市设有分号。

2.据《山西票号史料》中《三家票号分号分布统计表》的统计,仅日昇昌、蔚泰厚、日新中三家票号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以前,已经在北京、张家口、苏州、汉口、广州、长沙、常德、汴梁、济南、西安、成都、重庆、扬州、清江浦、河口、三原、天津、芜湖、周口、屯溪、南京、沙市、盛京等32个城市设立了35处分号。其中,蔚泰厚在沙市设立分号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以上史料所载都充分证明,在道光二十七年以前,蔚泰厚票号已经在沙市设有分号。

(二)清代沙市的票号业

光绪年间,沙市票号,多为山西帮开设。票号的经营业务,主要是采用汇票方式,拨兑款项,兼做存款、放款。加上资金丰厚,又与官场勾结,获利甚丰。

山西票号分布于21省(十八省及东三省)及蒙古、新疆等地,其中,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及沙市等地,为票号设立最多的市镇。其中,山西、直隶、江苏、湖北、四川等五省,为最多。显然,湖北省、汉口、沙市均列其中。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沙市大约有票号17家,即中兴和、百川通、大德通、大德恒、三晋元、长盛川、存义公、蔚盛长、蔚丰厚、蔚长厚、蔚泰厚、新泰厚、协同庆、日升昌、天成亨、乾盛亨、永泰发等。

票号多为私人或官吏筹办,其中,“中兴和”票号系沙市本地一位邓姓巨富所开,其余全为山西帮所设。沙市票号在汉口多设有同号联庄,在全国诸多省份的通商大埠,也往往有联庄。

沙市票号多集中在三府街,该街为沙市商贾云集之地,今为中山路中青杨巷与白杨巷(白杨巷到新建街口)之间的一段。

中山路,系1932年在刘家场、三府街、青石大街的基础上,分四期扩建成的一条大马路。1934年4月竣工,为纪念孙中山而命名为“中山大马路”,据称,当时该马路“实为本埠唯一主干道”,成为当时沙市的主要街道和商业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沙市有票号11家。据《日本驻沙市领事代理事务本部岩彦明台四十年(1906年)一月二十九日报告》载:

“票号之在沙市者,有11家,银票之扣色、借出、存款及买卖汇划,与日本之银行无异,而其方法则有大异。”

辛亥革命后,因前清官吏提款外逃,放款又不能收回,资金来源缺乏,票号而纷纷倒闭。

二、清末时的沙市钱庄业

光绪时期,沙市钱庄又称钱铺,主要从事存款、放款业务,或在买汇、卖汇中赚取汇水,即收手续费。同时,大部分钱庄,还自行发行各种钱票,用于流通。

据文献记载,光绪二十年,沙市钱庄发展到二十余家,但是,具体名称不祥。

光绪十年到二十四年期间,上海出版发行的《点石斋画报》上,有两幅与沙市钱庄有关的趣闻故事图画,题名为“赚脏”,值得一读,其载:

“清末湖北沙市的钱铺,全凭帖为周转。其中‘戴长

泰钱铺’实力最为雄厚,每日出入多至数百千。该店店章规定:每票一纸,计钱一千文,每百票为一束,每天营业结束后,店伙即将钱票交执事人结账。某日,店伙交千票时发现少了四束。甲、乙、丙、丁四个伙计皆张皇失措,遍收而不得。店主得知此事后,不慌不忙地说:“明日再说。”第二天中午,店主设宴款待四伙计。宴毕,店主说:“如果你们想保住名声,我有一办法。”众人问:“什么办法?”店主说:“现在你们四必须在一起,谁也不准走开,大家一起到各家房门外,本人不准入室,对家人喊话:‘昨日携归之物,已被同事侦知,快把原物拿出与大伙均分,以免坏事。’如家人没有反应就到下一家照说。”众人皆说可以,并邀庄主同行。到了甲、乙两家,如此这般都没有反响。又走到丙家,让丙某如前教喊话,其母马上拿二束钱票出来。甲、乙、丁三位又要丙呼其妻,丙妻也将二束钱票拿出。至此真相大白。第二天丙某突然逃逸。”

此段趣闻,除介绍破案故事之外,还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光绪十年到二十四年期间,沙市有一家名叫“戴长泰”的钱庄,系沙市钱庄中实力最为雄厚者,其每天的经营数额,高达数百千(串);同时,该钱庄还自行发行民间钱票(钱帖),用于周转,通常每张钱票面额为一千(串)文。这一情况,也已为目前发现的清末沙市民间钱票所证实。

据说,到辛亥革命前夕,有久庆余、裕茂得、谦裕得、人和、荣泰、晋安等三十余家。

三、民国初期的沙市钱庄业

辛亥革命时,像诸多票号一样,沙市部分钱庄,也因缺乏资金而倒闭。

民国三年(1914年)前后,为了解决沙市市场流通货币的急需,沙市商会组织了公钱会,发行钱票。

在局时逐步稳定以后,由于沙市在地理环境、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方面所具备的得天独厚优势,沙市钱庄业,也很快就得到恢复和发展。

民国九年(1920年)时,沙市的钱庄业已得到快速发展,并具有一定的规模。据《湖北全省实业志》的统计,资本在5000元以上的钱庄,当时汉口有94家,其资本最多者,仅有2万元、3万元左右,共11家;而小小的沙市镇,资本在5000元以上的钱庄,就有62家,在省内,仅次于汉口。但诸多钱庄的资本额,却远高于汉口的钱庄。

例如,沙市钱庄资本为9万元者:有裕通一家;8万元以上者:蔚长厚一家;7万2千元以上者:裕成美一家;6万元以上者:晋义昌、亨泰二家;5万元者:有庆和太、德成美、同顺成、鄒万兴、义成美、鼎新长六家;4万元者:有庆和祥、裕昌恒、吉祥兴、瑞泰裕、集庆昌、光明正、宝丰、德成厚、天成玉、庆昌、元宝成、永大利、德源十三家。

据民国十二年(1923年)八月十五日《钱业月报》卷3第7号的调查,沙市有钱庄86家,即“裕茂德、裕

泰祥、义和永、复运昌、福泰长、永源长、同义生、裕成美、道生、鼎新长、福兴祥、茂兴元、同钰、裕亨、裕泰、丰裕、德升炳、聚美成、蔚合泰、协成、瑞康、瑞安、炳兴昇、裕盛、洪兴合、其昌永、茂昌义、裕源长、天成玉、德成生、积庆长、德源、华丰、积裕恒、宝兴、天庆祥、祥源、德成福、同福、同心合、源盛、恒泰益、协昌、茂生祥、合丰、德厚祥、福盛荣、信泰、镒丰、益厚生、吉康、立生、永和长、庆春钰、泰康、大有恒、慎余、宏兴德、集厚祥、厚康、庆和泰、汇源长、晋成、恒和昌、大昇、义盛、庆合长、泰生恒、玉丰、庆长元、恒丰裕、恒茂合、裕生厚、福生元、森茂恒、永顺昌、永新顺、茂森、义兴合、集厚昌、恒庆昇、寓通、志成、公益、敦济、同益等。”

据民国十三年(1924年)五月《汉口商业月刊》的“沙市钱业之调查”载:当时沙市有钱庄97家,它们是:“福泰长、永源长、鼎新长、积庆长、裕源长、永和长、汇源长、汇通长、庆合长、裕顺长、裕泰、信泰、鼎泰、义泰、庆合泰、蔚合泰、泰康、厚康、协康、义康、吉康、鼎康、同利、同康、同德、同钰、同福、同义生、志成、丰成、协成、积成、有成、久成、晋成、聚美、集大成、集厚祥、德厚祥、天庆祥、福兴祥、裕泰祥、祥源、德源、源盛、源合、裕茂德(得)、裕成美、裕大、裕盛、裕华、裕通、裕隆、裕盛原、丰裕、德丰、恒泰益、恒久、益厚生、瑞安、义盛、钰丰、恒合昌、恒丰裕、立生、豫享、大升、恒盛合、恒庆昌、恒茂合、道生、德成、生慎、余永益、德兴、敦济、丰裕合、大有恒、裕兴合、茂兴元、福生元、森茂恒、泰升恒、长顺炳、庆昌元、永兴恒、天成玉、德升炳、炳兴升、积裕恒、集厚昌、复昌、茂昌义、庆春钰、福盛云、宏兴德、德成福等。”

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月,北伐军攻占武汉,第二年初,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此时,沙市的钱庄中,仅有与北洋政府官吏资本有关联的部分钱庄,受其影响而倒闭。

民国十六年(1927年)时,沙市有钱庄104家,从业人员有1226人。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沙市的钱庄数量,已达100多家,其中有裕成美、致华、永安、丰成豫及汉帮的公益、公和、公成等。可以说,此时是沙市钱庄业的鼎盛时期。

四、“沙市票潮”的影响

民国十五~十六年(1926~1927年)期间,由于北洋军阀控制的湖北官钱局倒闭、武汉国民政府采取“现金集中”,以及“宁汉分裂”等金融政策的影响,汉钞停止兑换,造成沙市市面现金奇缺。于是,沙市镇的大小商家、钱庄、典当铺,甚至个人等,大量发行民间钱票(湖北省民间一般称作“市票”)。其中100多家钱庄和12家典当铺,几乎家家都发行钱票,形成沙市发行民间钱票的又一个高潮。

据统计,民国十六年时,沙市镇民间钱票的发行额,已达7500万串,但到民国十八年时,据湖北省财政厅的调查,沙市镇民间钱票的发行额,又猛增至1亿串

以上,几乎家家缺乏储备资金,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

考虑到全省诸多市县村镇,大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类似问题,为此,湖北省财政厅,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冬季,特发布《取缔各县市票暂行条例》,要求全省各县,于民国十八年六月四日以前(后又延期到八月四日以前),全数收回发行的市票,禁绝期满后,绝对不准发生或行使市票。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下半年,在取缔市票期限即将到来之时,沙市市民纷纷开始兑现市票;加之,沙市当时驻军五十一师师长范长生,为筹措军饷,又借机火上加油,实行坚决措施,勒令各家限期收回市票,过期作废,违者收监,关押严办。由于发行钱票的诸多商家,缺乏资金,无力兑现,而开始出现倒闭浪潮。

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一月六日,丰成豫钱庄、惠工车业公司、丰成米厂,首先因巨额钱票无法兑现而倒闭。七日、八日,公和、集大成、震兴、同义、兴昌等六家钱庄或商家,又发生挤兑闹市现象。在此影响下,随之沙市全镇爆发了轰动一时的民间钱票挤兑风潮。

几天之内,沙市百余家钱庄、典当铺及无数大小商家,因相互牵连、相互影响而产生连锁反应,纷纷倒闭关门。

这一现象,一直到民国十九年上半年,还在不断发生,给沙市商业、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其影响之深,数年难以恢复原气。

遭受这一打击之后,沙市的民间钱票,从此基本绝迹,而不再发行。

五、沙市钱庄的恢复时期

在沙市出现民间钱票挤兑风潮之后,“荆沙市票委员会”负责善后处理与补救,并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六月三十日,提出了一项《荆沙市票倒塌之救济办法》,其中,提到了要采取措施救济的沙市商家名单中,有裕通、志成、有成、益(义)康等钱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沙市钱庄恢复到22家。其中,按资本划分,2—3万银两者,4家;1—1.5万银两者,12家;8千银两者,4家;6千银两者,2家。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在“沙市票潮”后成立的“沙市钱业公所”基础上,改组为“沙市钱业公会”。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时,沙市钱业公会的会员有,谦信、谦裕、晋安、荣泰、久余庆、茂盛六家。

到抗日战争前夕,政府正式列入统计的钱庄有9

表1 民国二十五年沙市钱庄表

序号	钱庄名称	设立时间	资本,元	股东	经理	地址
1	久余庆	民国十七年	8000	吴春		中正一街
2	茂盛	民国二十二年	6000			
3	晋安	民国十八年	40000			中山一街
4	裕茂得(德)	民国九年	10000			中正一街
5	荣泰	民国十六年	20000			中正二街
6	积祥	民国二十四年	5000			
7	懋生	民国二十一年	4000			中正二街
8	谦裕	民国十九年	5000			
9	谦信	民国十四年	5000			中山二街

家。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全国银行年鉴》和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出版的《湖北省年鉴》统计,沙市9家钱庄的基本情况,见表1。

六、抗日战争时期的沙市钱庄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八日,沙市被日军占领。沙市钱业公会,便自行解散。在沦陷期间,沙市市面上参与经营者,多为钱桌业,主要从事日本军用票和法币的交还业务,大约有14家。据说,在此期间经营的,还有少数钱庄,其中所知者,仅裕和钱庄一家。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组织成立了“江陵县沙市镇钱桌业同业公会”。

七、解放前夕的沙市钱庄业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此后,沙市钱庄业开始逐步恢复经营。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沙市商会列入复员的钱庄有24家。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十一月十八日,沙市钱业公会筹备会成立。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沙市钱庄中,有18家钱庄,被沙市商会作为正式会员,列入摊派月捐的会员名单之中。

据沙市《商会卷》219卷的统计,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时,沙市有钱庄36家:

中正街有:同益、恒昌和、聚源、上江、晋安、久康、鸿大、裕生厚、恒和、信孚(昌)、晋安裕、公益、志和、久和、厚生、亿中、长丰、义成美、义太恒、谦信恒、裕沙、庆隆、永隆、元源、恒茂;

中山路有:祥泰、元通、福沙、竞业、通泰、恒源、安裕、安利、汇通、福太长等。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年底,沙市庄钱只剩20家,其中有3家申请停业。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四月,沙市有庄钱25家;五月又增信和钱庄一家。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金圆券严重贬值,如同废纸,钱庄业务难于经营。

解放前夕,沙市的钱庄均未经正式报批,此时名义上有钱庄32家,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据《沙市金融志》记载,其具体名称是:久和、通泰、厚生、聚源、裕茂得、鸿大、竞业、恒和昌、志和、永隆、信孚、安利、公益、亿中、长丰、上江、义太恒、久康、元通、义成美、谦信恒、裕福、裕沙、瑞生、同益、庆隆、汇通、正裕、厚成、恒元、裕生厚、宏裕等。

八、解放后的沙市钱庄业

1949年7月15日,沙市解放,不久,沙市从江陵县分出,设立湖北省辖市。

1949年9月,经沙市军管会财经处批准,有11家钱庄,获准开业。

随着国家金融政策的变化和国家银行职能的逐步完善与发展,钱庄业原有职能和作用,(下转第70页)

试述金代纸币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启示

苏利德

(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一、金(女真)代的货币

公元12世纪,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日益强盛。1115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在东北地区会宁府建立大金国。1125年金灭辽。1126年1月,金军南下攻陷宋汴京,虏徽、钦二帝。1149年完颜亮海陵王即位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与南宋成相持对峙的局面。1151年海陵王颁发《议迁都燕京诏》,作迁都准备。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建立女真族封建制政权。女真族原来过着渔猎和游牧生活,金建立政权后,受汉族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并实行屯田制,奖励开荒。金熙宗后又实行“计口授田”,使农业及产量达到较高水平。金代的手工业如纺织、陶瓷、造纸、冶铁、印刷等生产发展较快,商业也随之发展,设有“市令司”专门管理商业,还颁布了商税法。当时金宋间的贸易很频繁,相互在沿边地区设置了榷场,南宋向金输出各种农产品、茶、丝织品等;金向南宋输出皮毛、人参、珠宝等。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金朝货币经济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金在建国初期未有铸钱,一直使用辽宋旧钱。迁中都后,钱、钞并用,设“交钞库”发钞。铜钱主要来自宋流入的钱币。到了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才开始议铸铜钱,禁铜外流,并将民间铜器运中都等地铸造铜钱“正隆通宝”。官府专门设置钱监掌管铸钱事宜。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禁止民间私铸钱,大定十八年铸“大定通宝”钱,有铜铁平钱,钱文汉字楷书,背郭无文。铜银合铸折二钱,还有当十大钱。到了大定十九年铸钱16万余贯。当时金朝钱币缺乏,不能满足流通需要,加上民间销毁和藏匿,铜钱更为紧张。

大定二十九年京师和节度州增置流泉务28所,代州阜通、曲阳利通二监,岁铸铜钱14万余贯,但成本高达80万余贯,铸钱不够成本,乃下令停铸。金章宗时期是金政治经济鼎盛时期,集百官拟议增铸钱。主要措施是采铜和限制制造铜器,包括可以听任百姓冶铜,由官府收买,寺庙不足10人者不许藏法器。民间铜器限两个月内送官府按价收买。

金朝由于铸币不足,开始发行纸币,称交钞。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在中都设交钞库和印造钞引库,仿北宋交子发行纸币,交钞与铜钱并行。交钞有大钞和小钞两种,大钞分1、2、3、5、10贯五等;小钞分100、

200、300、500、700文五等。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发行贞祐交钞,面额有20、50、100、200、1000贯五等。

金王朝很早就在流通领域使用白银。金陵王曾首铸银铤重50两,1两合钱2贯。这种银货币民间用以买卖商品。金章宗后期由于连年战争,军费大增。大量发行交钞,一贯以上大钞很难在市面上疏通。承安二年(1197年)便铸造“承安宝货”银币,银币铤形,从1~10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2贯。承安宝货银币具有固定形式、重量和面额,不能截凿使用,已具有铸币的特点,是我国有法定计数银铸币的开始。该银币流通不久就出现用掺杂铜锡办法盗铸,到了承安五年末,便停止“承安宝货”银币的流通行使。

二、金代内蒙古使用货币情况

金与宋、西夏及北方各民族之间的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主要是通过双方设立的榷场贸易来完成的,与宋朝的榷场贸易活动尤为活跃。金朝境内设置许多榷场,并订有榷场贸易制度。在今内蒙古地区金朝故地设置的榷场即有燕子城(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南)、翔平(今赤峰市林西县北塔子)、净州天山(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西北)、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东郊)、东胜州(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和辖里尼要(今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炮台营子西南)等多处。金宋双方榷场的贸易额也是相当大的。通过这些贸易活动,金朝从宋商那里征得大量现钱,充实了钱币实物。同时,民间商品交易也相当频繁。

金朝的货币流通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使用铜钱,以辽宋旧钱为主。第二阶段钱钞并用,以钱为主。第三阶段银钞兼行,以钞为主。第四阶段币制崩溃,出现官用钞、民用银或实物交换的混乱局面。据此,金朝货币可分为铜钱、银铤和纸币三大类。

(一)铜钱

1.皇统元通宝。金熙宗皇统年间所铸,为《金史》所漏记。此钱十分罕见,且对其真伪多存疑义(图1)。



图1

90年代初,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大井城乡红土湾村发现1枚“皇统元宝”,系当地出土品,钱径24毫米、重3.4克。钱文篆书,质地为白铜,铸工精良,品相极佳。

2.正隆元宝。为金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年)所铸(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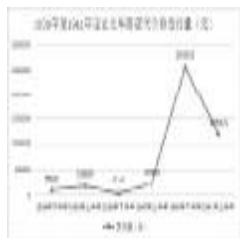


图2

1964、1965年间,呼和浩特市郊区白塔附近的辽金丰州古城遗址中出土了2万多枚古钱。其中有44枚“正隆元宝”,虽均属常见品,但制作十分精美,品相均佳,钱径25、穿宽6.5毫米。

1966至1976年间,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台基庙乡金代威宁县遗址出土的大量古钱中,发现十几枚“正隆元宝”。1974年,鄂卜坪村出土一处金代窖藏钱币约125公斤,也发现有“正隆元宝”。1979年卓资县三道营乡榆树营村北大黑山南坡出土金代窖藏钱币,其中有“正隆元宝”3枚,均为小平钱,钱文楷书,铸制精美,钱径25毫米。1984年,兴和县南湾子乡明胜村出土金代窖藏钱币约100多公斤,其中“正隆元宝”有20枚。同年,在察右前旗礼拜寺乡出土元代窖藏钱币中有3枚“正隆元宝”。1986年,卓资县大榆树乡南沟村出土金代窖藏钱币6.5公斤、925枚,其中年代最晚的是“正隆元宝”。一泉友藏有1枚背星月纹“正隆元宝”小平钱,直径25.2毫米、重4.04克。1990年,商都县小海子乡八号村一次出土“正隆元宝”125枚,钱径一般为26毫米、重3.2至4克,制作精美。窖藏钱币部分粘有铁锈,可见其中有铁钱。90年代,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白家营乡、凉城县张生界村、商都县西坊子乡均出土发现有“正隆元宝”钱。

80年代,在兴安盟科右中旗、赤峰市郊区、包头市固阳县、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等地出土的金代窖藏古钱中,均发现有“正隆元宝”,但钱径、重量不一。

90年代,通辽市扎鲁特旗、科左后旗陆续出土了几批窖藏古钱币,都有少量“正隆元宝”。

呼和浩特市一收藏者藏“正隆元宝”20多枚,钱径24.3至25.1毫米、重3.1至4.8克。其中一枚五笔“正”钱,钱径24毫米、重3.4克,铜质铸工均佳,钱文笔划坚挺,结字与一般平钱有异;一枚“正隆元宝”折二钱,系1996年四子王旗出土,属仅见品,青铜质,直径28.2毫米、重3.6克,外郭宽达3.1毫米,与所出官铸“大定通宝”阔缘折二钱的风格一致,当属官铸品。

3.大定通宝。为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所铸(图3)。



图3

60~70年代,呼和浩特市郊区、清水河县、托克托县东胜州故城都出土发现有“大定通宝”,其中托克托县东胜州故城出土的“大定通宝”有背“酉”字者。

1966至1976年间,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商都县均发现出土有“大定通宝”,其中有背穿下“酉”、“申”,尤其是兴和县叭沟村发现的背下“酉”字、上圈星纹钱为铜质小平,直径25.4毫米、重3.85克。这一版别尚属首次发现。

1985年,包头市画匠渠一次出土“大定通宝”279枚,含穿上申、酉,穿下酉,肉双孔等7品。其中1枚铅质“大定通宝”有残损,系首次发现。

此外,赤峰市当铺地乡、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都出土发现过“大定通宝”。

除上述常见的“大定通宝”之外,还有一些别品“大定”钱。有从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收集到的鎏金铁“大定通宝”,直径24毫米、重3.62克;还发现有鎏银铜“大定通宝”钱;白铜异书“大定通宝”背“酉”;八边形白铜“大定通宝”,钱径(对角)22毫米、重3克,素背,内郭微有四决,且郭与钱文均异于其他已刊铁钱或铁范铜钱。

4.泰和通宝、泰和重宝。为金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年)所铸(图4)。



图4

内蒙古地区出土发现的泰和钱数量虽少,但品种却较丰富。

1967年,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城卜子村(元代净州路城址附近)出土1枚“泰和通宝”背“三十”新品,直径40毫米、重24.6克。此钱诸谱无载,亦未闻有“三十”者。90年代初,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大井城乡红土湾村发现1枚“泰和通宝”折二钱,为当地出土品,钱径27、穿宽9、厚1.5毫米,重6克;钱文楷书,十分美观。1992年,在四子王旗发现1枚篆书“泰和重宝”合背四

柱异品,该钱直径 43 毫米、重 40.2 克,略大于《历代古钱图说》所录品,似未流通行用过。此钱有说是元朝后铸。类似的“泰和重宝”合背钱在东胜州故城亦有出土,品相颇佳。集宁一泉友介绍 4 枚不同版别的篆书“泰和重宝”折十钱。一品阔“和”小字型、一品阔“和”大字型、一品长“和”小样型、一品长“和”大样型。商都县西坊乡也出土“泰和通宝”、“泰和重宝”各 1 枚。

1985 年,包头市画匠渠元代窖藏中发现 1 枚“泰和通宝”,品相极佳。

5.阜昌元宝、阜昌通宝、阜昌重宝。为金朝统属下伪齐政权刘豫于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 年)所铸(图 5)。



图 5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十八顷乡出土 1 枚“阜昌通宝”,钱径 30 毫米、重 6.8 克。该钱铸工精良,钱文楷书。



图 6

6.贞祐通宝。元宝为金宣宗贞祐五年(1217 年)所铸(图 6)。

通辽市发现 1 枚“贞祐通宝”出土品。

(二)银锭

金朝在货币使用方面除用大量的铜钱和纸钞外,还使用白银,其所用银既有宋朝的银铤,也有本朝铸造的大型银铤(又称银铤)和小型银铤(又称银币),二者均为称量货币,使用时称量计重,公私均作现钱使用。由于政府在铸销方面缺乏严明的规定,特别是到金代后期,由于交钞恶性膨胀,严重贬值,民间便都以银交易,白银在货币流通中已成为最主要的货币,以致私铸严重,不乏掺杂铅锡者。

1.大型银铤(图 7)



图 7

在内蒙古地区出土发现的金代大型银铤主要有:1964 年秋,在巴林左旗征集到 5 件,为隆昌镇附近出土品。其形制和外表特征与金代常见银铤相同,长分别为 1400、1450、1500 毫米,腰宽分别为 580、600 毫米。通过与陕西、北京等地出土的金代银铤进行比较,得知其中 4 件大型银铤并非官

府铸造的进奉银。其中 1 件为官府经“行人”铸造的官银,3 件是“行人”铸造的称量货币,且大部分是税银。其中加盖“使司”戳记的银铤也是收缴税银中的一部分,经检验后又流通于世。

1980 年 10 月,兴安盟科右中旗白音胡硕镇南 4 公里前德门山南出土 3 件银铤,其形制作工与前述相同。长 138 至 152 毫米、重 1962 至 1986 克。无明确纪年,经分析应为金代所铸。

1986 年 5 月,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同窑乡陶卜窑村出土 3 件银铤。其一,铤面上部右侧篆刻“肆拾玖两伍拾钱半”,在束腰部左右两旁靠边缘处加盖阴文“金花 X”戳记,“X”为花押,倒盖,字朝上端。铤长 142 毫米、重 1963 克。其二,上部右侧篆刻“回易伍拾两”,中部左侧篆刻“行人曹产”,在“拾”字左边加盖阴文戳记。铤长 144 毫米、重 2010 克。其三,中部偏左处篆刻“伍拾两”,铤长 140 毫米、重 1983 克。这 3 枚银铤均为平背,面微凹,成色 98%。由于其形制与金、元银铤基本相同,因此对其断代产生分歧,即一说系金代银铤,一说系元代银铤。

此外,在喀喇沁旗头道营子出土的王公金银铤和赤峰市发现的郭用章银铤,其形制也与金代银铤相同,也当为金代所铸。

2.小型银铤(图 8)

1985 年 8 月,在金上京会宁府故址北部出土 1 枚,其形制是束腰马鞍形,正面篆文“承安宝货壹两半”等,背面满布蜂窝,长 48、首宽 30、束腰处 21、厚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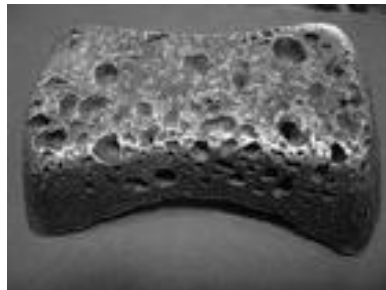


图 8

毫米,重 58.8 克,纯银。1987 年 6 月在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发现 1 枚。此为出土物,约在 1984 年由当地农民在田间拣到。其形制、品相、篆文与前述小银铤相同,与 1964 年巴林左旗出土的 5 件金代大型银铤的形制也相似。长 48、首宽 30、束腰处 20、厚 5 毫米,重 60 克。

(三)交钞

(图 9)

1.贞祐二年钞版

30 年代初,在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故址出土 1 块金代钞版,为



图 9

北京路“壹百贯”交钞铜版。此钞版已流失国外。钞版长 192、宽 105 毫米,上端横书“壹百贯”3 字,其下花框内正中直书“壹百贯八十足陌”,两旁为“字料”与“字号”,两边印篆文“伪造交钞处斩”,“赏钱贰百贯文”。下部文字为“北京路×察×司奉符承圣旨印造通行交钞内中都南京交钞库北京上京咸平府苟库倒换钱钞……伪造交钞处斩赏钱叁百贯文。贞祐二年 月 日……尚书户部委差官”。花栏外直书“每纸工墨钱八文足”。

2. 贞祐三年钞版

内蒙古博物馆馆藏 1 块金贞祐三年(1215 年)“壹拾贯”交钞铜版,系 50 年代初在呼和浩特旧城征集所得。该钞版长 202、宽 106、厚 10 毫米,重 2345 克,背素。正面四周以莲花、莲叶为栏,版头有“壹拾贯”3 字,左栏外有“每纸工墨钱捌文,纳旧换新减半”字 1 行。栏内为钞文,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中间为钞额:“壹拾贯八十足陌”,右边为“字料”2 字。此上方有一方形凹坑,右边为“字号”2 字。料号外分别用篆书注明:“伪造交钞处斩”,“赏钱三百贯文”。下部有 7 行文字,从左至右如下:“通行交钞内陕西东路许于中金贞三年壹拾贯交钞铜版都,南京交钞库,京兆府、河中府、潞州省库倒换钱钞攒司专副 副使库使伪造交钞斩赏钱三百贯贞祐三年 月 日,库使(押符)尚书户部勾当官(押符)”。

3. 朔州交钞之印(图 10)



图 10

80 年代初,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新丰乡八号村的金、元时期村落遗址中出土 1 方“朔州交钞之印”。该印铜质,通高 48、厚 17、扁长方形钮高 28、印面正

方形边长 69 毫米。印文九叠文汉字“朔州交钞之印”,这是金朝为发行交钞所铸制。

4. 北军合同官钞印(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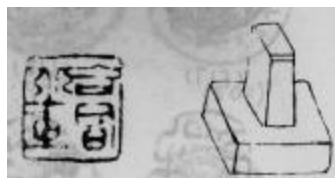


图 11

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 1 位教师收藏 1 方金代“北军合同”官钞印。该印青铜质,方形,长方形板状钮。通高 22 毫米,印面边长 22、厚 7

毫米。印文为阳文小篆“北军合同”4 字。该印早年在林西县五十家子村发现。从出土地点及“北军”一词分析,它是用于金代交钞上的合同印,即属官钞合同印。加盖此印以使交钞在特定的范围内流通。

三、金代纸币通货膨胀的原因及特征

由于铸币不足,金代开始发行纸币(交钞)。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 年)在中都设交钞库和印造钞引库,仿

北宋交子发行纸币,交钞与铜钱并行。交钞有大钞和小钞两种,大钞分 1、2、3、5、10 贯五等;小钞分 100、200、300、500、700 文五等。与铜钱的比值是 1:1。

交钞每期初以 7 年为限,到期纳旧换新。当时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交钞发行便于商品流通,深受商民欢迎。最初交钞只在黄河以南使用,用来换取宋代铜钱,后扩大流通范围,在河北、京师一带和东北一些地区流通,逐渐成为主要货币。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废除交钞 7 年一界的限期兑换制度,成为永久使用的货币。由于推行不分界的纸币使用办法,造成交钞滥发,数量大增,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纸币推行并未代替铜钱,由此引发官民普遍窖藏铜钱,出现钱少价贵,严重钱荒。

为了解决出现的钱荒,金世宗曾下令要求诸处州府将贮藏的钱币投入市场,购买“金银丝帛”,促使流通;还沿用宋代短陌之法缓解铸币缺乏。此外,还采取印行交钞、铸造铜钱、大力吸收南宋铜钱来解决钱荒。

宋元明清历代政府都是先铸造铜钱后发行纸币,金代却先印行纸币而后铸造铜钱。这是因为,金统治区铜矿贫乏,只有靠印行纸币来解决此问题。贞元二年(1154 年)经户部尚书蔡松年的倡议,金政府便第一次印制了交钞,以铜钱为本位,与辽宋钱并行。印造、发行和管理交钞的机构,在中央是交钞库、印造钞引库和物料场;地方机构则称随处交钞库、抄纸坊。贞元初,仅在中都、南京两地设钞库或交钞所。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到宣宗贞祐二年(1214 年),全国 19 个路除东京路外都设随处交钞库、抄纸坊。在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中都路、北京路、西京路和河北东路所属的瑞、蔚、通、顺、蓟、平和清州,还设立分支机构,亦称随处交钞库、抄纸坊^①。

交钞的形制最初比较粗陋,但随着流通的推移之后渐趋于精美。一般交钞均载明钞额、字料、字号,伪造罪和赏格,印造、发行、批准权限和机关,钱钞兑换地点,流通地区,各级主管部门的官吏押字以及印造工墨钱和纳旧换新的手续等。

交钞最初发行时,仅限于黄河以南地区使用,“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②。这虽然有抵制南宋、防止铜钱南流的一面,但主要还是因为河南是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交钞的需求最为迫切。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纸币“便于持行”、“利于致远”的优越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加上金世宗时期对纸币的发行始终比较谨慎,比较注意控制发行量,因此,币值稳定,信用甚高,商旅“乐于以钱买(即换)钞”,而且流通的地区也越来越广,终于跨过黄河,连远处东北的上京、咸平等府也都使用交钞。

交钞是一种区域性流通的纸币,最初仅限于一个

路流通,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合同交钞,即由中央与地方联合发行,两方联合称合同交钞,三方联合称三合同交钞,持钞者可到参加合同的各路流通或互换钱钞。由于各路都与中央可立合同,所以各种合同交钞都可以到京师流通或兑换,这就形成了一种纵的联系;各路之间也可通过合同互相沟通,发生横的联系。于是,就组成了一个以京师为中心向各路辐射的流通系统,也表明它正在向全国流通发展。

金章宗即位以后虽然将交钞原定的七年为界的限制废止,改为永久流通,比南宋交子无限期的流通提前了六十年,成为中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但交钞一开始就具有不兑换的性质。流通始而不畅,继而又不断贬值,使金代在章宗期间走入通货膨胀的困境。

为了缓解铸币的减少,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规定限钱法,根据官职高低、资产多少,限定个人贮藏铜钱数额,违者处以重刑。后来又规定严禁铜钱出境,3斤以上者,处以死刑。泰和六年(1206年)宋金交战,交钞发行不畅,有的地方不能行使,朝廷乃用现钱10万贯收兑部分大钞,同时开始发行小钞,扩大纸币流通使用范围。由于纸币一再贬值造成民怨沸腾。以后又印制大钞,规定一贯以上用交钞,而不用铜钱。章宗承安、泰和以后,蒙古军南下,威胁金政权,引起军费开支浩大,财政负担沉重,铜钱来源减少,遂更大量发行纸币。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发行贞祐交钞,面额较大,有20、50、100、200、1000贯五等,发行量也较大。贞祐三年,交钞每贯仅值1钱;7月改交钞为“贞祐宝券”。为了保证其流通,颁《禁见(现)钱令》,禁止使用铜钱。由于纸币发行数量增多,物价不断上涨,至贞祐三年换发新钞时已贬值为原来的千分之一,民间拒绝使用,仍继续使用银两。宣宗贞祐二年五月蒙古军入侵中都,宣宗迁都汴梁,军费开支庞大,财政负担很重,只有靠大量发行纸币解决,曾发行百贯、千贯大钞,后出现了宝券、通宝、宝泉、珍货、宝会等名目的各种交钞。当时,交钞价值惨跌,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万贯唯易一饼”^③,纸币流通完全崩溃。

造成金代货币制度的衰败,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官俸及庞大的军费开支,使中央府库铜钱短缺。章宗时官僚组织空前扩大,机构雍肿。至泰和七年(1207年),在职官达四万七千余人,四季部拟授者一千七百人,监官到部的九千二百九十余人,冗官总数比世宗时增加三倍。官俸的巨额支出,无疑也是金朝财政匮乏的重要原因之一。军人的廪给除粮、绢、衣之外,主要是发给铜钱。海陵王上台之后,加紧备战,企图一举吞并南宋。但是国库存钱不多,便向百姓预征五年的税钱来支付这笔开支。及至1161年(正隆六年)大举南侵时又无钱筹办军衣,只好从国库中拿出一万匹绢在汴

京市场上以物物交换的形式换得“衣、袄、穿膝一万件以给军”^④。金世宗继位以后,战争仍在进行,铜钱的消耗量更大,仅军饷一项开支,每年就需“一千万贯,官府止有二百万贯”^⑤,连百官的供奉尚且不能全给,更无法弥补这八百万贯的差额。与此同时,朝廷在镇压契丹族耶律窝斡起义时,也因国库“帑藏空竭”,几乎没有铜钱,只好下令“出内库金银十万两佐军用”^⑥。金朝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军费支出与日俱增,终致财政枯竭,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当时金国出现了民间极感钱荒,而地方府库大量藏钱不投入流通的怪现象,这种现象是加重钱荒的一个原因。

为了摆脱钱荒严重困境,金朝采取了消极铸钱、积极限钱、发行银币、疏通交钞等措施。总之,在明昌、承安年间,金统治者虽然竭力调整货币政策,企图消除财政危机,但由于这些措施只是治表不能治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造成危机的原因,其结果必然是每采取一项修补漏洞的措施,漏洞反而越大,危机反而越深,终于进入了恶性发展期。

二是海陵迁都以后,大量的铜钱都用于修筑宫殿和制造军器上面,国家无铜来铸造货币,只有以大量发行纸币(交钞)来维持这种局面;同时,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从1211年开始便不断南下掳掠,至此金朝国土日蹙,经济残破,内外交困。这也是金朝货币经济发展遭到破坏的原因。

三是无限制的不断发行纸币,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金政权所发行的纸币交钞,主要目的还在于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并非完全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官府不备本钱,在子母不足以相权的情况下,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不兑现的纸币,势必又引起钞价下跌,通货膨胀。纸币贬值和阻滞,势必造成政府收入减少,政府就越要加紧搜括民财,从而进一步引起货币的紊乱,币制紊乱是金政府统治日趋衰亡的象征。

四是交钞制度纷乱,导致交钞贬值。金代使用的交钞在其整个货币系统中的地位始终未能明确。最初和铜钱兼用,继而又与白银货币(承安宝货)一起流通。交钞刚刚开始发行时很畅通,而后就慢不能行。如果金政府彻底废除铜质铸币,改以纸币做为白银的辅币,按照辅币的铸造和发行办法管理,分清主币和辅币,金代的钞法就不会如此混乱。然而,金政府把各种银币、铜币、纸币都作为具体的实币投入流通,因为各种货币相互间实际价值比率的变动,自然就导致它们的市面价格的波动。金政府解决这种价格的方法,是靠不断的改换币面上的规定去加以调整,而忽视了纸币是纯粹的价值符号,本身没有一点价值。要想让它发挥效用,必须建立和健全整个货币体系。而金政府只是用发行纸币来补救铸造铜币的不足,这样势必要导致纸币贬值的恶运。

五是金朝末年的一切政令不能及时到达于各路、府、州、县,致使无法控制货币使用情况,也是造成纸币纷乱贬值的重要原因。

六是自然灾害的侵袭,加剧财政危机。金代因天灾连年,使本来不甚发达的经济,在自然灾害的侵袭中更加衰败,不断的自然灾害,不仅使朝廷难以征聚赋税,还要从国库中拨出衣物赈灾救民,这样不仅减少了财政收入,加重了财政负担,而且直接刺激市场物品供需矛盾,使市场物品可供量自然减少,从而推动物价上涨。

金朝政府在最后的 25 年间,通货膨胀呈现以下几个特征:其一,金朝末年纸币发行量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使通货膨胀加剧。卫绍王期间的会河之役,以 84 车交钞为军赏,以后“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尽管崇庆年间亦铸有铜币,但仍然无济于事,货币更加混乱。宣宗贞祐二年(1214 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⑦此时发行二十贯到百贯的大钞,就是等于膨胀了十倍,而发行二百贯到千贯的交钞就说明膨胀了百倍。贞祐三年(1215 年)七月,改交钞为“贞祐宝券”,一年之后宝券一贯仅值几钱。兴定元年(1217 年)二月金朝又发行“贞祐通宝”纸币。“凡一贯当千贯”。至此通货已膨胀了一千倍,货币(纸币)的发行量已大大地超过了市场上的商品流通量的需要量。

其二,交钞(纸币)贬值引发物价和金银的上涨。贞祐三年交钞(纸币)每贯仅值一文钱。而章宗时期每贯钞可值一千文。兴定年间(1217~1221 年)银价也不断上涨,兴定初年,贞祐通宝每四贯钞为白银一两,到了兴定五年钞与白银的比价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此时的“贞祐通宝”八百余贯钞折合白银一两。如果折合成“贞祐宝券”则一两白银可值四千贯,宝券下跌至巨。上述事实说明,“贞祐通宝”的价值跌成二百分之一以下,而白银对“贞祐宝券”来说则上涨了 40 多万倍。到了元光年间,银价日贵,兴定五年金朝又更造“兴定宝泉”,元

光二年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与白银及余钞并行之。然而,此时宝泉及各种余钞日贱,民间但以白银议价。这时金政府在政治上已濒于崩溃,纸币已走到了绝境,无法维持。

其三,纸币的贬值造成了金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为了解决财政日益拮据的困境,金政府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金朝末年由于滥发纸币(交钞),造成了纸币的严重贬值,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为了解决财政收入不足,政府只有强取于民,对当时的劳动人民采取横征暴敛。此外,当时的职官冗滥现象也十分严重。其特点是官多兵少,兵多农少,“士卒家口又数倍于军,彼皆落薄失次,无所营办,惟有张口待哺而已。”宣宗南迁以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纸币更加贬值。

四、启示

首先,纸币的发行量必须遵循货币流通规律。纸币是商品经济一定发展的产物,纸币的发行量如与社会生产、商品流通相适应,就能够促进生产和商品的交换。反之,金代后期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不仅不能解决财政困难,相反只能加速其财政和经济的崩溃,这是金代货币制度留给后代的深刻的教训。

其次,要制订正确的货币政策,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纸币管理措施,使纸币在流通中保持良好的信誉和形象。正确的货币政策需要正确的货币理论为指导,而正确的货币理论必须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必须从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有利于人民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出发,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注 释

- ①《金史》卷 56《百官》二。
- ②范成大,《揽辔录》。
- ③《元史》卷 146《耶律楚材传》。
- ④⑤《金史》卷 44《兵志》。
- ⑥《金史》卷 133《叛臣·耶律窝斡传》。
- ⑦《金史》卷 48《食货志》三。

(上接第 63 页)泉”,正是出此原因。王莽币制改革因多而繁造成混乱而失败,但因铸币形制很特别、制作精良,历代以来始终为收藏者所青睐。其中闻名遐迩的是“一刀平五千”,俗称金错刀。“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可见其为古钱收藏之极致。遗憾的是本次考古并没有发现。这说明象贵重的钱还是只能中央铸造。

第三,霍洛柴登古城内中部有一条东西向街道,宽约 50 米。西侧中部有大型建筑台基,其东北部有铸钱遗址。官署区位于城内中部,在官署区附近还分布有铸钱、铸造兵器的场所以及炼铁、铸铜场所等。在古城的西部,柴登河东岸坡地上发现过烧制陶器的窑址多处。铸币作坊布局合理设在霍洛柴登城东西大街东北处,直接与治所相对,便于掌控保护,又不受其污染。从考古发掘出 7000 多斤的古钱,说明铸钱和钱作坊很隐蔽

而且保密,否则早被古人挖光。过去这一带是汉匈战争拉锯、交错地区。保证铸钱秘密十分重要。但王莽的改制及边镇铸币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简言之,王莽币制改革造成内乱,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引发外患,新朝在内乱外患中灭亡。▲

注 释

- ①见考古报告《汉钟官铸钱遗址》。位于今陕西户县的汉代钟官,曾是重要的国家铸币工场。钟官铸钱遗址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米,内涵丰富,发现从西汉到王莽时期的大量铸钱陶范、铜范及相关遗物,是目前中国发现最大的一处古代铸币遗址。

【参考文献】

- [1]高平,光明日报[N].2014-02-25.
- [2]《后汉书》西域传.
- [3]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M].人民出版社,1983.

中南银行纸币的版式及其发行制度

马长伟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货币发行,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但是,近代中国,国家银行、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官银钱号、在华洋印刷商号,甚至开设石印局,或开设日报馆,只要有印字机器者,均可印造纸币。纸币滥发、私发现象十分严重。其中尤以银行业发行的纸币最多。尽管政府当局构建了一系列的规章和制度,希望统一纸币发行,整治货币流通混乱问题。但是最终结果却不理想。鉴于中央政权式微,财权分散导致币制监管失败,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银行便从自身做起,严格管理本行纸币的印刷、流通、防伪等工作。

1921年,南洋华侨黄奕住回国创办中南银行。同年7月北洋政府批准中南银行享有钞票发行权,到1935年法币政策施行,中南银行的发行权被取消。中南银行在14年发行史中取得辉煌成绩,创中国私人银行发行钞票的最好记录,成为近代商业银行的典范。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中南银行纸币发行中的举措是密不可分的。关于中南银行纸币发行权的获得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此不多言。中南银行纸币是集历史、经济、印刷、艺术于一体的特殊载体。然而,由于年代的久远,再者纸币保存不易,而今我们能够见到的中南银行钞票已经不多。以往研究中南银行纸币的文献往往是基于存世的中南银行纸币(大多已磨损、变色),或相关的货币史、金融史专著中获取图片进行分析。这种情况,往往会失真,不能正确、客观的反映中南银行纸币的特色。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南银行原始档案资料,对中南银行纸币的版式及发行制度进行论述。

一、中南银行纸币的印制公司

北京政府时期,各银行、钱号不但滥发钞票,而且发行技术低劣,易于伪造,市场上假币大量流通,进一步混乱了货币流通秩序。有鉴于此,中南银行十分慎重的对待钞票印制问题,认真权衡,选择钞票印刷厂,以保证中南银行钞票的质量。

在中南银行取得钞票发行权后,就有印刷厂及其他部门主动地与中南银行联系,想要取得中南银行的钞票印刷权。如财政部印刷局就曾致函中南银行,想要

承办此项业务。中南银行在回函中说到:“印制钞票自以国内较为便捷,于国内而言,印刷精良则舍贵局莫属”,然“敝行之董事会诸人皆归自海外,对于发行之事审慎异常,”所以要慎重考虑印刷公司。后来中南银行选择了国外的印刷公司,而财政部印刷局承印了中南银行股票。

1921年7月,美国钞票公司吴乃琛(盖臣)积极与中南银行联系,商议订印钞票之事。并通过荫孙联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施肇基,委托其觅人代写票面“中南银行”字样。当时,美国钞票公司报价是1元票每千张美金23元;5元票每千张26元;10元票每千张30元;50元票每千张70元;100元票每千张87元,此价包括制版费在内。1921年12月7日,中南银行与美国钞票公司订立合同,在国外印制第一批钞票136万9千张,合500万元。此后,中南银行选择的国外印钞公司主要有美国钞票公司、英国华德路公司以及德纳罗印钞公司。

相对国内公司印制钞票,国外印钞公司要求高昂的印刷费、制版费,此外还有运输费、保险费等,这些都增加了中南银行的交易成本。如1921年12月中南银行向美国钞票公司定制的第一批钞票,其花费有:印刷费61523元1角,在沪加印地名费洋3000元,二共64523元1角;运送费、保险费共7550元3角1分。费用合计为72073元4角1分。尽管如此,为了确保中南银行钞票质量上成,流通方便,中南银行还是选择技术精湛的国外印钞公司。也正是中南银行的这一举措,为中南银行钞票赢得了口碑,钞票的流通额不断增长。1922年,中南银行就与印钞公司商定加印钞票。

二、中南银行纸币版式

中南银行纸币因纸质良好,票面色泽明亮,图案印制华美,被民众广泛接受和使用。从1922年中南银行钞票面世,到1935年结束,其发行额是逐渐上升的。1922年,中南银行钞票发行额为205万元,1935年达到7228万元。

笔者根据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存中南银行原始档案、钞票样票,以及存世的相关纸币图片进行统计,中南银行钞票发行14年间,共有6版13种纸

币,且全部为外国印钞公司承印。

第一版为1921年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日晷图案钞票,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日晷是古代利用日影测量时间的器具。1元钞票正面日晷居中,指南针图形左右壹元图形大部分蓝色及彩色。背面英文 one yuan 和1背景图形全蓝色。5元钞票正面左部为指南针图形,右部有伍元图案,大部分紫红色及彩色。英文 five yuan 和5图形三全紫红色。10元钞票左拾元图形,右指南针图形大部分深赤者色及彩色。英文 ten yuan 10图形全深赤者色。50元纸币中部为指南针图形,左右伍拾元图形橙黄色及彩色。英文 fifty yuan、50图形全老黄色。100元纸币左部为指南针图形,中右部壹佰元图形桃红及彩色。英文 one hundred yuan、100图形全桃红色。

第二版为1924年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日晷图案钞票,有5元、10元两种。中南银行纸币面世后,流通顺利,数额剧增。中南银行依照1921年纸币的板式、颜色等加印了5元和10元两种纸币。

第三版为1927年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日晷图案钞票,仅有5元面值。但是,此次印制的5元面值纸币却出现两种不同的色彩。原本依照1921年的版本印制,颜色仍以紫红色及彩色为主。但是,很快发现市场上有类似伪钞,故将色彩改为全青色。

第四版是1927年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五族妇女图案钞票,五族指的是汉、满、蒙、回、藏五族,“人像五份按号排置”,有1元、10元两种。1元纸币为直长式,正面中文,反面英文,行名在上方当中。正面图形上部为三个圆形人头像,中间为银币反面圆形,正面一大部分黄色及彩色。反面图形,上部为二个圆形人头像,中部为民三银币袁像正面圆形图案,一大部分淡绿浅红色及彩色。10元图形,正面中部为拾元图形,左右为人头像图形,四方花叶图形,水黄浅彩色。纸币背面中部、左右为三个人头像图形,英文 ten、10图形三,四方花叶图形,水黄淡绿浅彩色。五女图纸币是中南银行最受市场欢迎的钞票。

第五版,1931年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日晷图案钞票,仅有1元面值。与1921年日晷图案钞票不同的是,此版钞票中部为壹元图形,左边为指南针图形,右部为中南水印,钞票大部分蓝色及彩色。背面英文 five yuan、5圆图形全紫红色。

第六版,1932年德纳罗印钞公司印制日晷图案钞票,仅有5元面值。相对以往版式,此版5元券改为,中部为伍元图形,左部为指南针图形,右部为中南水印,大部分水淡黄绿色及彩色。

中南银行钞票印刷时均有钞票冠号。冠号是用来区分钞票币值、印刷批次和印刷公司的,一般由字母和

数字组成。中南银行钞票冠号的第一个字母可以用来区分印制公司。如,英国华德路公司的冠号字母是Z,而德纳罗公司的字母为F,字母后面的数字是印刷批号。美国钞票公司没有专门代表公司的字母,它印制的中南银行钞票面值分别由不同的字母表示,如:A表示1元、B表示5元、C表示10元、D表示50元、E表示100元,而对应的第二个字母表示发行的区域或者印刷批号。

三、中南银行纸币发行制度

中南银行取得发钞权时,正值中法实业银行停业清理,市场恐慌之时。金融界对政府不能严格控制发行权很有微词,同时对中南等银行发钞前景并不看好。北京银行公会曾致函币制局:“政府又特许华威、中南等银行发行钞票之权,是不啻已病之夫,更加饮以鸩毒。本公会各银行闻信之下,群起惊疑,更有不能已于言之势。查华威、中南等银行,当此国内经济未允之际,继起经营,本公会各银行欢迎同业之心自属全体一致。惟顾念国家财政、币制前途,以及同业之安危起见,仍不能不请政府审前顾后,有所防维”。历史告诉我们,北京政府的监管是微弱的,它的一系列制度、条款没能从根本上改善金融环境和纸币滥发的状况。然而,中南银行对钞票发行十分重视,设计了一系列稳定中南银行钞票币值,维护持券人权益,利于钞票流通的制度。从微观的银行主体来看,这一系列制度安排都是创新,都是中南银行钞票发行额稳步上升的保证。

(一)十足准备金制度

胡笔江在担任中南银行总经理之前,曾长期服务于交通银行,并经历了1916、1921年的京钞挤兑风潮,深知银行遭遇挤兑,头寸不足时带来的严重后果。1923年3月25日,胡笔江在中南银行股东常会上谈到:“有发行权之银行遇政局变故不免受挤兑影响,本行欲求免此影响,惟有十成现金准备,另设专库,公开办理,即发行100万元钞票,有100万元现金之准备,发行1000万元,有1000万元之准备”。中南银行为了树信于人,避免挤兑风潮的影响,遂决定实行十足准备的发行制度。《四行准备库发行章程》也明确声明:“本行发行纸币,规定十足准备”。

1920年,北京政府规定纸币发行至少要有6成现金准备,4成保证准备。所谓的保证准备,就是除现金外银行接受的庄票、货单、公债等票据。中南银行钞票在发行伊始就从规避挤兑风险的角度出发,十足现金准备发行。到1923年年底止,中南银行发行钞票1407.15万元,实付银元准备金1068.95万元,其中津库442.4万元;沪库505.万元;汉库121.5万元;银两准备金338.2万元,合计1407.15万元。中南银行这种十足现金准备的办法,“初时对于四行本身似无直接好

处,只是做好牌子”,即初时的十足准备发行,并不是为了银行利润,而是为了推出中南银行钞票,扩大中南银行钞票的影响。

此后,由于发钞银行竞争激烈,也有用三、五、七天期庄票来领取钞券的。加上十足准备占用四行大量现金,四行准备库将十足现金准备改为现金准备和保证准备两部分。1926年起,四行准备库实行领券制度,准备金遂改成六成现金,四成保证。但由于领券额的不同,该比率可以适当调整。1927年改为五成现金,五成保证。1931年3月,在中南银行的推动下,北四行重新修订了钞票发行规约,规定“现金准备至少六成,保证准备至多四成,无论任何方面不得稍许通融。”虽然发行准备的比率有所变化,但是十足保证准备的约束一直没变。

表1 四行准备库历年兑换券及准备比较表
(1923~1931年)

单位:元

年份	现金准备	百分比	保证准备	百分比	发行兑换券	百分比
1923	14071540	100	—	—	14071540	100.00
1924	12674820	99.46	69030	0.54	12743850	100.00
1925	13841208	95.36	672849	4.64	14514057	100.00
1926	14823331	96.13	597431	3.87	15420762	100.00
1927	16733365	96.56	597014	3.44	17330379	100.00
1928	19093500	64.41	10552405	35.59	29645905	100.00
1929	21858884	66.00	11261452	34.00	33120336	100.00
1930	32127230	65.32	17057426	34.68	49184656	100.00
1931	22625581	63.18	13188171	36.82	35813752	100.00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四),1993年,第499页。

随着发超额的增加,四行准备库要求的保证准备品种类也相应作出改变,先是三天、五天或者七天的庄票,以后又增加了放款押品中的地契、证券等。1929年4月,中南等四行制定《四行领券保证准备变通办法》三条。其中规定的保证品有房地产、押款单据(以货物押款生意为限)和四行所有的本行外各种短期商业票据。短期商业票据种类:(1)当地银钱行号短期本票;(2)栈单(以原押款数目为准)连同保险单;(3)提单(以原押数目为准)连同保险单;(4)贴现票据或至多6个月期放款大票。此外,还可以使用四行和准备库共同认可的商业票据。保证品种类的多样化,既满足了十足准备的约束,又迎合了市场上对中南银行钞票的需求,彰显了四行准备库在发行钞票过程中的灵活性。

北四行通过这些灵活性的制度约束,严格遵循十足准备的诺言,并且每周在《银行周报》等刊物上公布准备库检查公告,以昭示四行准备库基础雄厚,信誉卓著。

(二)四行联合发行制度

中南银行成立不久,根基不稳,信用也不巩固,单靠自家发行钞票数量有限,而且稍有挤兑,中南银行难以应付。胡笔江还考虑到“如此十成现金准备,其开支

甚重,且本行十成准备,势亦须有其他行为之证明。故决与声誉素著之盐业、金城、大陆三银行联合组织准备库办法,不独可以减轻开支,亦借证明十成准备之制。”对此,盐业银行的吴鼎昌,金城银行的周作民“惟从远大着想”认为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既能抵制外商银行滥发钞票的特权,又能重振中国钞票的信誉,所以同意三行联合,后大陆银行加入,遂成四行联营。

中南银行第二届营业报告叙述了其于盐业、金城、大陆银行设立四行准备库的经过。

“本行承政府特准发行兑换券,在政府实为奖励侨商回国经营实业之盛心。在本行允宜郑重发行,励行十足准备制度,用答社会期许之殷,而符政府嘉与之意。爰先与声誉素著之盐业、金城、大陆三银行,设立四行联合准备库,脱离营业范围,特设机关,公开办理。”

当时立规约六条、《四行准备库发行章程》、《四行准备库办事章程》及《四行准备库稽核处章程》各若干条。依据章程推定周作民、胡笔江、谈荔孙、吴鼎昌为总稽核,组织总稽核处,并由总稽核推定吴鼎昌为总稽核长。总库主任未聘定以前,由吴鼎昌暂行兼任,筹备一切。

上述规约、章程的要点有:(1)关于钞票本库商明以中南银行之名义行之,所有责任仍由四行共同负之。(2)发行钞票十足准备,所有本库资产不得移作他用。(3)准备库之账目完全独立,四行应遵守准备章程换用钞票,万一四行中无论何人有意意外之事,其损失与准备库无关。(4)四行准备库在沪津汉及其他已经四行之处所分设之。其机关设置于四银行之外,其业务专办发行钞票,存储准备金,以及印票兑现一切事务。不兼做其他营业。(5)各处准备库账目及库存现金钞票,得随时严格稽核,且欢迎银行公会、商会来库调查。

四行准备库按照分区模式进行经营,先后成立津、沪、汉三库。1922年11月1日,津库在法租界21号路63号成立。1923年3月27日,沪库在英租界汉口路3号成立。1923年5月16日,汉口准备库在俄租界玛琳街45号成立。1923年拟成立厦门准备库,发行厦门地名钞票。但“因军事未定,暂缓实行,为先行试办起见,拟暂由沪库委托厦门中南银行办理。”厦门库改为分库归沪库管辖,由沪库暂派管理员一人前往管理钞票现金收发、登记、汇报事务,管理员已暂住中南银行办事。

四行准备库是我国实行发行独立,准备公开之始。即使后来,国家加强了对银行货币发行的监管,但“除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及中南四行准备库等少数外,皆无公开之检查与报告,究竟发行若干,现金准备若干,保证准备若干,而保证准备是否可以立易现金,作价有无浮冒,均无从考证。”而中央、中国两家都是国家银行,只有中南银行是商业银行,可见中南银行对钞票发行的慎重。1922年到1932年,四行准备库发行的钞票总

额仅次于中国、交通两行,一直在全国各重要银行中名列第三。1923年、1928年和1935年四行准备库都快速平息了中南银行钞票的挤兑潮,在社会上赢得了赞扬和声誉,增强了民众对中南银行钞票的信心。

表2 历年发行券类和流通额表

年份	一元	%	五元	%	十元	%	五十元	%	一百元	%	合计
1922	197823	9.6	773875	37.7	839500	40.9	130200	6.3	111000	5.4	2052398
1923	1160655	8.2	5440495	38.7	6905640	49.1	278750	2.0	286000	2.0	14071540
1924	1084650	8.5	4955030	38.9	6046770	47.4	307300	2.4	350100	2.7	12743850
1925	1489822	10.3	8800755	60.6	3802730	26.2	164550	1.1	257100	1.8	14514957
1926	1171902	7.6	8022180	52.0	5844880	37.9	210900	1.4	170900	1.1	15420762
1927	1145809	6.6	7931890	45.8	7949780	45.9	158700	0.9	144200	0.8	17330379
1928	2147985	7.2	12396860	41.8	14707760	49.6	189000	0.6	204300	0.7	29645905
1929	2581136	7.8	17323390	52.3	12915170	39.0	156500	0.5	143600	0.4	33119796
1930	3296691	6.7	27941115	56.8	17348230	35.3	320200	0.7	278400	0.6	49184636
1931	3026578	6.9	24249280	55.1	16284150	37.0	233300	0.5	180700	0.4	43974008
1932	3204188	7.2	25792850	57.7	15315030	34.3	223500	0.5	169100	0.4	44704668
1933	3686168	8.4	27100350	61.8	12639830	28.8	208450	0.5	208100	0.5	43842898
1934	4035733	9.0	27336240	61.2	12920090	28.9	198450	0.4	161100	0.4	44651613
1935	4033745	5.6	43267185	59.9	24484920	33.9	289450	0.4	207100	0.3	72282400

(三) 领券制度与暗记制度

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钞票的主要途径是放款、投资与领券。但是,四行准备库的职责是:“专办钞票之发行,准备金之存储,以及印票兑现一切事务,不兼做其他营业”。偶有放款也是委托四行代办,如1923年准备库与四行签订合同,委托它们代放100万元。而四行想要发行钞票,就要缴纳现金保证,领用钞票。

领券是中国近代银行业特有的发行制度。“近代银行同业领券办法甚多,或先领券迟期还现;或以现易钞,而于存放利率略予优待;或于钞券上加印暗记,由同业领回发行,其准备溢额之利益,均归领券行。”本文探讨的是最后一种,指不具有纸币发行权,或准备放弃这一权利的银行向具有纸币发行权的银行交纳一定的准备金以后,遵照相应的约定,领用该行纸币,并在领用的纸币上加盖暗记的一种制度。此项暗记券收回后,当由发券行向领券行十足兑现。这是民国时期领券制度中最常用的办法。

1915年领券制度产生,当时仅限于少数银行,如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孚银行等领用中国银行的钞票。此后,该制度不断完善,发展。对发钞行而言,领券行庄多了,流通额和流通领域自然增大,银行的声势也就逐渐提高了,这是一种无形的广告,可以增加人民对发钞行的信任。对领券行庄而言,不但可以从钞票流通中获益,还有“保证金”的利息收入,又无需支付钞券回收费、检查费、运输费等。所以,越来越多的行庄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发钞行领用钞票。甚至“许多规模比较小的行号,即以领券的利益,为大宗的收入”。由于领券制度对发行行和领用行庄都有利益,所以该制度一经产生,便在金融界广泛传播。1926年以后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钞票也基本按照这个制度。

当时四行准备库为推行中南银行钞票起见,曾与四行议定办法,要点如下:

钞票分为有记与无记两种;有记钞票四行平均领用,均各以四行英文首字母加印于钞票之上以资识别,由四行以现金五成保证品五成随时领用;准备库发行之无记券数目减在500万元以下时,四行应照其减少数目平均补足十成现金换回保证品以符十足准备之意。但四行中如有一行其有记券领发额不及上述无记券减少平均时,其应补足现金,由其他三行摊补在此期内。该一行领券发行须完全以现金交换,俟及格时为止;保证准备以整理案内之公债及十四年公债并中国在国外发行之金公债为限;前项钞票四行及库均负互兑之责,按字检出向发行之行兑回现金;四行新领之有记券,如欲退回,准备库得照数换回现金及有价证券。

1927年,四行与准备库依该协商办法为蓝本,制定《上海四行推行沪库本钞简章》,并增加了“四行推行有记券不得采用损及本钞信用办法,沪库或四行中无论何行如有认为四行中所采用办法有不合宜之点,均得提出理由,由沪库召集四行经副理会商讨论更正以保持公共之信用;中南银行因有票面名义特殊关系,如对于上项实行后设有于该行发生利害情事,认为有应行改善时,得提出意见,由沪库召集四行经副理慎重讨论变更之。”

此后,为了全面推广中南银行钞票,准备库颁布《委托四行发行有记券行库手续办法》,其中就四行领券手续、四行还券手续、四行兑券手续给予详细说明。某行向沪库领用有记券若干,“应用领券条取券,并交纳现金五成,保证品五成,但已寄存保证品余额足数时可随时拨抵保证品中,如为存摺存单或短期栈单,应过沪库户名同时沪库填具寄存保证品摺交某行收执。另由某行开立寄存准备金往来户,填给准备金五成收收回单交沪库收执,互为凭证。”某行向沪库还券若干(限于该行领发有记券)“应取回现金五成,支付寄存准备金支票五成,保证品五成,并在寄存保证品摺内付出之(不愿收回保证品者可留作为拨抵续取时之用)。”“无记券向库收现;有记券应直接互相换兑之,勿用交库。”

《委托四行发行有记券行库手续办法》在第一款和第五款中还就上海和汉口的领券做出明确规定:“沪四行与沪库照议定推行钞票简章洽办一切”、“汉口四行按照“推行沪钞简章”领用有记券,由各该沪行间接办理,其手续适用本办法。但各项字据账册均应分别清楚,勿使牵混。这些规定,既分清了行库各自的责任,又减少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加快了资金的周转速度。

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颁布“集中现金”的命令,中南银行汉口地名券信用低落。此次集中现金,北四

行在汉口的各分行都亏损巨大。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中南银行总行指示,允许汉行“在沪领用沪钞运汉发行,以资挹注。”1927年12月,四行准备库又颁布了《四行准备库沪钞在汉通汇办法大纲》,其中对于沪钞在汉口的流通、收兑、汇价等给予详细规定。沪钞在汉流通以后,维护了四行准备库在汉口的地位,巩固了中南银行钞票的信誉,也使得四行的汉口分行逐渐扭亏为盈。

暗记制度其实是伴随着领券制度产生的。领券制度将钞票分为“有记”与“无记”两种。有记又称“暗记”,指的是银行、钱庄向发钞行领用钞票时,在票面上印有各银行、钱庄的标记。一般情况下,银行的标记为英文首字母,而钱庄的标记多为该庄的标志性汉字。如,盐业银行领用钞票时加印“Y”,金城银行加印的是“K”,大陆银行加印的是“C”,中南银行加印的是“S”。有了这些字母标示,四行准备库收回的“回笼券”可以分别归入四行名下,向四行分别回收现金。而四行想要从准备库收回准备金时,准备库也凭此印记辨别领券行。

1931年,北四行重新修订《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规约》,其中第9条规定:“四行准备库发行之钞票票面为中南银行字样,应对于中南银行取消现行暗记,其发行为无暗记券,其他三行之暗记仍照旧加用,以资区别。”所以,由四行准备库委托四行放出的和1931年之后中南银行领用的钞票是没有暗记的。

领券行庄缴纳的准备金大多与发钞行应对的成数差不多,难以借此周转。而证券的溢额与利息通归领券行所有,发行行对于暗记券不能分享利润。一旦暗记券流通过广,反而占据自发券原有地位,甚至会带来挤兑风潮。所以,发券行对于领券行庄有着严格的审核。如四行准备库的业务档案中记载“国内其他有发行权之各行,对于其他无发行权之各行,领券手续、制度极严,领用额数,严之又严。上海一埠,如上海商业、浙江兴业等于中国、交通备极感受领券限制之苦,所以限制极严之故,实鉴于领用行仅有领用利益,而无兑现之烦及输送票现风险也。”但是,四行联营之后,金城、盐业、大陆银行也成为了“发钞行”,联合制定领券规约,免去了许多繁琐苛刻的束缚,为其领用钞票,业务发展都带来了实惠。1935年,四行向准备库领用的钞票数量占有所有发行额的57%。其中以金城银行最多,其次是中南银行,而盐业银行和大陆银行相对较少。其中,又以上海地名券的领用、发行最多,达64.64%。

表3 北四行各行各业领用中南银行纸币百分比

	盐业	金城	中南	大陆	合计
天津	9.76	3.66	4.88	6.10	23.18
上海	8.54	29.27	17.07	9.76	64.64
汉口	2.44	3.66	1.22	3.66	10.98
合计	20.73	36.59	23.17	19.51	100

资料来源:吴旦敏:《近代银行纸币上的冠号》,《上海博物馆集刊》,2012年第12期。

四、结语

中南银行针对中南银行钞票发行,设计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从慎重地选择印钞公司,到组建联合发行主体;从稽核制度到保证制度;从总库到分库;从汉钞发行到申钞领用。无论是宏观上的经营理念,还是微观上的领券细节,中南银行都联合盐业、金城、大陆银行以及四行准备库制定了详细的制度规约,以确保中南银行钞票的顺利发行。正是基于此,中南银行纸币无论是发行数量、社会信誉还是流通范围,在当时都占据重要位置。

1922年四行准备库成立之初发钞额为250万元,占当年全国重要发行银行总额的2.12%。1923年发钞额上升到1407万元,占10.01%,而是年交通银行发钞3852万元,占27.42%。此后,四行准备库的发钞额逐年上升。1935年发行中南银行纸币4465万元,占12.28%。

在30年代,中南银行钞票流通领域覆盖了江苏、浙江、安徽、河北、湖北、湖南、山东、江西等省份。而且,中南银行纸币是商业银行中流通范围最为广泛的。如1932年,江苏省内流通的纸币除中央、中国、交通国家银行纸币外,中南、四明、浙江兴业、中国通商、垦业、中国实业等银行的纸币也一体通用。到法币改革前,尚有48县流通中南银行纸币,是流通范围最大的商业银行纸币。在河北省,除了中央、中国、交通银行的流通区域最大,中南银行纸币在河北85个县内流通,是流通范围最大的商业银行纸币。

中南银行纸币是20世纪20-30年代的流通物,现已成为历史。但是中南银行针对纸币发行的谨慎态度,进行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对于今天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如领券制度对当代人民币国际化、“本币互换协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十足准备金制度可以看做是银本位制下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暗记制度本身就具有防伪功能。同时,中南银行纸币在历次金融风潮和挤兑风潮中都能从容应对,保持商业银行的领先地位,也值得当今商业银行学习、借鉴。总之,加强对该时期纸币发行制度的研究、利用,同时传承中国优秀的经济、文化制度弥足重要。▲

“苏三币”对当时金融经济产生的影响

周俏梅

(广西钱币学会)

在人民币发行的历程中,人们始终难以忘怀的是第二套人民币中的“苏三币”。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请苏联代为印制了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大面额货币:10元、5元和3元(图1),本文统称为“苏三币”。它不仅以精美的票面吸引了人们的眼光,也以精良的技术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今看着那些纸币,让人们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奇景,浮想联翩。建国后发行的“苏三币”,在设计、制作和发行过程中,都有着它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会因时过境迁而淡漠,也不会失去它应有的光彩。



图1 三元 五元 拾元

一、背景与动因

建国初期,新政府紧急停止旧政权流通的货币,消除了旧社会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人民生活逐步趋于稳定,商品种类逐步丰富,经济生产平稳发展,经济状况也在逐渐好转,人民生活较之旧社会有了很大改善,人民群众正意气风发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经

济建设中去。

但是,国外敌对势力仇视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他们图谋采用反攻、颠覆和破坏等手段,尤其是大量伪造人民币,扰乱和破坏我国的金融稳定和市场秩序。当时,第一套人民币面值大、品种杂、版别多、质量差、易伪造,这些弊端造成核算难度大,阻碍城乡市场交易,也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第一套人民币本身的防伪能力差,给敌对势力乘机大量伪造和印发造成便利。

1953年前后基本经济情况:一是国内经济建设和工农业全面发展,货币的需求量增大;二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尽管城乡平均工资水平为20元左右,但物品价格低,商品便宜,仅就北京为例,大学生工作后工资30元左右,大米1斤为1角2分,猪肉1斤6角。当时商品经济日益活跃,且物价稳定,在维护收支平衡基础上,连续几年收大于支,黄金储备也连年增加;三是第一套人民币面额过大,最大为5万元,单位价值低,在流通和计算时,以万为单位,不利流通和交易,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且种类繁多,达12种面额62种版别,文字说明简单,票面破损严重。这些现实,都迫切要求尽快建立一个适合当时国情和新中国货币的金融体系。

二、预期与挑战

筹备发行新人民币即第二套人民币,党中央非常重视,先由金融领导、经济专家进行调研,于1950年7月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印铸新币方案》的报告。当时考虑两个方案,一是利用国内现有设备、技术和材料自行印制。国内印制时间快、发行快,但弊端是国内技术和设备很落后,印制钞票的质量不高,难防伪造;二是委托苏联代印。苏联的印钞技术和防伪技术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当时的卢布就是世界上防伪技术最好的一种货币;三是从我国战略思考,请苏联代印,还可以获得苏联的技术和设备,又可以培养自己的印钞人才。当然,请苏联代印,也会有弊端和挑战,一是印制时间长。从印制到发行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第一套人民币运行的风险加大,防伪工作的难度也加大,经济波动也会增大;二是请苏联代印,从苏联获得技术和经验,核心技术可能被他人掌握,实际上苏联也明白我国的意图,如果有了这个预见,也必定采取防范举措,就会对我国获

取先进的印钞技术造成困难。最后,经过综合考虑,并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中央慎重决定,请苏联代为印制部分第二套人民币。

建国初期,外交政策实行“一边倒”,中苏关系亲密如兄弟。经中苏最高层商谈,请苏联代为印制第二套人民币,很快达成一致意见。经过双方财政、金融、印钞局和有关方面高级人员会谈,虽然有分歧但谈判还算顺利。我方恳切要求提高质量、加大防伪技术、与卢布一样达到国际最好水平。后来苏方先印制了第二套人民币 100 元、50 元、10 元、5 元全套印样,我方审查后,认为苏方用了最好的设备、技术和纸张,但我方仍提出,在用纸、票面底纹、变点花纹、水印暗花等方面,还要更精致复杂一些,还要再进一步提高防伪能力。苏方采纳了我方意见,改进后印制钞票的防伪技术已超过当时流通的卢布。

三、变动与特点

(一)“苏三币”的产生

在印制过程中,台湾国民党获知我国正准备发行新货币的消息,立即请美国帮助伪造大面额钞票,来干扰新中国经济。党中央获知这一情报后,提出中止 100 元、50 元、10 元票券的印制,增加 3 元和 5 元票券。

周总理亲自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要求票面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由原来的 40 亿元增加到 45 亿元。由于临时改变方案,苏方困难极大,认为原来票额大,总金额小,现在面额小,总金额增大,按预定时间完成任务极其困难,经过多方详细商谈,苏方重新调整部署,无条件接受中方意见,加班加点,终于印制出第二套人民币中的 3 元、5 元,于 1953 年 9 月底至 1955 年初分批运抵我国,而国内自行印制的 2 元、1 元等六种辅币也已完成。经过严密组织,精心印制,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挥下,我国第二套人民币终于制作成功,于 1955 年 3 月 1 日在全国发行了第二套人民币。

(二)“苏三币”的发行和特点

5 元券和 3 元券的发行。当时根据人民生活水平、工资收入,以及市场交易等方面的因素,发行了 5 元券。5 元券发行后,发现使用不太方便,也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和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再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于是,中方通知苏联暂不印制大面额票券,增加印制 3 元券。3 元券的发行,主要用以调剂,而且便于交易,符合当时消费水平,这也是目前为止人民币中唯一一种面值的货币。

10 元券的发行。在观察分析美蒋敌特势力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扰乱动向后,我国认为其难以实施并对社会造成动荡。因此,在第二套人民币流通一年半后,于 1956 年 4 月 12 日我国向苏方提出“新印十元券 20 亿元,计 2 亿张”的请求。苏联克服重重困难,按时完成了任务,于 1957 年 12 月 1 日发行了 10 元券。这也是目

前为止人民币中尺寸最大的一种。这样,加上前期印制的 5 元券,苏联代为印制的三种货币,已全部发行完毕。

(三)“苏三币”的收兑

在 1956 年初,苏共二十大会议后,苏联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很大改变,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并趋于破裂。六十年代初,苏停止援华,并中止代印人民币工作,停止向我国提供印刷设备和印钞纸。我国立即调整货币政策,并组织科研攻关攻克和解决印钞设备、技术、印钞纸等关键问题,加紧自行研发高质量高水平的人民币。经过努力,于 1962 年 4 月 20 日成功发行了第三套人民币,结束了我国依靠外国印钞的历史。

1964 年 3、4 月间,在新疆和东北地区,苏联代印的人民币 3 元、5 元和 10 元券突然增多,而且全是真钞,流通无阻。虽无证据是苏联故意为之,但此现象极不正常,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我国政府决定立即限期回收。

1964 年 4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限期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知》(图 2),规定从 4 月 15 日至 5 月 14 日为收兑期,由苏联代印的 3 元、5 元、10 元券停止流通。当时,人民群众表现了极高觉悟和爱国热情,回收工作相当顺利。为照顾少数群众利益,又于 1964 年 6 月开始多次下发兑换通知。至此,“苏三币”全部兑付完毕,停止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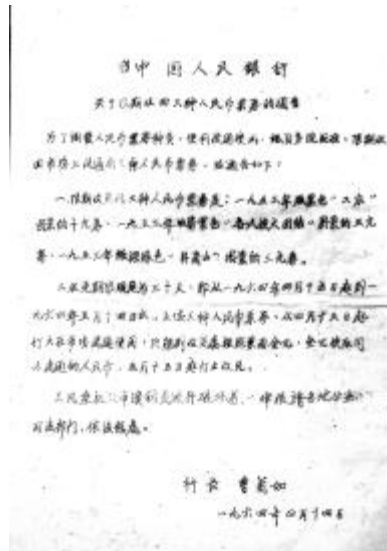


图 2 收回通知

四、创新与贡献

尽管“苏三币”存在诸多问题,且只发行了短短九年,但无可置疑,它对我国人民币走向科学化、实用化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客观的说,“苏三币”发行后对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国际上的影响、金融政策的改变、市场交易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新技术的突破与运用,特别是我国从此掌握了防伪的关键技术以及设备、印钞纸等方面的科学技术。

从技术层面看,正面上下花边与背面左右花符相对称,并首次采用先进的胶凹套印技术,钞纸有实心五角星花纹混水印,正面背面双凹印刷,版纹深,墨层厚,有很好的防伪技术。

从币面的设计图案看,3 元券颜色为深绿色,中间底纹为黄色,正面图案为井冈山龙源口石桥,背面为国徽图案及文字。5 元券正面为各族人民(下转第 38 页)

内蒙考古发现汉代铸钱作坊及钱币反映出的现象的启示

余 军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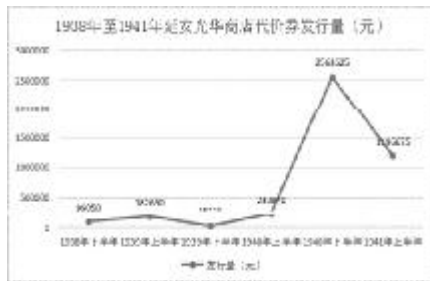
2014年2月25日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公布一项最新考古成果——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内发现了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铸钱作坊遗址。清理发掘出7000多斤的古钱,按每斤大约200枚计算,初步估算有140万枚。此次出土的古钱币大多为“货泉”,另外还有少量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布泉”“五铢”钱等。



出土的钱范

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原以为这里只是钱币窖藏,但他们又发现了铸币窑址4座。窑室平面主要为长方形,窑室一侧有火膛、火道、窑门、排水沟等。4座窑址分布井然有序,窑址附近还发现制晒坯场地。考古人员同时发现了陶器、铜器、铁器、石器及大量铜铁炼渣、动物骨骼等。判断是不是铸钱作坊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看有没有钱范(磨具)。他们很快在窑室及附近文化层中发现了150余块钱范(陶母范)、其他陶范20余块。其中有9块有确切纪年的钱范,上有文字“始建国元年三月”“钟官工……”和“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字样。而“始建国”就是王莽年号,即公元9年^①。正好与史料相符合:王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币制就有四次大的变动。王莽在居摄时期,始铸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始建国元年,进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悉废错刀、契刀、五铢钱,另铸小泉值一,与大泉五十并行,同时“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此次发掘证实鄂尔多斯地区当时已有铸币机构及地点。军事重镇有兵器制造系统也具备铸币条件。鄂尔多斯地区地处黄河南岸,古称河南地。秦汉时期,为了抵御匈奴侵扰,秦汉王朝曾多次派重兵攻取、驻守鄂尔多斯地区。从发掘出土的钱范、钱币实物情况看,可能是就地解决当时军事、经济方面的费用。有确切纪年的钱范虽然残缺但非常珍

贵,因为习惯上铸钱后必须要“毁版”。同时他们推断,这里出土的铜钱由于大部已残半,未经打磨修整,应该是在该处铸币窑址铸造后直接存放于3个钱币窖藏,未曾流通使用。这个炼、铸、存一条龙的铸钱作坊,当时应是统一规划建设而成。如此完整,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



出土的铜钱

霍洛柴登古城位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旗政府所在地锡尼镇西北20公里。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446米,南北宽约1100米。城墙夯筑,基宽13米,残高0.5~2米。墙体用白泥夯筑,很坚硬,最宽处可达十三米。城内地势较平坦,北部地势略高,现大部为草场和农田。据城内出土“西河农令”铜印及有关文物推测,古城时代约在汉武帝至王莽时期,属西河郡辖地。这座古城是当时汉抵御匈奴侵扰的驻军重镇,方圆1.5平方公里的古城,驻军规模可达几万兵马。该遗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内地表遍布陶片及砖瓦等,本次还出土了铠甲片、铜箭头等。在古城的东、南、西三面山梁上,分布有大量的同时期墓葬,规模较大。城内文化层厚约0.8米,采集到绳纹筒瓦和板瓦、凹弦纹板瓦、菱形纹方砖、“千秋”瓦当等。近年,地表还经常有陶器、铜器、铁器、钱币、钱范等遗物出土,较为著名的“西河农令”、“中



霍洛柴登城址考古发现图册

营司马”等汉代官印等即古城内出土。在古城北约 10 多公里处,就是古代“朔方郡”治下的一处大型城址(今磴口县哈腾套海苏木境内),也是军事重镇。另外 30 公里处有阿鲁柴登匈奴墓葬群(今杭锦旗阿鲁柴登村)。1972 年这里出土金器 218 件,其中的国宝重器“匈奴金冠”,重 1202 克,是迄今为止仅见的匈奴金冠。

霍洛柴登古城址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汉代古城之一,对于文献记载匮乏的中国北方地区来说,无疑是研究本地区西汉及新莽时期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无法替代的重要实物史料。古城位于人烟稀少的北方草原地区,时代较为单一,受后来人为破坏的因素较小,因此,古城基本保持了当初的布局、设施等原貌,这对于我们研究汉代的城市营造制度以及进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工作等,将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它后代延续使用过的古城遗址所不具备的特性。

由于霍洛柴登古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因此,无论是西汉前期中原王朝对匈奴的大举用兵时期,还是在后来胡汉和亲的绵延岁月,这里不仅是西汉王朝控制北方的前沿阵地,而且在维系、沟通中原与北方边陲地区关系史上一直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它在研究中原王朝与北方匈奴民族的战争史、商贸史、民族关系史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的价值。

从建有相当规模的铸钱作坊遗址和出土大量钱币实物资料看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们从一个汉代北防重要边镇的历史遗物、遗迹可看出王莽新朝的政治、军事缩影。如果汉武帝时期没在此地铸币,而王莽币制改革,改变不许郡国铸币的规定在边镇铸币,其原因是什么?是俗话说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是利用边镇已有的铸造条件设备,工匠,方便解决边镇经济急需,减轻朝廷运钱负担,或者说是汉代对边镇军事经济的重视和灵活性的一个表现?诸多因素中,笔者认为其主要因素与王莽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有直接关系。

第一,汉武帝是我国古代很有作为的一位皇帝。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初以黄老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做法,抛弃“无为而治”的政策,积极加强中央集权,实施“大一统”的主张。针对匈奴对西北边防的严重威胁,出兵反击,进而加强边塞防御,移民实边,发展交通,保卫了西北边疆,促进了民族融合,西汉政府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与各民族平等往来,保护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得到西域各族人民的拥护,西域各族“不乐匈奴(而)慕汉”。公元前 51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到长安,接受汉朝的册封,归附西汉。呼韩邪单于归汉,结束了匈奴政权和西汉王朝之间 150 年以来的对立状态,促成了大漠南北与中原的统一,为汉匈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共同发展创造了条件。汉匈两族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保持了 60 多年,王莽掌权后,为表现其“威德至盛异于前”,便改变了这种友好的态度,始建国元年(公

元 9 年),他命使臣收缴西汉时发给的“匈奴单于玺”,而代之以“新匈奴单于章”,不但在匈奴前加以“新”字,且以“章”代“玺”,表明王莽试图降低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将匈奴从前与汉天子的平等关系降为与王莽新室诸王同样的地位,从而使匈奴成为新室的附庸。这自然引起了匈奴单于的不满,加上其他一些纠纷,平静多年的北方边境开始紧张起来,战争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王莽不但不采取缓和措施,反而下诏令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单于”,接着又下令匈奴全国为十五单于,这就引起了匈奴单于的公开反对。匈奴开始侵扰边塞,边境地区吏民被掠杀者不计其数,形成了“千里无烟,无鸡鸣犬吠之声”的局面。王莽派孙建等十二将军,征发全国各地精兵三十万人,带足三百天的粮草,准备分十路同时并进歼灭匈奴。陆续征调的大军虽已抵达边境,但粮草的征集却十分困难,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年尚未集合十二将军之一的严尤指出,因为匈奴境内无处筹粮,一切均要汉军自带,有无斩获都要按时返回,否则自己就要困死在沙漠之中,所以,历来攻打匈奴的战役没有超过一百天的。全国各地调集部队,准备长期作战,其效果肯定不好。因此他建议派遣精兵北入沙漠,对匈奴实施闪击作战。王莽根本听不进严尤的建议,他动员全国的财力、物力,并下令将“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发往北方,将全国吏民三分之一的财产资助军费开支,准备同匈奴长期作战。这样,大大加重了内地人民的负担,使得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问题以及王莽改制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在内地由于政策多迁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到了天凤四年(公元 17 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终于导致了全国此伏彼起的暴动和起义浪潮。王莽在边镇铸币正是为加强军事和经济优势与匈奴长期作战军费。

第二,从出土钱币的下限看,该铸钱作坊也结束于王莽第四次改币后,说明此铸钱作坊与王莽政权一个命运。此次出土的古钱币大多为“货泉”。这又反映出什么现象呢?王莽第四次改革是在天凤元年(公元 14 年),废大、小钱,另作货布、货泉两种。货泉重五铢,货布重二十五铢,但一货布却值二十五货泉,货币价值的比例十分不合理。这次改革,非但没有理清混乱的货币体制,反而加剧了混乱。而且,这些改革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然后又以更劣的货币代替原来铸造的货币,每更换一次货币,百姓就要遭受一次盘剥。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王莽施行货币改革期间,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十分混乱,黎民百姓深受其害,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不少人甚至在市场上痛哭。相比而言“货泉”重值五铢百姓乐于接受,便于边镇交易。此次出土的古钱币大多为“货”(下转第 54 页)

残损硬币真伪鉴定探析

中国人民银行荆门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残损硬币兑换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而按照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程序应先对残损硬币进行真伪鉴定,然而无论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还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残损硬币鉴定都是薄弱点,不利于残损硬币的兑换,影响到了人民银行的声誉。本文对残损硬币的真伪鉴定及兑换工作进行了探讨。

一、残损硬币及其真伪鉴定

(一)残损硬币的分类

按《不宜流通人民币挑剔标准》(银发[2003]226号)规定,“硬币有穿孔、裂口、变形、磨损、氧化、文字、面额数字、图案模糊不清等情形之一的”,不宜再继续流通使用。根据不宜流通硬币的实物形态,笔者认为可以将残损硬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缺裂型硬币,包括硬币出现穿孔、裂口、变形、缺损等缺少、缺裂、变形等情形,其表面的文字、图案等特征较为清晰,易于辨别。流通中出现的缺裂型硬币通常以人为导致为主,如对硬币进行打磨、穿孔等做成的各种饰物、工艺品等;另一种是模糊不清型硬币,由于磨损、氧化、侵蚀等各种原因导致硬币表面出现腐蚀斑点、锈渍等,硬币的文字、面额数字、图案等表面特征无法有效识别。这种残损硬币相对较多,如因保存、使用、运输等自然磨损产生的残损硬币,还有诸多人为因素导致的残损硬币,如在某些旅游景区,游客将硬币投入水池,长时间水泡后变成了锈蚀硬币,又如在一些红白、乔迁、奠基等事件中,硬币被用作图取吉利的工具,被丢弃在地板下,衣柜底或地底下等,长年累月被氧化,锈渍斑斑。

(二)硬币真伪鉴定

目前鉴定硬币真伪的方法主要有对比法、测量称重法、合金成分分析法、机读法等方法,这些方法各具优势,适用于不同类型残损硬币的鉴定。

1.对比法。此法是将待测硬币与一枚同面值同版别真硬币的每个部位进行仔细对比区别,从而识别出真伪的方法。比对部位既可以是图案文字面额等外观特征,也可以是硬币边部,还可以是声音的对比。对比法需要借助放大镜这一工具,简单易行,是识别硬币真伪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但其不足之处在于仅适用于硬币表面特征比较清晰的情形,对于图案、文字、面额等模糊不清型的残损硬币,放大镜放大的效果并不

理想,使之失效。

2.测量称重法。通过千分尺、工具显微镜、图纹测高仪、衡器等度量工具,测量硬币直径、厚度、清边宽度、重量等重要物理参数,判断其是否符合真币技术标准或在允许的公差范围内,从而对硬币真伪进行判别。但对于氧化或锈迹严重的残损硬币,其物理参数可能已超出公差范围,在此基础上测量的结果就不能作为判别真伪的依据,因此还需配合其他方法综合研判。

3.合金成分分析法。这是一种运用仪器检查或化学分析的方法,能对硬币的金属成分及成分配比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具有较强的识别硬币真伪的能力,但此方法倚靠专业仪器和设备,并不适用于面向广大客户的残损硬币真伪鉴定,应用面较窄。

4.机读法。即通过非接触测量硬币的机读性能来判别硬币的真伪,主要设备有硬币清分机等,是硬币真伪鉴别的主要技术手段。这种方法同样需要相应的设备支持。

(三)残损硬币真伪鉴定的难点

1.残损硬币本身特征客观上造成鉴定难。对于缺裂型硬币,借助于面额、文字、图案等表面特征,真伪鉴定相对容易。但对于模糊不清型硬币,残损硬币外表呈现氧化、生锈、斑痕等,仅仅依靠表面特征进行真伪鉴定,如利用放大镜进行比对分析,利用度量工具进行测量等方法难以凑效,需要借助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合金成分分析,或利用机读性来辨别真伪等,这就需要残损硬币兑换或鉴定机构具有相关的设备条件,否则难以进行有效的真伪鉴定。

2.缺乏有效的鉴定工具。目前,人民币纸币鉴定工具有很多种,包括各类现金处理设备,均具备一定的纸币真伪鉴定能力,依靠这些鉴别工具可以较为准确地断定出纸币的真伪,即使是票面污损严重,图案文字面额等特征不清楚的残损纸币,也可以检测磁性如第五套人民币横号码,荧光如无色荧光油墨、无色荧光纤维、有色荧光油墨等,以及红外检测等,从而识别出真伪。但对于硬币真伪鉴定,目前主要借助放大镜这一工具,凭借工作经验进行综合判断,在遇到图案、文字、面额等模糊不清型的残损硬币时,就变得无能为力,不得不寻求其它更专业的设备。但由于各种原因,其它硬币

鉴定工具严重短缺。

3.相关人员鉴定技能和经验欠缺。无论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临柜人员,还是人民银行货币发行部门人员,日常接触人民币纸币多,对纸币真伪判断能力强。然而对硬币而言,表现出“三少”特征:一是硬币面额小,对硬币的防伪特征普遍关注较少;二是兑换残损硬币情形少,导致经验不足;三是对残损硬币兑换重视度不够,相关技能学习培训少。在人民币反假货币培训中,往往注重人民币纸币防伪特征的培训,而忽略了硬币防伪特征的讲授,在人民银行组织的反假货币上岗资格考试中对硬币防伪特征的考察也较少,使得相关人员的硬币真伪鉴定技能欠缺。

二、残损硬币兑换存在的问题

(一)法规未对残损硬币兑换进行明确规定

目前,关于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的主要依据为《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7号)(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对残缺污损人民币纸币兑换较为详细,但对残损硬币兑换规定并不是十分明确。一是未明确兑换标准。如针对残缺型硬币,办法并没有规定是否有全额和半额两种兑换标准;二是未明确是否存在不予兑换的情形,如确系持币人损毁的,是否不予兑换或半额兑换。使得在处理残损硬币兑换业务时,容易形成处理依据盲区。

(二)大宗残损硬币兑换操作困难

对于人为损毁的残损硬币,如乔迁或奠基时埋入地下、旅游景区抛于水池等产生的残损硬币,通常数量较大,客户提出兑换大量残损硬币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兑换残损硬币前需要进行清分、鉴定等前期工作。对于硬币清分,由于绝大多数银行业金融机构缺少硬币清分设备,清分工作完全依靠手工,耗时费力,容易发生拒绝推诿现象。对于残损硬币真伪鉴定,不仅鉴定困难,而且数量众多,部分金融机构往往以“难以辨别真伪”为由,甚至要求人民银行鉴定后才愿办理兑换业务,消极对待残损硬币兑换业务,导致大宗残损硬币兑换困难。

(三)缺少针对硬币的真伪鉴定书

目前货币真伪鉴定的凭证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真伪鉴定书》,凭证要素包括币种、券别、版别、数量、面额、冠字号码等,对鉴定纸币有较好的适用性,但硬币均没有冠字号码,出具的货币真伪鉴定书难以明示是哪一枚硬币的鉴定结果,给兑换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三、对加强残损硬币鉴定及兑换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推广应用硬币自动化处理设备

随着小面额人民币逐步硬币化,硬币的收付、处理、鉴定必然朝着机械化、电子化和自动化的方向发展。

为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同时破解残损硬币的鉴定兑换难题,建议一方面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广高性能、高实用性和兼容性的硬币处理设备,如硬币真伪鉴别仪器、清分机、包装机等,具体可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清分整点中心配备具有硬币真伪鉴别功能的硬币清分机,条件成熟的配备硬币清分包装机,既缓解硬币的清分压力,又解决残损硬币兑换过程中的清分、真伪问题。另一方面建议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配备硬币真伪鉴别仪器,以增强人民银行对硬币真伪进行鉴别的能力,维护作为人民币发行银行权威和声誉。

(二)增强硬币防伪知识的学习培训和宣传引导力度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应在加强内部硬币防伪知识学习和提高鉴定能力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外部培训和宣传。适当增加反假货币上岗资格培训考试中的硬币防伪知识考核部分,增加防伪反假培训中的硬币防伪特征内容,使纸币硬币并重,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学习硬币鉴别知识,提高鉴别能力。同时重点加强社会宣传引导,减少因存储、保管不当导致的残损硬币现象发生,营造爱护人民币尊重硬币的良好氛围,杜绝各类掩埋硬币、随意抛弃硬币等不良社会风气,从而解决大量残损硬币需要兑换的问题。

(三)完善残损硬币的兑换管理办法

建议针对残损硬币兑换的特殊性,可参考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管理的处理意见,做出相应的明确规定。一是明确兑换标准,对穿孔、裂口、破缺、压薄、变形等残缺型硬币,确定是否存在硬币剩余面积概念,按有全额和半额兑换标准;二是明确兑换范围,对确系故意损毁人民币硬币的,明确是否应予兑换。

(四)提高残损硬币鉴定和兑换工作的管理水平

一是针对大宗残损硬币兑换问题,在现存硬币清分机具不到位,清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做好相应的解释工作,要求客户对残损硬币进行前期清点分类,承担起相应的硬币保管不善的责任,从而缓解因大量清分工作挤占业务时间的压力;二是针对硬币无冠字号码,货币真伪鉴定书无法明示是哪一枚硬币鉴定结果的问题,利用现行或设计密封技术好的专用硬币封装袋,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真伪鉴定书》中注明鉴定硬币的券别、版别、枚数,与鉴定硬币一同封装入封装袋中,从而确定出鉴定硬币。▲

弘扬钱币文化 服务央行事业

——访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杨立杰行长

马海敏¹ 姜林²

(1.《金融博览》; 2.湖北省钱币学会)

【记者】(以下简称记):

杨行长您好!今年来,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钱币文化事业屡创佳绩,承办的“红色金融历史展”、“湖北近代钱币展”在社会上引发较大反响。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杨立杰】(以下简称杨):

我个人比较爱好历史。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革命先烈们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创立人民民主政权,始有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作为一名央行人,我也积极关注那些没有硝烟的战场,那些在金融领域坚持斗争的英雄们。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年那一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金融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用羸弱的身躯承担起红色金融的重担,书写出一部集发行货币、发放贷款、货币斗争、统一财政、货币政策、金融思想等于一身的红色金融恢弘巨著。这是一部不容忘却的历史,是一部值得撰写、宣传、铭记的光荣历史。作为新时代央行人,我们责无旁贷,这也是武汉分行积极承办“红色金融历史展”的初衷。

为办好“红色金融历史展”,武汉分行成立了专班,整整筹备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于今年3~4月份在湖北省博物馆顺利开展。展览以“传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红色金融文化”为出发点,通过一系列展板、展墙、实物、场景、歌曲演示、视频展播、观众互动等方式,全面讲述我国红色金融的重要历史轨迹,展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足迹,讴歌了我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庆平、原副行长马德伦,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尹汉宁,副省长曹广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斌等同志先后莅临观展;



整个展览特色鲜明,有亮点、有看点、观众如潮,保守估计逾十万人次,社会各界反响也很好。展览主要有三

个特点:

一是内容丰富。展厅面积近1200平米,展板百余块、展出文物3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3件,包括鄂西农民银行铸造马克思头像银币、鹤峰苏维埃银行五百文铜币木刻板、京山豫鄂边区建设银行边币石刻板等文物首次组合亮相。此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鄂东南工农银行石刻板和国家银行钞票设计者黄亚光同志亲笔信等珍贵文物也同时展出,引发广泛关注。



二是特色鲜明。现场展示柴山洲特区农民银行、马克思银元铸造、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营业厅、江南银行抗币印制、新四军转战江南电子地图、第一套人民币壁龛等立体场景,拉进了与观众的距离;录制播放了《红色金融历史展》、《北海银行在沂蒙》等视频,充实了武汉分行辖内赣鄂湘三省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的金融活动内容,完整反映了当时的金融发展状况。在观展现场,除发放常规的宣传画册、导览手册外,还首次编纂、印制了红色金融地图、红色金融纪念封等文化产品,得到观众热烈追捧。

三是服务热忱。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办公室、博物馆、保卫处、工会办等部门合力,确保了展览有序、安全、无事故。组织有武汉分行机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省博物馆3支讲解员队伍,首次配备英文讲解员,满足了国际友人参观的需要,这在全国类似展览中尚属首次。人民网、新华网、金融时报、湖北卫视、楚天都市报、湖北电台、荆楚网等主流媒体也纷纷报道,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在汉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各高校等分批组织团体参观,日常接待络绎不绝,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学习和宣传红色金融的热潮。

至于“湖北近代钱币展”,则是武汉分行首次组织赴异地办展。湖北古属楚地,楚大布、蚁鼻钱、郢爰等都

是独具湖北特色的钱币。中国近代百余年间,社会风云急剧变幻,政治时局跌宕起伏,与此相伴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湖北处水陆通衢之地,人文荟萃、经济发达、金融繁盛,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突出,省会武汉更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军事要地、金融中心。与此对应,湖北钱币亦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譬如:晚清钱币史上湖北钱币占据一席之地;湖北官钱局所发官票,其数量之多、信用之佳、流通之广,为他省所不及;湖北铜元铸数之多、余利之厚、居全国之冠;“奏办湖北签捐彩票”是我国第一张官办彩票;湖北银元“铸数甚多、成色较优、畅行江浙各地”;湖北银锭形态多样、造型优美、内涵丰富;“汉钞”曾享誉中南八省;民国时期,武汉汇聚各类银行、钱庄、保险等金融机构百余家,为全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业务量仅次于上海。这些银行发行的地方货币为“汉钞”,流通于长江以南地区,为中国货币史上的特殊现象;湖北红色货币见证了人民货币的完整成长轨迹:湖北是



革命的热土,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是我国最早一批人民货币之一;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湖北均印制发行过红色货币,成为红色金融史的亮点。此外,武汉分行在钱币文化建设方面,多年来成效还是不错的,在本次展览中也有所涉及。这个展览的规模相对小一点,主要以精品陈列为基础,以时间脉络为主线,以金融经济为背景,力图反映出近代湖北、武汉的经济、金融和社会状况,宣传湖北、宣传武汉。从开幕式上大家的评价来看,反应尚好。你们是专业的金融媒体,也希望你们多提宝贵意见。

【记】“湖北近代钱币展”开幕式我也参加了。与会的无论是钱币专家或是普通观众,大家都认为整个展览脉络清晰、图文并茂、精品迭出、值得一看。您刚才提到武汉分行的钱币文化事业,成效较好,也麻烦您展开谈一下。

【杨】好的。其实我来武汉分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不过,多年前,我就知晓武汉分行建有专业的钱币类博物馆。前年你们《金融博览》刊载了湖北钱币博物馆的系列报道,我也曾拜读。武汉分行钱币事业历史较长:湖北省钱币学会成立于1987年,已近而立之年;湖北钱币博物馆于2003年正式开馆,也已走过了一个轮回。根据我最近了解到的情况,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钱币工作在钱币研究、宣传、推广等方面做得还不错。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的人民银行湖北省分

行就相继成立有“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课题组”、“楚国货币研究课题组”。先后组织编写《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史》、《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等红色金融书籍。1995年举办“楚国货币理论研讨会”,在业内有较大影响。2004年配合中国钱币博物馆开展“中国古代范铸法铸钱工艺模拟实验”,获全国银行科技发展二等奖;2005年《湖北清代民国银锭研究》、2006年《蚁鼻钱铸造工艺研究》、2013年《论钱币博物馆与央行文化建设》等课题也先后获奖;2012年筹建“湖北省钱币专家库”,策划出版《湖北钱币研究丛书》,该丛书第一本专著《顺治钱百珍》已出版发行;2013年出版《湖北钱币博物馆藏品选》精品图册,广受好评。

武汉分行也曾组织、承办过多次全国性、专业性的学术会议,形成较大影响。2002年承办“全国金属史和钱币史学术研讨会”,2004年召开“中国古代范铸法铸钱工艺模拟实验研究”专家鉴定会,2006年召开了“楚国货币与中国古代铸造业研究”学术研讨会,2008年承办中国钱币学会第五届铜元研讨会,2009年承办全国货币反假学术研讨会,2010年承办《中国钱币》与货币文化研讨会,2011年承办辛亥革命与货币专题研讨会。每次的研讨会,武汉分行均高度重视、统筹协调、精心组织、热情服务,得到与会代表们充分肯定。



立足央行履职,弘扬钱币文化是我们开展钱币工作的重点。2003年组织湖北各地市开展“反假货币巡回展”,接待参观群众十万余人;2004年配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办“革命根据地货币展”,使观众以钱币为媒介接受革命洗礼;2005年开办“人民币反假工作成果和教育展”,较好履行了中央银行货币反假职能;2006年开展“湖北省金融理财文化节”宣传,钱币文化深





入人心;2007年组织拍摄湖北地方货币专题片,在湖北卫视连续播出,在社会上掀起较大反响;2008年制作宣传片《新中国钱币概况》;2009年与省公安厅、工

商局联办“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安全”宣传咨询活动,社会效益良好;2010年在《武汉晨报》开辟专版全面介绍新人民币发行情况及相关知识,2011在互联网上开通了湖北钱币网,2013年与中国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了5.18博物馆日系列活动,人民网、中国日报网、凤凰网等相继报导,2014年与武汉市档案馆联办“近现代鄂泉图要”展览。分行还组织参与历年来的3.15人民币反假宣传活动、省社科联“科普活动周”、湖北省政府“中国·武汉金融博览会”,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

【记】听您一席话,才知晓武汉分行的钱币工作者原来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看来,我们也要加大宣传力度,一些好的经验也要给大家分享。

【杨】经验谈不上,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心是不可或缺的。钱币这块工作在全行工作中属于冷门,人也不多,钱币博物馆正式员工仅3人。我自从来武汉履职后,去博物馆、库房都看了看,工作环境和性质都比较磨练人。一个馆藏清理,可以做两三个月,整天对着那么多藏品作保养,单调枯燥;最近又在申报文物系统的“可移动文物普查”,藏品要拍照、立档、统计、上数据库,工作量也极大。这些藏品价值又高,一个银锭就

价值几十万,非得找让人放心的干部管理不可。日常工作除外,去年他们还接连筹备了红色金融展、湖北近代钱币展两个大项目。上次他们给我

一个总结材料,里头说到为筹办红色金融展,查阅资料万余份,驱车逾十万公里,我还不信。结果馆长给我掐指算了:他们组织专人耗时两个多月查阅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抗战日报、新华日报等老旧报刊,从中查找红色金融线索,从创刊日算到解放前有近万份,加上其他老旧书籍、画册、资料等,数量过万。为汇报展览进度跑了6次北京,驱车深入辖内吉安、赣州、衡阳、浏阳、咸宁、荆州、黄冈等地调研,更在千里之外的浙江长兴县征集到新四军当年的圆盘印刷机。有不少红色金融遗址地处山沟沓晃,出入得坐上几个小时的“摇摇车”,用他们的话说:“颠得人胆汁都恨不得吐出来”,还是相当辛苦的。

【记】成功的展览背后,离不开创作人员的艰辛。在此,我谨向武汉分行钱币事业所取得的业绩表示祝贺!▲



(上接第30页)大困难,小面额光华券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要,1941年初边区政府不得已增发了面值7角5分的光华券,这种货币实际上已在实行主币的功能。大量增发的光华券造成延安物价指数进一步大幅上升,甚至超过了国统区,物价急剧上涨也加速了通货膨胀。抗日战争以及国民党对边区经济封锁固然是造成1941年延安通货膨胀加速的外部因素,但光华券的大量增发无疑也是造成物价上涨的重要内部因素。这为1941年至1945年边区严重的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当然,作为一种在特殊政治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货币,光华券的产生和增发有其历史必然性。光华券的发行不仅促进了边区市场交易,繁荣了边区市场,加强了边区与友区的贸易往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边区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光华券对支持抗日战争,建设边区和巩固大后方做出了重大贡献。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光华券的发行对边区经济建设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要认识到因为光华券的增发而造成边区物价上涨对边区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五、结语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金融业发展过程中,延安光华商店代金券作为一种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产物,与法币共同组成了边区的流通货币体系。光华券的发行,活跃了边区市场交易,发展了边区经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边区政府灵活有效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和边区法币不断外流,使得光华券大量增发,面值增大,给边区财政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困难,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区短缺的财政及疲乏的市场交易,但同时推高了物价,造成边区通货膨胀,给边区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 [1]任群景.抗战时期浙江小区域流通货币述略[J].中国钱币,2014,(6).
- [2]万立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及成因[J].江苏社会科学,2015,(5).
- [3]戴建兵.抗战时期的中日货币战[J].党史文汇,1995,(1).
- [4]胥思省.浅谈抗战前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J].黑河学刊,2011,(8).
- [5]金正.一部求实创新的货币史研究著作——评《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货币史》[J].中国钱币,1996,(2).

继承好传统 激发正能量

努力做好新时期基层央行金融货币工作

——从鄂豫皖革命金融货币工作前辈们的那些事说起

戴启斌

1991~1997年，我先后在人行红安县支行任副行长，人行黄冈中支金融研究室任主任。在这段岁月里，因为热心研究鄂豫皖革命金融、货币史，便利用工作和业余时间，收集了大量有关鄂豫皖地区革命金融、货币史资料，采访了不少曾经从事革命金融、货币工作的老同志，并与人合作，编写了《鄂豫皖革命金融史略》（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自己独立编写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与河南、安徽两省钱币学会合作，编写了《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进行上述工作的过程中，最令我不能忘记的是那些跟着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大别山区闹革命、打江山、从事革命金融、货币工作的前辈们为了开创革命金融货币工作而建立的丰功伟绩，付出的智慧心血，承受的艰难困苦，获得的成功喜悦……

一、信念产生了无穷力量

美国进步记者、作家埃德伽·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高度赞扬革命根据地金融、货币是“中国的一个奇迹”。鄂豫皖根据地劳苦大众把根据地银行称为“工农银行”、“农民银行”，把根据地的货币称为“我们自己的钱票”。

1930年6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具有坚定信念的卢楚桥、卢汉桥兄弟俩，找到在武汉从事革命地下工作的同志说：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苏维埃银行也成立了石印科，准备发行根据地货币，是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需要，也是劳苦大众掌握货币命运的大事，我们志愿放弃在武汉的工作，到根据地从事货币制版印刷工作，为革命的金融、货币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经组织同意后，卢楚桥、卢汉桥兄弟二人进入鄂豫皖特区所在地——红安县七里坪附近的杨家畈，后迁至河南新集附近的扒棚。坚定的信念给了卢楚桥、卢汉桥兄弟二人巨大的力量和无穷的智慧和智慧。二人自进入根据地的第一天起，便开始了根据地货币制版印刷工作。没有桌子，他们就在膝盖上放一块木板替代；没有电灯，就在小煤油灯下绘图、刻图、制版……在克服了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凭着对革命事业的一颗赤诚的心，将鄂豫皖特区银行货币印制出来并发行流通了！正如当时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关于鄂豫皖特区情

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中写道“鄂豫皖特区银行已于本月十五号开幕，作用非常之好。农民都用苏区银行的纸币，不要非苏区的票子。只七里坪一处几天工夫已用了四千元，现在还来不及印刷大批纸票来供应市场”。后来的岁月里，卢楚桥、卢汉桥兄弟二人，在条件艰苦、工具简单的情况下，共绘制、刻版、印刷了6种版面，8种版别的鄂豫皖根据地货币，此外还印了大量的传单、标语、布告，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宣传民众，瓦解敌人做出了特殊贡献。当时苏区老百姓高兴地唱道：“苏维埃有个石印科，标语传单印得多，自办银行印钱票，边区群众乐呵呵”。

二、制度磨炼出坚强意志

人们常常把军队的纪律、铁路的时间、银行的制度相提并论，这说明纪律、时间、制度对于军队、铁路、银行该是多么的重要！在鄂豫皖苏维埃银行时期，由于处在战争的环境下，苏维埃银行的制度建设极为完备，执行制度十分严格。当时不仅建立了严格的银行制度，即苏维埃银行隶属鄂豫皖特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双重领导，监察委员会可以检查监督银行款项及负责人和职员的行为；而且，还建立了严格的发行制度、存贷款制度、利率制度、出纳制度、押运制度、结算制度、待遇制度……以待遇为例：银行干部、职工的物质生活和普通战士一样微薄，每人每天1斤米，油盐各5钱，菜1斤，每月零用钱银元五角，每年棉衣、夹衣各1件，单衣1套。苏维埃银行时期环境的艰苦，任务的艰巨繁重，物质生活的微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苏维埃银行干部职工自觉遵守银行的各项制度，保证了战时金融货币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在人行红安县支行编写《鄂豫皖革命金融史略》一书时，有幸收到了当时在苏维埃银行担任押运员的李正山讲述的回忆录，他说“当时押运员送货币没有车，只是用一根扁担，两个麻袋，担着货币往部队送，被部队战士和老百姓称为‘扁担’银行。鄂豫皖地处大别山区，部队比较分散，送货币走的是山路，真是翻山越岭，往返一天得走几十里、上百里的崎岖山路。送货币有部队战士武装护送，有好几次我的肩上磨出了血，浸透了衣服，被护送的战士发现了，战士总是主动要替我挑，但当时银行有制度，押运员送货币不允许让别人挑，所

以,我总是不答应,从不让护送的战士代挑。货币送到银行网点或部队,要当时点清,入账要押运员签字,押运员工回单位要有收到货币的网点、部队负责人签字,制度非常完善和健全。正是这些完善严格的制度,磨炼出我坚强的意志和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才使得我能够坚持做好战时银行押运员这份既艰苦又有意义的革命工作……”正是由于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处在战争环境中的革命金融、货币工作者自觉遵守银行制度和纪律,才使得战时革命金融、货币工作从无到有,从有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无价遗产。

三、爱国培育了奉献精神

国是民之根,民是国之本,人之大爱,在于爱国。一个具有爱国之心的人,才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鄂豫皖革命金融货币工作时期,从事金融货币工作的前辈们,正是在爱国情怀的培育下,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创建了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威武雄壮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抵抗日寇的搜刮掠夺,维护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与敌伪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支援抗日战争。1940年鄂豫边区民主政府组建了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发行了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卡,办理发放贷款,代理金库收支,办理边区货币汇兑和发行边区公债等金融货币业务。边区建设银行下设信南、襄中、黄冈、鄂东5个分行,建立了三个印刷厂,在少数县设有办事处。黄冈分行(后改为黄冈办事处)陂安南办事处,在大别山南麓的黄冈、麻城、红安一带随军从事抗日金融货币工作。黄冈分行行长由傅威担任,李肖任副行长,改为办事处后由李肖任主任。据

李肖回忆,“当时主要业务是支持抗日战争,其次是发放贷款。在游击战争中,军队和政府都带着钱,银行、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带着钱并备有一挑夫,遇到敌情,夜间挑着全部现金转移。银行、办事处工作人员还备有长条形布袋,袋里主要装银元,背着行军。款项主要是发放农业贷款和副业贷款。提倡‘越穷越贷’、‘有借有还’,以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买耕牛、水车、犁耙等农具,也贷给小本经营的商贩到国民党区、敌占区购买食盐等物资,到河南买猪回来繁殖。边区建设银行工作极端艰苦、凶险,陂安南办事处一名挑夫,去塔耳岗被日本军队捉去枪杀了。我曾把一岁多的女儿寄养在刘大垸农民家中,因战争环境工作紧张,直到孩子病逝都未去看望。银行干部的物质生活和普通战士一样微薄。印钞三厂在一次转移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有时只靠菱角米、芦苇根、野菜充饥,一个人每天要完成800大张建设银行卡的印刷任务,废品不得超过2%”。

从李肖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革命金融货币工作者和队伍,才使革命根据地金融货币工作在敌后得到坚持并不断发展,为抗日救国和中国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他们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党领导的金融革命事业的伟大精神,他们无私无畏为之奋斗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并发挥光大!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事业,我们中央银行的广大干部职工,一定要积极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号召,继承和发扬革命金融前辈们的好传统,激发正能量,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拓创新,把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执行好,把新时期的金融、货币工作做细、做实、做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上接第48页)已经被国家银行所取代。钱庄业的存在或发展,已失去动力和活力。

1950年时,沙市钱庄有7家先后停业。1951年,又有3家钱庄停业。仅剩的一家同泰钱庄,也于1952年7月8日歇业。至此,沙市的钱庄业,不复存在,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表2 解放后沙市钱庄开、停业情况表

序号	名称	经理	开(复)业时间	停业时间	注 释
1	怡源	肖平阶	1949年9月9日	1950年12月	聚源改牌复业
2	久和	李少泉	1949年9月9日	1951年9月4日	久和复记复业
3	通泰	王荣林	1949年9月10日	1952年7月8日	通泰复业
4	厚生	雷斯仲	1949年9月12日	1950年9月25日	厚生复业
5	新沙	刘荣卿	1949年9月13日	1950年12月	恒合昌、志和合并改牌复业
6	公福	彭君祥	1949年9月14日	1951年9月	裕茂得改牌复业
7	信通	宋以良	1949年9月14日	1950年2月25日	安利、公益合并改牌复业
8	利群	江积山	1949年9月14日	1950年5月31日	新组建
9	宏裕	张和钦	1949年9月14日	1950年5月3日	宏裕复业
10	永孚	陈康伯	1949年9月14日	1950年3月	永隆、信孚(昌)合并改牌复业
11	众城	罗小溪	1949年9月30日	1950年5月31日	裕生厚、鸿大、竞业合并改牌复业

沙市钱庄业,从出现、发展、壮大、到消失的整个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民国及解放初期湖北省,甚至长江中下游诸省钱庄业的一般发展历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因此,在研究湖北省钱庄业的历史发展状况时,沙市钱庄业的发展状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黄鉴晖等.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 [2]日本驻沙市领事代理事务本部岩彦明台四十年(1906年)一月二十九日报告[R].1906.
- [3]沙市钱庄[R].钱业月报(卷3第7号),民国十二年(1923年)八月十五日.
- [4]沙市钱业之调查[R].汉口商业月刊,民国十三年(1924年)五月号.
- [5]沙市钱业公会会员一览表[R].全国银行年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 [6]湖北省年鉴[M].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409.
- [7]各行业街道分布[J].沙市《商会卷》219卷,民国37年9月.

珍稀铜圆看十堰

黄定学

十堰市属于大山区,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使之遗留着相对丰富的铜元资源。尤其是最近几年来,铜元在十堰市受到了钱币收藏界的重视。经过一些铜圆爱好者的发掘,部分珍稀铜圆陆续被发现和收藏。本文对这些铜圆作些介绍,以供铜圆爱好者研究和交流。

一、十堰在哪里

历史沿革。十堰市古名十堰镇。原名张家庄,传说后改为陈家街。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湖广图经志书》载:“(十堰)在县南(指郧县—作者)因溪作堰以溉田。”(康安宇《十堰方国考》107页,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1版1印)即十堰是因在郧河、百二河上筑了十个堰塘蓄水灌溉农田而得名。

十堰市是一个“因车而建、因车而兴”的新兴汽车工业城市。1967年4月1日,第二汽车制造厂在十堰市大炉子沟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1969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十堰市(县级),1973年2月升格为地级市,直属湖北省管辖。1994年,郧阳地区和十堰市合并,仍称十堰市。现辖一市四县三区。一市为丹江口市,四县是郧西、竹山、竹溪、房县,三区有张湾区、茅箭区、郧阳区。

地理方位。十堰市地处鄂西北,鄂、豫、陕、渝四省(市)结合部。境内除东北方为汉水与其支流丹江交汇的低地外,其余均为高山峡谷,重峦叠嶂,山高坡陡,草深林密。汉江在市区北部由西向东横穿郧西县、郧阳区、丹江口市而过。此地为大巴山北坡,秦岭东部余脉,武当山、神农架等名山汇聚之处,地理位置被古人形容为:“西控秦蜀,东捍唐邓,南制荆襄,北连商洛”(康安宇《十堰方国考》106页,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1版1印)的战略要冲,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朝秦暮楚”的典故即源出于此。

自然人文景观。全市国土面积2.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50万。是鄂、豫、陕、渝毗邻地区唯一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十堰市主要的自然人文景观有:闻名全国的汽车工业生产基地,“东风汽车”的故乡——“中国第一、世界前三”的商用车生产基地;有世界文化遗产、4A级旅游区、“天下第一仙山”的道教圣地武当山;有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丹江口水

库;有轰动中外、240万年前的“郧阳人”头骨化石;有国家地质公园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还是古代“和氏璧”——绿松石的主要产地。

汽车产业在十堰的兴起,武当山旅游经济的发展,水电和绿色环保产业的开发,交通的便利,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极大的改变了十堰经济社会的面貌,借助改革开放,十堰人开始富裕起来了。富裕起来的十堰人文化消费力迅速提升,使钱币收藏也逐渐成为十堰市人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珍稀铜圆与藏家

十堰市山大,封闭,交通长期相对落后,使较为丰富的铜圆资源及部分珍稀铜圆藏在深山人未识。随着近些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干打垒的土墙房屋逐渐被淘汰,使人们久已遗忘的铜圆也迅速进入收藏界的视野,其中包括部分珍稀铜圆。

最先发现铜圆价值和关注十堰市铜圆资源的是许向东先生,他来自成都市文化交流中心,是一位在十堰开店的古玩商人,在十堰城区先后陆续收购到铜圆6~700斤,其中有数枚珍稀铜圆。

其次是十堰市钱币研究会会员李志强先生,他以铜圆作为专题,注重版别研究和搜集,收藏铜圆版别达到了2000多种,本地大多数珍稀铜圆都被他发现 and 征集收藏,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

再次是本市泉友桂柏松先生,起步虽晚,但是在四川军政府铜圆的收藏上有独到的眼光和见解。

1. 湖南部颁面背九尾龙

参数:直径28.3毫米,厚1.7~1.9毫米,重7.2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正面上刊“光绪年造”四字满文和“丙午”二字,中间“户部”二字分列左右,中心阳台上阴刻“湘”字,其上下左右为“大清铜币”四字,中心湘字有别于仿部颁面。外环珠圈,下边为“当制钱十文”。背龙头宽大,双线腿,龙尾巴有九根线,收藏者习惯称其为“湘九尾”,存世量少于乙字龙。

本地收购,在一些杂铜圆中挑出,少见大珍品。

来源:许向东先生藏。

材质:红铜。

等级:三级。(图1)



图1 湖南部颁面背九尾龙

2.横山东平点光背米字星内卷云

参数:直径 28.2 毫米,厚 1.8 毫米,重 6.7 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正面为横山东,上边刊“光绪年造”四满文,下边是“当制钱十文”,中间为“光绪元宝”四字,外环珠圈,左右边各有一五瓣边花,背面中间为飞龙,外环珠圈,上下边刊英文,左右各一米字星。

是品老生坑,较少流通,栗壳色包浆,马齿基本完整,钱文大部分清晰可见,龙鳞有一定程度磨损。此版是山东铜圆中最为著名的版别。

在本地收购的一堆普通铜圆中发现,难得一见的珍品。

来源:许向东先生藏。

材质:红铜。

等级:三级。(图 2)



图2 横山东平点光背米字星内卷云

3.湖北平满文跳“E”龙

参数:直径 28 毫米,厚 1.8 毫米,重 7.2 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面文中心为五瓣花,上下左右对应为“光绪元宝”四字,外环珠圈,上刊“湖北省造”,下边“当十”二字,中间左右“宝源”二满文,略大,位置也略低,以右边满文为准,头部与左边的“元”字头平行,所以称之为“平满文”。背龙身瘦小乏力,左边英文“TEN”的“E”向上高出左右字母,因此,被称之为跳“E”龙。与其它湖北光绪五瓣花一样,都属湖北汉阳兵工厂造,文字书写不规范,图案欠精致。

是品浅栗壳色包浆,尚有小块黑色包浆和绿锈,流通痕迹明显,磨损较重,属湖北铜圆中的珍稀版别,存世极稀,在本市竹溪县发现和征集。

来源:李志强先生藏。

材质:红铜。

等级:四级。(图 3)



图3 湖北平满文跳“E”龙

4.湖北中金钱跳“E”龙

参数:直径 28.2 毫米,厚 1.6 毫米,重 6.9 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混版。正面中心为一四出纹方孔圆钱图案,融古钱和机制币理念于一体,即都是一般商品的等价物。上下右左为“光绪元宝”四字,外环珠圈,上刊“湖北省造”四字,字形较大,书写怪异,下边为“当十”二字,中间满文“宝源”二字,分列左右。

是品 2007 年 12 月在本市花果街办发现,是在二万多枚铜圆中挑出的唯一一枚五级币,十分稀见,曾被作者发现、收藏并经段洪刚先生亲手鉴定。

是品橙黄色包浆,尚有成片黑锈,文字清晰,珠圈完整,马齿部分可见,边轮无磕碰伤,保存状态较好。

来源:李志强先生藏。

材质:橙黄铜。

等级:五级。(图 4)



图4 湖北中金钱跳“E”龙

5.湖北高满文圆口龙

参数:直径 27.9 毫米,厚 1.7 毫米,重 6.9 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正面中心为五瓣花,与其它高满文面文相同。背龙口两根胡须上一个圆圈套住龙口,故称圆口龙。鼻梁较粗,左下龙爪较短,也称短爪圆口龙。

是品栗壳色包浆,正面钱文尚可识读,边齿不完整,花心亦有磨损。背面上半部磨损较重,英文已模糊不清,下半部龙爪、英文尚清楚。币身流通痕迹较重,背部左右由于模具损坏留下三条凸出模裂纹。

存世极为稀少,属湖北铜圆中的珍稀版别和大名誉品之一。

此品发见和征集于十堰市郧阳区。

来源:李志强先生藏。

材质:红铜。

等级:五级。(图5)



图5 湖北高满文圆口龙

6.湖北低满文圆口龙

参数:直径27.8毫米,厚1.8毫米,重6.9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正面中心为五瓣花,与其它低满文面文相同。背龙口两根胡须上一个圆圈套住龙口,故称圆口龙直鼻龙,和高满文相比,左下龙爪较长。

是品栗壳色包浆,正面钱文尚可识读,略有边齿,下边“当”字几乎磨平。背面周边磨损,英文已模糊不清,但龙鳞完整。币身流通痕迹较重。

存世稀少,属湖北铜圆中的珍稀版别之一。

此品发见和征集于十堰市郧阳区。

来源:李志强先生藏。

材质:红铜。

等级:六级。(图6)



图6 湖北低满文圆口龙

7.湖北高满文背小胖龙长刺

参数:直径28毫米,厚1.75毫米,重7.4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钱文书写不规范,随意。中间五瓣花,上下左右为“光绪元宝”,上边刊“湖北省造”,下边为“当十”,中间左右为满文“宝源”二字,满文高大,尤其是右边满文,位置高于“元”字,故称高满文。背龙身小而肥胖,左边一根长刺与龙身相连,故称小胖龙长刺。

是品橙色包浆,马齿完整,文字大都清晰可辨,惟正面“绪”字上部和背面左下边英文“E”有较大磨损,与钱谱一致。

此品发现和征集于本市房县,流通痕迹自然,无磕

碰伤,器形完整,保存状况尚好。

来源:李志强先生藏。

材质:橙黄铜。

等级:六级。(图7)



图7 湖北高满文背小胖龙长刺

8.湖北大北六瓣花背珠圈水龙

参数:直径28.2毫米,厚1.9毫米,重7.5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正面中心为六瓣花,上边“北”字特别大,故称大北,“省”字也大,而且接近下边珠圈。下边“当十”二字,中部左右为满文“宝源”。背面水龙,外环珠圈,龙身矮小,通称珠圈水龙,是湖北的大名誉品之一。

是品正背深打,钱文清晰,珠圈齐全,龙鳞完整,局部边齿略有弱打。橙黄包浆,尚有成片黑锈和点状绿锈,基本未流通,保存状态良好,存世稀少。

来源:李志强先生藏。

材质:红铜。

等级:六级。(图8)



图8 湖北大北六瓣花背珠圈水龙

9.湖南大湘背乙字龙

参数:直径28.3毫米,厚1.6毫米,重6.9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正面中间一个阴文“湘”字,粗大规矩,“目”内二横连接二竖,上下右左为“大清铜币”四字,上边刊“光绪年造”四字满文和右左“丙午”二字,下边为“当制钱十文”,中部为“户部”二字。背面中间龙图极类一个“乙”字,故名。龙的设计与其它省的龙完全不同。

是品传世包浆。由于币坯在压印时,在模具中放置的不平,因此,边齿存在深浅不一的现象。但字文深峻,龙形独具湖南特色,雕刻精美,立体感强。龙鳞略有磨损,流通痕迹自然,保存状况基本完好,存世不多,属珍稀版别。

来源:李志强先生藏。

材质:红铜。

等级:五级。(图 9)



图 9 湖南大湘背乙字龙

10.四川斜满文拱笔四背短角水龙

参数:直径 27.7 毫米,厚 1.6 毫米,重 6.9 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正面上边从右至左刊“四川省造”四字,中部左右为“宝川”二满文,下边为“当十”二字。珠圈内上下左右为“光绪元宝”四字,中间花心。背面是一条水龙,龙角较短,左边龙角下的耳朵位置特别靠上,而且龙头上的刺直而少。

在本地收购的一些杂铜圆中挑出。

来源:许向东先生藏。

材质:黄铜。

等级:六级。(图 10)



图 10 四川斜满文拱笔四背短角水龙

11.四川山字龙二十文

参数:直径 32.5 毫米,厚 2.2~2.4 毫米,重 13.8 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正面中间是花心,上下左右为“光绪元宝”四字,上边刊“四川省造”四字。四字有大、中、小之别,此为小四,下边“当二十文”,中部左右为“宝川”二满文。

背面中间一条飞龙,外环珠圈,上下边是英文,下左为阿拉伯数字“20”,中部左右各有一朵阴五瓣边花。该版的主要特征是龙头上方的火焰似一个“山”字,故名“山字龙”。山字龙是四川二十文铜圆中的珍稀版别,久负盛名。

是品水坑,正背深打,边齿齐全,字文深峻,龙图完整,流通痕迹自然,龙鳞略有磨损。发现和征集于本市郾阳区将军河镇。

来源:李志强先生藏。

材质:黄铜。

等级:六级。(图 11)



图 11 四川山字龙二十文

12.安徽皖字大清铜币二十文

参数:直径 32 毫米,厚 1.9 毫米,重 14.2 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正面中心“皖”字,上下右左为“大清铜币”四字,外环珠圈,上刊“光绪年造”四满文和“丙午”二字,中间户部二字分列左右,下边是“当制钱二十文”。背面大清龙外环珠圈,上边为“光绪年造”四字,左右和下边刊英文。

是品栗壳色包浆,边齿全,但钱文笔划缺失较多,背龙鳞也较多磨损,流通痕迹较重,保存状况一般。

据有关文献介绍,“皖”字大清铜币二十文,生产时间较短,铸额仅数万枚,存世量仅 20 枚不到,大珍,得之不易。

来源:李志强先生藏。

材质:红铜。

等级:三级。(图 12)



图 12 安徽皖字大清铜币二十文

13.安徽光绪元宝宝安二十文

参数:直径 33.2 毫米,厚 2.2 毫米,重 14.5 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正面中间为满文“宝安”二字,上下右左为“光绪元宝”四字,外环珠圈,上边刊“安徽省造”下边从右至左为“每元当制钱二十文”,上半部左右各有一米字星边花。背面中间为珠圈坐龙,上下边为英文,左右各有三个米字星边花。

是品浅栗壳色包浆,正背深打,边齿完整,钱文深峻,龙鳞完好,基本未流通,保存状态极好,经段洪刚先生上手亲鉴,品相名列全国第三。2010 年香港某拍卖会拍出一品,成交价 53 万元。

宝安二十文,铸期短,铸额少,存世不多,属中国铜

圆中的珍稀版别。征集于市区某藏家之手。

来源:李志强先生藏。

材质:红铜。

等级:四级。(图 13)



图 13 安徽光绪元宝安二十文

14.湖北鄂字丙午二十文

参数:直径 34.2 毫米,厚 2.6 毫米,重 14.5 克。

制造日期:晚清。

特征:湖北鄂字丙午二十文大清铜币是湖北铜元中的大名品之一,也是中国铜元中的名品。

正面中间一个“鄂”字,系湖北省简称,上下右左为“大清铜币”四字,外环珠圈,上刊“光绪年造”四满文和“丙午”二字,中间“户部”二字分列左右,下边从右至左为“当制钱二十文”。

是品深栗壳色包浆,钱文清晰,背龙鳞略有磨损,较少流通,保存状况较好,器形完整。鄂字丙午二十文已历一百多年,存世稀少,此品品相属收藏级。

来源:李志强先生藏。

材质:红铜。

等级:六级。(图 14)



图 14 湖北鄂字丙午二十文

15.云南二十一年二仙

参数:直径 29.5 毫米,厚 1.40 毫米,重 6.9 克。

特征:正面上下右左刊“云南省造”四字,四角各有一朵五瓣边花,中间为“贰仙铜币”,外环珠圈,中心是一圆台。

背面上边刊“中华民国”四字,下边刊“二十一年”中部左右边各有一朵五瓣边花。中间是双旗图案,上边旗中间一个“2”字。

是品传世品,钱文清晰,珠圈完整,边齿大部可见,流通痕迹自然,保存状况较好。

二十一年贰仙铜圆存世稀少,难得一见。

来源:李志强先生藏。

材质:黄铜。

等级:五级。(图 15)



图 15 云南二十一年二仙

16.四川军政府小字叠顶花背元年方头汉

参数:直径 32.8 毫米,厚 1.9 毫米,重 10.5 克。

制造日期:民国。

特征:面文中心为叠顶花,上下右左对应为“四川铜币”四字,外环珠圈,上刊“军政府造”四字,下边“当制钱二十文”六字,左右边各有一“十”字形边花。背面中心大圆圈内为一篆书“汉”字和数十条平行阳纬线,大圆圈外有数十条平行阳经线与 18 个小圆圈相连,上刊“中华民国元年”六字,左右边各有一“十”字形边花。

是品浅褐色包浆,面有多处不规则锈迹,背上沿文字中有二字弱打,流通痕迹明显,是四川军政府二十文铜币中的大名品。该版不仅极为罕见,而且对于研究重庆铜圆局二十文铜圆从小字向大字系列的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购于本市古玩市场。

来源:桂柏松先生藏。

材质:黄铜。

等级:四级。(图 16)



图 16 四川军政府小字叠顶花背元年方头汉

三、珍稀铜圆为何能留存至今

中国铜圆的历史已经有 100 多年,在 100 多年后,十堰还有如此多的珍稀铜圆存世,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独特的地理环境。

(一)较少受到战争的破坏。十堰地处大山区,交通闭塞,居住分散。抗日战争时期,李宗仁将军的部队在老河口重兵设防,十堰各县(市、区)城虽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野蛮轰炸,但仅有郧县和丹江口市与河南交界小范围区域遭到日军袭扰,全市其它地方没受到日军的直接洗劫,使得铜圆这种家家户户司空见惯的废旧物质得以较好保存。由于交通不便,山里人也不

可敬可爱的博物馆人

姜 林

(湖北钱币博物馆)

2010年10月,我来到湖北钱币博物馆。履职新岗位以来,有同事来道贺:好地方啊,清闲啊,实在啊……有不少直接开问:比人事处怎么样?我倒也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是:人事处是忙,但这边也没有闲着。

自然,相信者寥寥。至少,博物馆的事迹很少上分行《每周要情》,而处室周报之单调也是事实。我记得2012年有接近三个月的时间,周报雷打不动的主题是“清理馆藏”。

全馆藏品逾万件,单是清理馆藏这一桩子事情,一做就是三个多月。保险柜搬迁、库房清理时,年纪五十有四的张馆长也和我一起捋起袖子在库房里干,小姑娘头戴口罩,干得亦乐乎。夏红艳、王静负责藏品管理,

两个小丫头一直在打下手,连退休的韩国大姐也来帮忙。几名同志在博物馆库房里长期一做就是一整天。库房里空气浑浊,总有一股霉味挥之不

去,而那些封存在信封、麻袋、蛇皮袋中的古钱,要一件一件清点出来,辨认、登记、重装包装、造册,统计入账。工作量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每天的事情琐碎单一,工作却很充实,周报仍是廖廖数条……

您也许会问了,博物馆除了内部管理、清理馆藏,还有什么业务?我可告诉您,事情多了去了。钱币研究,每年都有新课题;承办全国性学术会议,近十年承办了六次,居全国之首;还有一系列的钱币宣传和展览:2003年反假货币巡回展,2004年革命根据地货币展,2005年人民币反假工作成果教育展,2006年湖北省金融理财文化节,2007年拍摄湖北货币专题片在湖北电视播出,



愿意为出售几个不值钱的铜板而出一次山!改革开放后,少数思想敏锐的人关注到了铜圆,开始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搜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郧西县店子镇一桂姓老人,就收集了5万多枚铜圆,整整装了七大麻袋!

(二)十堰山区居住条件改变较晚。十堰属于大山区,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平原地区。十堰经济真正进入较快发展时期,是与现代汽车工业在十堰的兴起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而同步的。因此,十堰人直到上世纪末才开始用砖瓦房代替干打垒房子,世代居住的土墙房子在拆除时,往往墙缝中还有一些有意或无意遗存的铜圆和古钱。房县一位五保户老人因病去世,拆除旧房子时,还在檩条下拆出了一卷二版叁元纸币,拿到十堰市场,几十元一张,被一抢而光。

(三)铜元研究略为滞后。过去由于资料匮乏,十堰地区收藏和研究钱币的人不多,收藏铜圆的人就更少

了。随着段洪刚先生《中国铜圆分类研究》出版,加快了铜圆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从而推动了十堰地区铜圆收藏的发展。专门在一线收购古玩的,铜圆已经进入他们的视野,专业钱商也把铜圆作为一个重要品类来经营。也有钱币收藏者,把铜圆作为专题,他们是十堰地区珍稀铜圆的发现者和收藏者。

十堰地区的珍稀铜圆当然远不止这些,如云南二十一年一仙、五仙铜圆,河南五十文上星等,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介绍。

总之,丰富的铜圆资源为十堰市的铜圆收藏创造了有利条件,十堰市的铜圆收藏也一定会成为湖北铜圆界一道美丽风景!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李志强、许向东、桂柏松先生的大力支持,仅此致谢! ▲



2008 年制作宣传片《新中国钱币概况》;2009 年“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安全”主题宣传;2010 年在《武汉晨报》专版介绍人民币发行情

况;2011 年开通湖北钱币网,2013 年与中国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联合办 5.18 博物馆日;2014 年与武汉市档案馆联合举办“近现代鄂泉图要”展览。我们还组织参与历年来的“3.15”人民币反假宣传活动、省社科联“科普活动周”、湖北省政府“中国·武汉金融博览会”,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

至于 2015 年的工作亮点,自然是“红色金融历史展”和“湖北近代钱币展”。为办好这两个展,我们先后查阅资料万余份,驱车逾十万公里…您在摇头?好,那我给您掐指算算:我们组织专人耗时两个多月泡在省图书馆,查阅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抗战日报、新华日报等老旧报刊,从中查找红色金融线索,从创刊日算到



解放前,几近万份,加上其他老旧书籍、画册、资料等,过万不成问题;为汇报展览进度跑了六次北京,驱车深入

辖内吉安、赣州、衡阳、浏阳、咸宁、荆州、黄冈等地调研。当年的红色金融遗址,都是地处山沟旮旯,每天坐上几个小时的“摇摇车”,胆汁都恨不得吐出来;为使展览生动形象,我们设计了新四军印钞场景。为查找实物,我先后跑过北京印钞厂、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博物馆、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印刷博物馆、湖北省印刷协会、阴山县毕升印刷博物馆等,也曾走访武汉多个文物藏家,节假日也泡在武汉收藏品市场里查找线索,却一无所获。湘西人行老郭,抽调到红色金融办公室后,在回家之余也自费跑到湘



西州下面的泸溪、古丈、龙山等偏远县城寻找老式印刷机,仍然空手而归。因此,当我们得知在千里之外的浙江长兴县某国营老印

刷厂发现了新四军当年的圆盘印刷机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喜悦心情啊。我和杨枫主任一起出差,当见到实物

时都高兴得相互拍手。杨主任不顾鞍马劳顿,亲自与工人们一起推车、装卸。1.5 吨的大家伙,只能在地上放上铁管,一寸一寸往前挪…红色金融开展前,大伙儿连续加班 2 个多月。印象最深的是预展前的布展,我们工作到深夜,十一点多时岳华实在累了,拉开卷闸门去外面抽烟。但听装修工头大吼一声:危险!猛地冲出去把他拽了回来,迅速关上门。我们全都愣住了——难道外头有怪物不成?加班完毕,装修工人引领大家走后门的安全通道,突然数十条斑斓巨犬冲出来,隔着栅栏对着我们狂吠。原来,省博物馆闭馆后,除了保安巡逻,主要就是靠这些猛犬卫士。刚才岳华真是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啊。我们还不忘记打趣:岳兄,你要是被狗咬了,应该算工伤吧。装修工头悠然道:“不会是咬伤,一旦围攻只可能是撕成碎片”,听得大家毛骨悚然…设计公司的方案、图形组合、文字稿件我们严格要求、事无巨细、精益求精,展览公司的美女设计总监向我抱怨:“都快被你们搞

死啦,你到底想把展览办成什么样啊?”我莞尔一笑:“听说人死前大脑会放电影,我希望我死前会记得这个展览”。只见美女顿时嘴巴吡成 O 形,半晌,喉咙动了动,貌似咽下一口唾沫,来了句:“…喔…懂了…”

我们的工作,少见大家熟悉的报表、报告、金融形势分析,也没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有的只是一段段难忘的瞬间:与张馆长一起在洪湖瞿家湾遇到的那位百岁老红军,与苏州革命博物馆周馆长啜茗两个时辰最终冲成白开水的那壶龙井,与何永亮出差拍摄资料在石家庄街头的那碗驴杂面,与文物出版社李编辑在明苑酒店校对的那张床铺,多次协商、终于搞定通山县某收藏家借来的那块石板……所有这些瞬间拼接起来,就是我认识的湖北钱币博物馆那一群可敬可爱的人们。▲



中国历代虚值货币简述

陈争鸣

(一)

货币,这个伴随着人类文明产生、发展的商品交换媒介,数千年来以它独有的作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社会发展。它可以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源,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它也可以是破坏社会稳定的发生器。作为一种经济调节工具,有的当政者用它来均平社会财富,藏富于民,促进社会均衡有序发展;有的当政者利用它来搜刮人民财富,使之急速聚敛于当权者的指配之下,致使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货币为何能有如此神奇的力量?这全在于当权者赋予货币所表示的价值:足值或虚值使然。

所谓虚值货币,即是指以实物形态出现且其实际价值远低于面值的流通货币。纵观历史,古代虚值货币一般以四种面目出现:一是在货币上标出高面值,如大泉五千;二是所标面值不变,但货币实物严重减重,如沈郎五铢;三是政府以强权赋予其高兑换比值,如乾元重宝;四是无准备、无节制发行的纸钞。

在我国古代货币发展的长河中,曾经很多次出现过虚值货币横行泛滥的时候。有的是因为当政者对货币流通疏于管理,民间私铸、减重币大肆泛滥。有的是统治者有目的的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发行高额的虚值货币,在短期内使社会财富向统治集团集中。其结果都是使财富分配失去公平、社会发展趋于动荡,无不影响到政权的稳定,最终结果都是被历史所唾弃。

汉朝初期,由于长期的战争创伤,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鉴于国穷民困,经济十分萧条,“秦钱”已不适应当时低水平的经济生活。汉刘邦便颁布了“更令民铸钱”的法令。新法规定,一是将秦时法重十二铢的半两,减重至三铢上下;二是放弃中央对铸币权的垄断,让地方及民间自由鼓铸。由于利益所致,实际铸钱越来越小,其重量减至秦半两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形似榆树果实而称“荚钱”、“榆荚半两”。流通后曾引起物价飞涨,“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凿边五铢和絁环五铢是汉代虚值货币中的孪生兄弟,前者是指边廓连同部分钱肉均被剪去或鋈切的五铢钱,无外廓,钱文“五铢”二字仅剩靠内的一半。后者是指钱币的内圈被凿去,只剩下肉和外轮,钱文“五铢”二字仅剩靠外的一半。两者币值都虚涨一倍,严重影响

公平交易,引起物价极度动荡。

“白金三品”,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以龙、马、龟为纹样的三种形制银锡合金金属币的总称,是迄今正式见于官方文献的最早的法定银币。

白金三品的龙、马、龟分别规定值四铢半两3000枚、500枚和300枚。然而,以重约八两的龙币为例,其实际价值还不足1000枚,因为当时白银的价钱一两最多才值125枚铜钱,如果是八两白银也才值1000枚,何况再在白银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锡,其溢值就更大了。由于银与铜钱的比值出奇的离谱,致使盗铸猖獗,到了“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的地步,给社会道德底线以极大的破坏。

东晋时期,凿边五铢和絁环五铢又演化出了新的种属——“沈郎五铢”。此钱穿孔奇大,钱文为“五朱”或“五金”,由于其太过轻薄,文人赋诗形容它“今日春光太漂荡,谢家轻絮沈郎钱”、“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作为货币,已是到了与“轻絮”、“榆荚”相比较的地步。

南北朝时期还出现过一种更轻小的五铢钱:鹅眼钱。此钱无轮廓,钱形大小如鹅眼。顾烜曰:“此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尺帛斗粟,动辄一万。”这种鹅眼钱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轻小的方孔圆钱。

王莽币是古代虚值货币中的一个奇葩,王莽当政后,为了削弱汉朝旧族势力,以及加速对百姓的财富掠夺,他以“托古改制”为名进行了一系列的币制改革,刀币和布币都在改革中恢复,但从形态上与春秋战国时的并不相同。王莽币的面值奇大,繁琐庞杂,荒谬绝伦。不仅有值五百和五千的刀形币和值万的“国宝金匮”,还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二十八品。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体量不断缩小,面值却越来越高,实质上加剧了对老百姓财富的掠夺,币制改革的失败也成为新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

三国时期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为应付战争开支,割据一方的当权者争相发行虚值货币,先有董卓“坏五铢铸小钱”,致“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继有刘备发行值百五铢、太平百钱;东吴孙权也不甘落后,更

是无所不用其极,发行大泉五百、大泉当千、二千、五千乃至大泉直万,发行虚值大钱已成常态。老百姓不仅饱受战争的摧残,更是遭受虚值大钱的盘剥,民不聊生的境况难以想象。

唐朝乾元重宝,是唐朝由盛转衰之时发行的虚值货币。为平定安史之乱产生了巨大经费开支,唐肃宗为了平衡财政供求矛盾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发行了“乾元重宝”虚值大钱。此钱是两种制式,一种是光背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还有一种背重轮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五十枚。此两种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很快便造成了货币流通的混乱,尽管后来调整了三种钱的比值关系,但仍未改变货币贬值的本质。

得壹元宝与顺天元宝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安史之乱”在货币上的产物,这两种钱都是虚值货币,在安史之乱很快被平定之后,其所发行的货币也随之退出流通。由于这两种钱在铸行时间上的不同,得一元宝铸行在先流通时间较短,存世量少,顺天元宝铸行在后流通时间相对较长,存世量则多一些。故尔在钱币收藏界有“顺天易得,得一难求”之说。

北宋发行年号钱二十多种,但大钱不多,唯崇宁通宝、崇宁重宝和大观通宝是其大面额虚值钱的代表作品。徽宗赵佶于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为解决财政困境,开始铸造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折十对钱,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停铸。“蔡京主行夹锡钱,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照此折算,人们手中的财富有一大半被抢走了。老百姓不认可,群起而抵制,此即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大观通宝亦是徽宗赵佶于大观年间(公元1107年至1110年)铸造的钱币,钱文是徽宗所书,其瘦金体“铁划银勾”钱文精美,此钱铸造工艺精良,也属古代铸钱之典范。

南宋政权是外患最为频繁的时期,不论是抗击外敌的战争时期,还是屈盟纳贡的偏安时期,朝廷都需要巨量的财政支出,尽管南方算是富庶之地,靠正常的收入也难以支撑这庞大的经费开支,在此背景下,实施膨胀的货币政策被当权者采纳。南宋发行的有代表性虚值大钱有绍兴通宝、绍兴元宝、端平元宝、淳祐通宝当百以及大量的铁钱。此间还发行了一种地方性代用币——临安府行用钱牌,有铜、铅两种材质。铅质为一拾、四拾、陆拾,铜质为贰佰、叁佰、伍佰。这种长方形钱牌在历代政权发行的货币中也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金章宗在与南宋的战争以及遭遇黄河数次决口的灾难中,国家财政背负了巨大的包袱,不得不通过发行交钞和铸行大钱来弥补财政的空虚,泰和重宝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发行的。泰和重宝铜质优良,制作精美,以一当十用。面文“泰和重宝”四字为玉筋篆,由文学、书

法大家党怀英书,字体精纯典雅,美不胜收。

元朝统治到了末期已病入膏肓,这时顺帝的图治之志早已消失殆尽,懒于朝政且挥霍无度,为笼络人心,又时常对贵族、僚臣、寺院滥行赏赐,加上各地灾荒频起,致使国库空虚,财力艰维。为解决不但加剧的财政危机,在发行金属大钱“至正通宝”的同时,于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未发行“至正交钞”。由于印造无数,引起恶性通货膨胀,民间视交钞如同废纸。

明朝的货币是在纸币与铸币交混流通状态下延续发展的,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前他就在应天府设置了宝源局,开铸大中通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明太祖下诏由中书省造“大明通行宝钞”,并于次年以中书省名义发行,后废中书省由户部印制。为了维持纸币制度,政府先是禁止用铜钱,接着又禁止用金银,然而纸币却滥发无度,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目的。明代纸币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不设准备金,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弘治年间宝钞在商品货币经济中已无意义,民间只用银和铜钱进行交易,正德年间宝钞已经交易不行,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开始正式停用宝钞,恢复了铜钱铸造。

天启通宝钱以铸量多,流通广,成为明代流通量最多的钱币之一。到了明熹宗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铜钱滥铸情况又出现。天启年(公元1621年)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采用增加铸钱量来解决。初铸为小平钱,后开铸当十钱。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因官私所铸大钱过多过劣,下令停铸。

崇祯时期钱制是明朝钱币最复杂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最复杂的一个时期,其中小平钱复杂的背文,版别更加体现了崇祯钱制的复杂性。崇祯不仅发行当十大钱,还发行了许多小平制式的大面值钱,对百姓财富的盘剥尽在虚值货币之中。

清朝咸丰年间发行了一系列大面值铸币以及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

咸丰大钱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行的。清咸丰年间,时值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展迅猛,朝廷税收猛减,国库空虚,饷需繁重,铜路梗塞。在此大背景下,一方面是镇压起义急需大量的军饷开销,一方面是铸钱的原材料告缺,给清政府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最终迫使清政府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和铸行大钱以救燃眉之需。为了缓解铜料的短缺,还采用了铜、铁、铅钱并铸的形式,其币制之混乱,在我国古代历朝中可谓绝无仅有。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发行,之后在京城很快就难以通行。在民间宝钞贬值惊人,每贯仅值当十大钱百余文,后来每贯只值制钱10

文,人们拒绝使用宝钞。到咸丰十一年(公元 1861 年)清政府清理钞票时,官票早已绝迹,宝钞跌到每贯仅值制钱 26 文,最多时值 52 文,几乎成为废纸。到了同治初年(公元 1862 年),清政府征收各种省课税款项时只收实银,不收票钞,政府财政的各项开支也不搭用票钞,民间更是唾弃如恶,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在流通了 10 年后终于寿终正寝,从此也结束了中国古代政权强制推行纸币的历史。

(二)

通货膨胀并不是在纸币流通条件下特有的经济现象,历史证明,在古代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由于超发货币、使货币虚值化(大面值货币、减重货币),都曾引起了通货膨胀。

在现代信用货币(纸币)流通条件下通货膨胀亦称通胀,一般定义为: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给定经济体中的物价水平普遍持续增长,从而造成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在通货膨胀时期,如果居民的名义收入没有相应增加,生活水平就必然会下降,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秩序混乱,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通货膨胀又是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现象,尽管导致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加。用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与既定的商品和劳务量相对应,必然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会产生如下影响:实际收入水平下降;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导致福利减少;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表现为,低收入者福利受损,高收入者却可以获益。以工资和租金、利息为收入者,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害。而以利润为主要收入者,却可能获利。

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债权人,在通常情况下,借贷的债务契约都是根据签约时的通货膨胀率来确定名义利息率,所以当发生了未预期的通货膨胀之后,债务契约无法更改,从而就使实际利率下降,债务人受益,而债权人受损。其结果是对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带来不利的影响,使债权人不愿意发放贷款。贷款的减少会影响投资,最后使投资减少;在雇主与工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雇主而不利工人。这是因为,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工资增长率不能迅速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从而即使在名义工资不变或略有增长的情况下,使实际工资下降。与此同时,实际工资下降则会使利润增加;在政府与公众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政府而不利

公众。

由于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名义工资总会有所增加(尽管并不一定能保持原有的实际工资水平),随着名义工资的提高,达到纳税起征点的人增加了,有许多人进入了更高的纳税等级,这样就使得政府的税收增加,随着公众纳税数额的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不仅不会增加反而却减少了。

不论是古代金属虚值货币的泛滥,还是现代通货膨胀的横行,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正常运转,对人民生活的安定都会产生极大破坏作用,应当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

思考之一,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一定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全社会物质基础相匹配。以超发货币、实施通胀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其结果无疑是饮鸩止渴,适得其反,在短暂的刺激作用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颠覆性的灾难;

思考之二,作为价值尺度,货币是经济交易的计量仪,钱币面值结构的设计、换算一定要直观、简便易于推行,且必须稳定不可频繁调整。王莽新朝实行的四次货币改制失败就是最好的例证;

思考之三,维护国家对货币发行的绝对权威,杜绝一切削弱国家货币铸造发行权的行为。历史上曾出现过在国家铸币的同时,存在着诸侯、商人、民间个人也可以合法地铸造货币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势必会成为脱缰的野马不可控制,货币流通之混乱也一定会成为必然;

思考之四,伪造货币是直接影响货币稳定运行的毒瘤,对于伪造货币行为的打击绝不可有一丝的松懈,必须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

(三)

笔者通过对中国古代虚值货币的梳理和研究,撰写了《中国历代虚值货币探析》一书不久将与读者见面,全书以朝代成章,章下以该朝代有代表性的虚值货币为节,顺序记述了从汉代到清朝出现过的主要虚值货币,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历代虚值货币产生的背景、发展及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中国古代货币历史源远流长,出现过的各种货币浩如烟海,其中虚值货币俯拾即是,如要逐一描述也属不易,只能择其影响较大的加以纂述。

览古而知今,古为今之鉴,其理相关,其情相连。辉煌的一定有其道理,衰败的也一定有其必然。作为后人如何以正确的态度面对那些辉煌与衰败,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避免重蹈古人曾经的覆辙,这就是笔者由衷的期盼。

笔者不揣冒昧抛砖引玉,以期能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了解对古代货币的研究。▲

古代民俗钱币上的城隍信仰

叶真铭

(福建省钱币学会)

城隍信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对古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伦理、道德、民俗、民风等各个领域,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城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在古代民俗钱币——厌胜钱上也得到了体现。

一、城隍信仰

城隍信仰起源于先民对城壕、水庸的原始自然崇拜。“城”原指土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壕。《说文解字》曰:“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周易·泰卦》有:“城复于隍,勿用师”之语。历史文献中,将“城”与“隍”连用,首见于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考古证实,新石器时代就有古城和壕沟的存在。冷兵器时代城池壕沟在保护城市安全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故而先民逐渐将保护其生聚的城池建筑物神圣化、人格化,称之为城隍神,对其顶礼膜拜,使城隍逐步演变成成为地方守护神。

早在周代就有了祭祀城隍的活动。《礼记》所记载的八蜡所祭之神中就有城隍神。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书·慕容俨传》中有关于城隍爷显灵护城的最早记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北齐大将慕容俨镇守郢城,被南朝梁军包围。梁军以获洪截断水路供应,形势危急,“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歛起,惊涛涌激,漂断获洪”。城隍最初只是城池和地方的保护神,后来随着道教介入和人们对城隍司职期望的增长,城隍司职之权向阴阳两界扩展,人们又奉城隍为主管阴司冥籍之神。

城隍信仰产生后,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唐代封爵,五代时封为王。宋代列入国家祀典,各府、州、县皆立庙奉祀。至明代,城隍信仰更是盛极一时,城隍神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城隍神的封号、官阶品级同现实生活中的地方官一样。明朝各地城隍庙的建筑规制模仿各级官府衙门建造,俨然形成一套完整的阴司王朝的官吏系统。民间俗信城隍乃阴界的地方官,司掌督导邑吏、监察民隐之职,因此举凡新官到任、地方上有悬疑案件或诅咒立誓,都要祈告到城隍爷;民众如要证明决心与清白,往往会到城隍庙斩鸡头立誓,请城隍做见证

以取信大众。由此可见,在古人心目中,阴界的城隍神远比人间的司法、监察衙门更具公信力,民众对城隍爷的信任度也胜过司法官吏。

二、古代民俗钱币——厌胜钱

厌胜钱也叫做压胜钱、押胜钱、花钱,它起源于西汉,至清末民初都有铸造。虽然大多数也铸造成圆形方孔形状,但它们并非流通货币。一般是人们为了避邪、祈福、供养、游戏、纪念、记事等需要而特别铸造的,以专供佩带、悬挂、摆放、礼赠、皮藏或赏玩之用,不具流通货币功能。其币面除铸有文字外,还铸有图案,钱面纹饰内容和表现手法都比历代流通钱币丰富多彩。

压胜钱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与社会民俗渊源关系最为紧密的钱币,因此也被称为古代的“民俗钱币”。作为钱币文化的衍生产品,它既是传统文化观念和思想的承载物,又是一种符号,传递着无法用其他形式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概念和信息,如辟邪、吉祥、向善、健康、平安等等;它既展示了先民们对大千世界的独特理解与感悟,也充分反映了百姓祈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思想与期盼,从中透射出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情民俗,述说着老百姓求福求喜求善求安宁的理想追求。

尊奉和祭祀城隍,祈求城隍爷保佑的民间信仰,也是古代民俗钱币上重要的表现内容之一。

三、古代民俗钱币上的城隍信仰

城隍信仰对古代中国政治、社会、伦理、道德、民俗、民风等各个领域,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城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在古代民俗钱币——厌胜钱上也得到了体现。本文介绍三枚与城隍信仰有关的古代民俗钱币。

1. 城隍协侍花钱 (图1)

此钱钱体呈圆形状,中为双面镂空图案,上有挂钮,可用于悬挂佩戴,属于挂牌式大花钱,也可称为“配饰钱”。直径32.3毫米,厚度2.5毫米,青铜质地,其铸造年代可能为辽



图1 城隍协侍花钱

代或金元时期。其币面中央为端坐着的城隍爷形象,身着戎装,右手持一柄长剑,威风凛凛。城隍爷两旁协侍着牛头马面,怒目圆睁,仿佛在呐喊助威,庄严肃穆。

城隍是城市的保护神,因此古代凡有城池的地方都建有城隍庙。各地城隍庙里的塑像与配神各不相同,但一般都有如下塑像:正殿之中祀奉城隍大神,两旁分列八大将、文武判官、牛头马面、黑白无常、钟鼓神以及十殿阎王、二十四司等地狱塑像,有的还有财神、送子娘娘等配神塑像。

几乎所有城隍庙的主殿都有一块写着“尔来了”或是“你来了”的牌匾,意思是说,不管你在人间活多久,终究逃不过城隍爷这一关。人一走入城隍庙主殿,抬头就看到“尔来了”三个大字,心里自然产生一股震撼感,仿佛听到了城隍爷用严厉的口吻在训诫着。古人佩戴城隍协侍花钱钱,自然是希望城隍神随身护佑,同时也时时警示自己应心存善念,在世上做事光明正大,否则就逃脱不了城隍爷的惩罚。

2.城隍护身花钱钱(图2)

此钱钱体呈圆形状,上有挂钮,可用于悬挂佩戴,也属于挂牌式花钱。其币面中央圆圈内有一“印”字,圆圈上缘书“城隍护身”四字,下缘镌“驱邪保安”四字,两侧各有一五角星图案。背面面素,无纹饰。该钱为黄铜铸造,其铸造年代可能为清末民初时期。



图2 城隍护身花钱钱(正、背面)

民间奉祀城隍,最初以之为城池、地方的保护神,后来人们又奉城隍为主管阴司冥籍之神。据《茶香室丛钞》记载:唐代洪州司马王简易经常突然得病,有一天梦见一个自称为丁郢的小鬼,说是奉城隍神的命令前来捉拿他。王简易只好随小鬼去见城隍。城隍命左右将命簿拿来一查,发现王简易还有五年寿命,于是便放了王简易。可见,至迟到唐代,城隍神已主冥籍。这样一来,城隍就成为统管阴阳两界、有着广大法力、掌管人间生死祸福的地方最高神祇。道教把城隍纳入自己的神系,称它是剪除凶恶、保国护邦之神,并管领阴间的亡魂。在道教地神排列中,城隍为第一神祇。于是,在那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年代,普通百姓争相佩挂“城

隍护身”花钱,以祈求城隍爷保佑,驱除邪祟,永享安康。人们通过对城隍神的崇拜,获得自我保护,寄托美好希望。

3.城隍关锁配饰钱(图3)

此钱钱体呈锁片状,可用于悬挂佩戴,属于配饰钱一类。古人佩带于身上作装饰或辟邪的钱形铸品,被称为“配饰钱”。配饰钱起源于汉代,原为钱形带扣,后来在其上增添各种图案或吉语,诸如“日入千金”、“长相勿忘”等。清末民初民间大量铸造的、带有吉祥图案或文字的锁片往往也被归入配饰钱之列。此钱正面上方“城隍”两字分列右、左两侧,其下有“金玉满堂”四字;背面上方两侧分列“关锁”二字,其下为“长命富贵”四字。该钱为黄铜铸造,其铸造年代应为晚清民国时期。



图3 城隍金玉满堂锁片(正、背面)

“金玉满堂”语出自《老子》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金玉财宝满堂,形容财富极多。如唐白居易《读道德经》诗:“金玉满堂非己物,子孙委蜕是他人。”也形容学识丰富,富有才干。如《世说新语·赏誉上》:“刘真长可谓金玉满堂。”“长命富贵”,既长寿又富裕显贵。语出《旧唐书·姚崇传》:“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常常用于对小孩的祝福。带有“金玉满堂”、“长命富贵”吉祥祝福语词的锁片上镌有“城隍关锁”四字,说明该锁片祈请于城隍庙,表达了长辈祝福儿孙们在城隍神的护佑下健康成长,一生长寿富裕,显贵荣华。通过这枚配饰钱,我们不难窥见旧时代民间老百姓对城隍神的信仰和依赖。

古代民俗钱币上铸就了丰富多彩的城隍信仰,写尽了世事人间的习俗百态,为我们绘就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城隍文化民俗画卷,向我们透露出超越时空的丰富信息,值得我们收藏玩味。▲

注:本文附图来自网络,特此致谢!

2015 年度湖北钱币大事记

1月28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殷兴山行长、刘绍新工会主任,会同办公室、工会办、宣传部、钱币博物馆等部门,共同听取红色金融展办公室关于展览筹备情况的汇报,并就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规划。

2月3日,湖北省钱币学会派员赴北京,向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红色金融专委会汇报了“红色金融历史展”设计、编纂、展板修订、文化创新等相关情况。

2月11日,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红色金融专委会周燕顾问、周卫荣秘书长赴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听取“红色金融历史展”筹备情况汇报,勘查湖北省博物馆装修工地,并深入红安等地红色金融遗址开展考察。

3月15日,湖北省钱币学会组织赴江汉路步行街,开展人民币、贵金属纪念币反假宣传活动。

3月24日至4月6日,由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红色金融专委会、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联合主办,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湖北省博物馆协办的2015年度红色金融历史展(武汉站)在湖北省博物馆成功举办。展览以“传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红色金融文化”为出发点,通过一系列展板、展墙、实物、场景、歌曲演示、视频展播、观众互动等方式,全面讲述我国红色金融的重要历史轨迹,展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足迹,讴歌了我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庆平、原副行长马德伦,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尹汉宁,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斌,湖北省副省长曹广品等领导同志莅临观展;金融时报、湖北卫视、武汉电视台、楚天都市报、湖北商报、湖北电台、人民网、新华网、荆楚网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展览期间共接待观众逾10万人次,社会各界反响强烈。

4月3日,为筹备即将在北京举办的《湖北近代钱币展》,湖北钱币博物馆全体工作人员,赴北京中国钱币博物馆临时展馆,现场开展展板布置、藏品摆放、讲解员培训等工作。

5月28日,湖北省钱币学会根据中国钱币学会要求,推荐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杨立杰同志为中国钱币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殷兴山同志不再担任常务理事一职。

6月19日至8月下旬,“湖北近代钱币展”在北

京隆重开展。本次展览由“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届联合会、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联袂主办,“湖北钱币博物馆、湖北省钱币学会”共同承办。开幕式上,中国钱币博物馆、北京市社科联、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司局、中国钱币学会专家学者、湖北省钱币学会团体会员代表等七十余人参加开幕式。中国钱币博物馆周卫荣馆长主持开幕式,武汉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杨立杰同志莅临开幕式并致辞。《金融时报》、《金融博览》、中国金币网等进行了现场采访,《金融博览》杂志还就武汉分行建设钱币文化相关议题对杨立杰行长进行了专访。

6月13日至14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湖北省钱币学会会员马长伟先生代表湖北省钱币学会应邀参加了“第三届中国金融史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发言交流。

10月16日,湖北省钱币学会以通讯形式召开五届七次常务理事会议,研究第六届理事会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人选。

10月29日至30日,湖北钱币博物馆张卫星馆长参加湖北省社科联、民政厅、社会组织总会联合举办的“湖北省社科类社会组织骨干培训班”。

11月6日,湖北省钱币学会组织召开五届八次常务理事会议,研究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人选,并就章程、会费修改情况进行了讨论,表决同意接纳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以分会形式加入湖北省钱币学会。

11月26日,湖北省钱币学会张卫星、姜林同志参加了2015年度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例会暨学术研讨会,姜林同志就“红色金融历史展(武汉站)”策划、设计、筹备、创新等有关情况在大会上作了交流。

12月10日,湖北省钱币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审议了湖北省钱币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通过了换届选举办法,选举产生湖北省钱币学会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人选,讨论通过了章程、会费修改意见。

12月10日,湖北省钱币学会六届一次常务理事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选举了湖北省钱币学会秘书处副秘书长,讨论通过了《湖北省钱币学会财务管理制度》,并就第六届理事会在钱币文化宣传、推广、展览、创新等方面开展了交流。▲

让红色金融精神代代相传

——《江西红色金融记忆》书评

赵小冬

江西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江西先后创建有井冈山、东固、闽浙赣、湘鄂赣、湘赣等革命根据地以及当时区域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建立及发展,根据地的金融工作者为支援革命战争、巩固根据地建设,相继建立金融机构,发行苏区货币,开创了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金融事业。

江西红色金融事业在共和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中国革命早期的第一个红色经济实体,发行了最早的股票;井冈山上井造币厂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金属铸币厂,铸造了井冈山“工”字银元;吉安东固平民银行是红色政权早期的银行之一,发行了江西苏区第一张纸质铜元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建立的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国家银行。

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积淀着浓厚的红色金融元素。金融先驱者为创建红色金融事业、发展苏区经济、巩固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红色金融财富。为了永远铭记这片土地上的红色金融事业,传承红色金融精神,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开启了整理红色金融记忆的系统工程。

在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红色金融专委会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组织全省人民银行力量深入当年的革命根据地调研访谈、考察旧址;与文博单位积极合作、钩沉探源;组成专门工作机构梳理史料、推敲考证;立足于发掘史料价值、搜集点滴记忆、还原历史面目,全面梳理了江西红色金融的机构、票证、旧(遗)址、人物、史料等方面资料,为《江西红色金融记忆》一书提供了有力的资料支持。经各方合力协作,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与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辑的《江西红色金融记忆》一书,现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为中国红色金融系列丛书的开篇之作,《江西红色金融记忆》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该书从2014年12月开始编撰,在资料搜集和整理编写过程中,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红色金融专委会、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宣传部、货币金银局、金融研究局等相关单位和部门给予了悉心指导。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王信和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晓春共同主持制定编写大纲并终审书稿;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党委委员、工会主席陈锋和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史爱国对文稿的编写进行具体指导并逐篇逐章审阅;江西省测绘局协助制作了《江西红色金融地图》。中国人民银行原党委委员、行长助理金琦,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李炳军欣然为

该书作序,更为《江西红色金融记忆》增添了亮丽。

《江西红色金融记忆》一书内容丰富,较完整记录了江西红色金融机构的创建和发展变迁情况,收录了大量的红色金融机构旧(遗)址和红色货币、股票、债券、借谷证等红色金融产品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系统整理了反映红色金融历史的访谈资料和法律规章制度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基本展现了江西红色金融的全貌。

《江西红色金融记忆》共有七个篇章。其中“机构篇”介绍了土地革命时期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红色金融机构,以及它们的职能和发展情况;“业务篇”展示了当年红色金融工作者在战火中办理存贷款业务、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和公债的历程;“斗争篇”反映了战争年代的革命金融人,摧毁旧的金融体系、制定新的金融方针、开展货币斗争、创建革命金融事业的光辉业绩;“票币篇”整理了在江西地域发行流通的苏区钱币、战争公债、借谷票、股票等实物资料,透过票证资料让人们看到革命根据地货币和票证的发行与流通;“人物篇”介绍了毛泽民、曹菊如、李六如、黄亚光、成功等红色金融的先驱者,用他们的热血及生命谱写了金融事业的史诗,演绎了不朽的传奇;“回忆篇”里的讲述,让人们看到革命先驱以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仰、满腔的热血铸造的红色丰碑;“文献篇”中的文字向后人展现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淡去的硝烟中流传至今的决议、通令、布告、规则等让人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创业的艰辛,倍加珍惜这宝贵的精神财富。

迄今为止,在所有研究江西红色金融的书籍中,《江西红色金融记忆》应该是最令人期待:一是涉及面最广。几乎涵盖江西土地革命时期红色金融的方方面面;二是资料最丰富。全书36万字,几乎所有县级以上的红色金融机构和几乎所有的苏区货币、股票、债券等红色金融产品的图片都收入书中;三是最有权威性。由代表江西金融研究最高水准的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和代表江西党史研究最高水准的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编撰出版。

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披露的一些资料,是最近几年发现和考证的,如苏维埃国家银行秘密金库遗址等红色金融机构的旧(遗)址。毛泽民外甥曹耘山同志特意为本书提供毛泽民在莫斯科养病期间撰写个人简历的影印件,对以往党史中关于毛泽民简历的介绍作了重大补正。这些珍贵资料的收录更加凸显本书的价值。

《江西红色金融记忆》以史为鉴,激活红色基因,传承红色文化,其中大量的红色金融历史资料,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愿《江西红色金融记忆》一书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为推动金融改革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